

炎黄春秋

第 **11** 期
2006年

萧克：党内民主缺失的教训

我了解的台湾“三农”问题

任仲夷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

七千人大会的现代启示录

中国四大传统文化说

目 录

沉思录

- 1 党内民主缺失的教训……………萧 克
6 任仲夷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关 山

亲历记

- 12 我在高层机关挑起的两次辩论……………朱成贵
18 章伯钧拒绝给刘少奇加罪……………阎秉华

春秋笔

- 20 彭真像读毛主席语录那样读宪法……………俞梅荪
21 长征中的两位总书记……………史 甄
27 石西民谈徐铸成划右派实情……………徐复仑

往事录

- 28 改变知青工龄政策的一封信……………黄 海
31 严文井口述中的中宣部作协琐事……………陈徒手
34 张元济与中国图书馆事业……………越 宁

一家言

- 37 上海社保基金案的初步警示……………周瑞金
39 为什么在中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王幼辉

怀人篇

- 43 六十春秋忆李庄……………燕 凌
50 对父亲徐雪寒的零星回忆……………大 妹
55 往事悠悠忆尚钺……………谈滨若

见闻录

- 58 我了解的台湾“三农”问题……………李昌平 周 婷

品书斋

- 65 七千人大会的现代启示录……………李彦春
71 看人看事我不再简单地相信政治标签
—— 吴象《好人一生不平安》序

古今谈

- 75 中国四大传统文化说……………刘济生
80 古代的城与市……………施 亮

本期执行主编 李 晨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普 李一蠡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袁 鹰 凌 云 龚育之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徐 孔 (常务)
杨继绳 吴 思

执行主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员: 白建钢
秘 书 长: 徐 孔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电 话: (010)68522852 (办公室)
(010)68534879 (编辑室)
(010)68523512 (编辑室)
(010)68532048 (发行部)

传 真: (010)68532569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 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 (E-mail) 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 5.80元

党内民主缺失的教训

萧 克

1958年2月,彭德怀送来一篇文章,征求我的意见。这篇文章是他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三十周年大会上作报告的初稿,文中说:“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 and 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错误的,因为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我对彭总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的说法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感到有必要同他交换一下意见。于是,就给他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提到:“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因为正规化是对游击性说的。当着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胜利的时候,我们处于农村,生产力低和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各个地区产生起来的军队,除了党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的战略战术思想外,其他如编制、装备、供应、作风、制度等等,都不统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全国范围胜利后,我军有全国经济基础(其中有百分之几十的现代工业,而且比重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而逐渐增大)的支援,又有苏联等国家对我的援助,前述情况就基本结束,因而提出正规化的口号,这是合乎历史发展情况的。与正规化口号同时提出的现代化的口号,理由也是如此。”

我又引证了政治协商会议总纲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聂荣臻以及彭本人过去对两个口号的论述,指出:“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是党中央、军委及许多负责同志提出的,他们提出这个口号,不仅是从要具有和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和学术来提

的,而且同时是包括和联系政治内容说的。……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的本身。”

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想把这段时间自己思考的问题,系统地向彭老总谈一谈。那时,党内军内的风气还比较好,可以提不同意见,我也就没有什么顾虑。谁知,这封信在反教条主义后竟成了我向彭老总进攻的罪证,说我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就在我给彭总写信后不久,训总召开了机关四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贯彻中央的“双反”决定,反右倾保守,反贪污浪费,同时反教条主义。会议由我主持。在反贪污浪费的问题上,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我们对全军的训练经费精打细算,把能节约的都节约下来,共核减经费一千二百多万元,这样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

讨论到反右倾保守和反教条主义的问题时,发生了争论。本来,我和训总的几位副部长都想通过这个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一下。因为自从军内传出什么“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等后,沸沸扬扬,我们都认为要从思想上澄清一下。

当时,大家对张宗逊的意见比较大。过去,他对学苏联叫得最响,提出了什么“不走样地学”、“先学后用”、“高学低用”、“死学活用”、“不愿学苏联的滚开”等不实际的口号;而现在他又把学习苏联都说成是教条主义,说学习苏联“学得越多,中毒越深”、“南京军事学院几年来的教学是教条,危险的是继续学下去”,从一个极端跳到

另一个极端,引起了训总许多同志不满。

张宗逊这时已调到总参任副总长去了。考虑到大家对他的意见很多,我们也想把前段的工作总结一下,就请示军委秘书长黄克诚,要不要请他回来听一听?黄克诚明确表示,让他回来,参加会议。

张宗逊回来后,大家无形中把矛头指向了他。现在回过头看,对他有意见转达一下也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把他请回来,请回来后,又不是和风细雨提意见,不利于解决党内的不同意见。

然而,在四级干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事情突然起了大变化。总政派工作组来。他们一到,就表态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工作组组长刘其人(当时的总政组织部长)还宣布说:“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刘又接着说:“彭总说了:‘训总开四级干部会反张宗逊,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张宗逊自己也说,他的思想就是彭总的思想,“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对军委,就是反党反中央。”这种以抽象的推测作根据,层层向上、向下、向旁挂靠,以推测得出结论,根本不是实事求是作风。自从我给彭总写信

后,一直在等回音。我也担心这样直率地提意见,会不会引起他的反感。但他没有找我。没想到现在他表了态,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各地区、各部门争相提出跃进计划,中央就用地方来鞭策军队,说军队落后了,要赶快跟上来,建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用整风的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

会议开始时并没有把反对教条主义当作中心议题,因为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但那时北京的军事机关中,反教条主义的空气已经很浓了。在一次会议上,我听到彭总讲了一段话。他说:“有些话我现在不想说,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上过学,不是学术权威,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我都不如人家”并说,“训总撤了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事权威,我不敢去。”这番带有情绪的话,使我震动,我觉得彭总的话里有话。

军委扩大会从5月22日开始,开了约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的主题,这次军委扩大会开始时发的文件,所批评对象都是×××、×××(当时被批评的人不点名,用×表示)三个字的名字,××两个字的名字。批判的矛头也逐渐集中到我和李达的身上。

6月9日,黄克诚来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扩大范围到师。

6月20日,开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还有列席的438人,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彭德怀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一开始就提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给我们扣上了“军事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

6月23日和29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



萧克

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还活着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讲话的末尾,他还对刘伯承做了不适当的评论。当时,领导会议的人向毛主席反映,说萧克抵抗反教条主义运动,拒不检讨。毛主席还说到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

毛主席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大会先后点了我、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当时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带病来京,一下火车就直接到会作检讨。因身体不好,特别眼病加重,眼压很高,住进医院。

住院期间,刘帅冒着失明的危险写检讨。7月10日,刘帅由别人搀扶着走上讲台。他的检讨,既有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判。他除了迫于压力,更重要的还是想尽快平息这件事,保护一批同志。然而,他的愿望太善良了。因为那时党的生活很不正常。斗争愈演愈烈。我和李达等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并编造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说我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会议还批判我在1958年2月上书彭德怀,是只要现代化、正规化,不要革命化。还批判我主持编写共同条令,是不要“党的领导、民主制度、群众路线以及官兵一致的基本原则”。

事实上,共同条令是军委组织的条令委员会编撰的。编写的稿子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多次讨论通过后,又报送毛主席审定的,毛还作了批示:“萧克同志,三部条令我审阅了。请你注意将有学习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字样。改后即颁发全军执行。”我将毛主席这个批示向彭总作了汇报,并提出:“共同条令是草案,先试行,待试行修改完善后再颁布执行。”彭总说:“草案也必须坚决执行。”然而,在军委扩大会后,训总的批斗会上,刘其人、甘泗淇、张宗逊等人却说:“共同条令是反党反中央,反对军委领导,反对军委正确路线,企图改变我军面貌的纲领。”

这时已毫无民主可言了,我们只能坐在被告



刘伯承

席上挨批斗,没有说话、申辩的权利。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人连哄带扭,诬为大右派,当场摘掉帽徽领章,赶出会场,关押起来。后开除军籍,下放常州。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又要蔡认罪,蔡说我在军队训练工作中没有罪,他们诬我为大右派,是他们有罪。造反派便以现行反革命罪把蔡铁根这位坚持真理的硬汉子,无法无天的杀害了,真令人痛心!(注:枪毙蔡铁根的报告是得到当时南京军区、江苏革委会负责人签名批准的,并非造反派的擅杀)

这是我入党以来在党的会议上未曾见过的事,既感到震惊,也感到痛心。更让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是,他们逼着我承认是“反党”。我在大革命时期就向往党,两年后入党,几十年来,为了党的事业置生死于度外,即便南昌起义失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也从未产生过离开党的念头,而是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党,回到组织的怀抱,即便在长期工作中有很多缺点错误,也绝不会“反党”。

我无论如何不接受这个不合事实的批判。那段时间,我常彻夜不眠,眼望天花板,一直到天亮。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有人对军队教育和训练中的所谓教条主义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把训练总监部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萧克在这次会议上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错误。会后，训练总监部被撤销，萧克被解除了职务。

图为当时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时的情景

从礼堂回办公室时，路程并不远，走到半路，忽觉胸口难受，就蹲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回到家里又吐了不少。

医生见我这个样子，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他们不但毫无同情之心，反而给医生扣上了“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的帽子。

这时，我心里很痛苦。入党30多年了，我还想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还想继续于革命事业，如果就这样死了，岂不冤枉？我想，只要人在，“戴帽子”又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是被打倒的人了，全部承认也不过是打倒。我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两次北伐、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井冈山斗争、长征等，人可以打倒，历史是打不倒的。

我决定作违心的检讨。一个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人，违心地承认强加给自己的诬蔑不实之词，那种

我多次跟他们说：“我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入党的，从入党起，决心永远站在党的立场上。”

但是，在那种斗争的气氛下，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军委扩大会议开了两个多月。彭德怀在总结中给我定性为：“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此前几天，军委已撤销了我和李达在国防部和训总的一切职务。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对我们的批判并没有结束。总政又派甘泗淇、刘其人等组成的工作组到训总领导开展斗争，指定训练总监部组成了新的临时党委，继续对我们进行揭发批判。他们采取专政手段，把预先圈定的所谓“反党宗派成员”，分别隔离、禁闭、监视，威逼利诱，无所不用。

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始终没有承认“反党”。这时，他们就用高压政策，逼迫我检讨。大会批，小会斗，有时连晚上也不能休息。从5月召开军委扩大会到8月，我已经挨了四个多月的批斗，身心疲惫，加上精神紧张，心中窝火，在一次批斗会结束

痛苦是不堪设想的。当时只好这样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要以我毕生的言行来证明我对党的忠诚。

我按照他们的需要写了检讨，才算过了关。

记得检讨交上去后，一次开会见到彭总，他说：“萧克，你这个人经得斗。”我不知他这话是褒义还是贬义，苦笑一声说：“我的检讨还可以根据事实核查。”话外之意是我的检查是否合事实，还可以核查。

那年秋天，彭德怀主持军委开会讨论关于我的错误的决定，我心里是不服的，发言时就说“基本上同意”，这下又遭到批驳。他们说：“你说的基本是指多少？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六十？”黄克诚很严厉地说：“他不服，再开个会研究一下！”我也敏感了，所谓开会是什么意思，不外是加强火力再斗一场而已。我不说话了。当时参加会的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几位老师没有表态，才作罢，那个决定就算通过了。

还有一件令人不快的事，军委扩大会议后，他们指定郭天民担任训总临时党委书记。本来，郭天

民与我们在部队建设、战斗训练等问题上的看法、做法,大体一致,他们却让他来领导揭发批判我和李达。在那种情况下,郭天民只能表现积极,但是,我们的结论刚作完,郭天民马上又成了批斗对象,给他戴的“帽子”与我们的一模一样,而且,他成了我们这个“集团”的“第二副帅”。

直到1959年5月14日,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并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到团及地委,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才算结束。

在运动中,除了我、李达、郭天民外,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十几人都被打成“反党分子”。这些在训练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辛勤工作,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做出了贡献的同志,有的被撤职,有的降职降级,有的降职降级后被送地方安置。特别是对陈绪英处理得更重,因陈绪英在工作组的威逼利诱下,拒绝揭发在军委扩大会中被点名批判的高级领导人的所谓反党活动,他们便说他是坏分子,把他赶出军队,送到边疆劳动改造,使他在地方受到误解,长期被歧视没有安排工作。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仅一年,主持批斗我的彭德怀元帅,又成了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被批斗的主要对象,遭受了极严重的打击、磨难。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像我好意给彭总写信,却成了“反党”的把柄一样;不到一年,彭德怀同志1959年庐山会议上好意上书毛主席,也被说成是下“战书”。过了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样的手段整谭政等同志。至于“文化大革命”,更是变本加厉,登峰造极。

也许是一腔忠心耿耿反而被冤屈的痛苦,使彭总对“左”的错误有了认识,他在被“罢官”以后,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我道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彭起超经总政联系找到我家,对我说,他伯伯要他向我转达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

听到这话,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他既在自责,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

其实,我早就对彭德怀他老人家没有气了。通

过“文化大革命”,我对党内斗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我认为,当时彭总的所作所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左”的狂潮中,很难把握自己的。当时我不是也违心地承认是“反党”吗?

历史毕竟有着自己不可更易的规律。一切颠倒的真伪、善恶、是非,终将会回复它们的本来面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反教条主义运动越来越被证明是错误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我们也向党组织提出对1958年反教条主义处理结论的申诉。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于1978年11月7日发出通知,对当时的结论作了改变。但总政这个结论,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军队这个反教条主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聂荣臻晚年也说过:“向苏联学习,主席讲就照他们的办,就向他们学习……后头反教条主义,把这个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

1980年9月,我曾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一封长信,谈了对这段历史的思考,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认为现在要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必须安定团结,使党的生活正常化。必要的批判斗争,也要从实际出发,绝不可扩大化。过去搞运动,主要领导人有个口头语:“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而“严”是在“矫枉必须过正”的错误原则指导下的“严”,就必然不顾事实上纲上线。政治上、思想上一经拔高,所谓“组织处理从宽”,就是十足的虚伪。这是二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了的。今后对政治情况切不可凭空臆造,或一处出了问题,就举国兴师,经久不息。要分清问题的性质和主流与支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期出问题,就在当地当时及有关单位解决。把过去那种无穷无尽地写大字报、写批判稿、写检讨稿,开大、中、小批判斗争会的时间,去读书学习,搞业务,做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作吧!

总结这段历史,正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本文选自《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本文有删节) (责任编辑 吴 思)

任仲夷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

关
山

自 2001 年 1 月认识任老至 2005 年 11 月 15 日他仙逝，此间我不时会拜访先生，记得住的，有十五次。记忆中，先生晚年最关心的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我们聊得最多的话题，即使有时候聊其它话题，兜了一个圈，还是回到这个他最感兴趣的话题上。

第一次谈话，我就意识到这位老人不简单。我从未见过这样一个耄耋老人，头脑那么清醒，思维那么活跃，语言那么有哲理。况且，这是一位有近 70 年党龄的高级干部，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沧桑的革命生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先生的思想都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我有意识比较系统地了解他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

以我有限的接触和观察，我感到任仲夷属于那种一辈子都有理想主义情怀又富有理性的老共产党员，生命不息，思索不止，即使退出权力舞台，也时刻关注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现把我所知道的他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综述如下：

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必然和紧迫的

任老这一思想这些年来是一贯的，从来没有动摇过。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的观点：

一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必然要求。他认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就无法深入，就谈不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他完全认同小平同志的主张：“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任老说：“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就没道理。体制不顺，终究会出大问题。”又说：“什么叫协调发展？我的理解不仅是指经济内部的各个成分、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失调’，更重要的还必须使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相适应。两者即使不能同步，政治改革也不能过于滞后。政治与经济不相适应是最严重的‘失调’，就谈不上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即使经济一时上去了，它还是会掉下来的。政治改革跟不上，最终还会出大问题。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其实，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发展的必然结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应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任老说，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是计划经济时那一套，因此，必须启动政治改革，实现“计划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使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二是认为当前的政治改革体制严重滞后，“这是当今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所在”，是国家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任老说：“邓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十八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彻底解决腐败蔓延的社

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滞后。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的经济思想可以说是基本上得到很好的贯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一天一天有进步,不断有新的突破。但政治改革没跟上。”“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应该同步进行。如果不能同步进行,为了避免乱,可以走得稳当一点,但不能滞后。现在早已经滞后了。有一位要人在国外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是同步进行的。’这个判断我不敢苟同。要有勇气承认已经滞后。不好说严重滞后,因为这么说可能有人听着不舒服,但也决不是‘有点’滞后。”这些话集中体现了任老的一个基本观点:当今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

三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反腐败的迫切需要。他多次对我说过,目前这种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这是当前腐败蔓延的根本原因,这种体制下,清官很容易变成污吏,好人变成坏人。他对我说:“我们现在是自己监督自己,如同用自己的左手来监督右手,是远远不够的。”“同一身体、同一体制、同一利益,谈何监督?”“吴南生(他的老友,原广东省委书记,深圳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作者注)说:‘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我认为有道理。”

四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宜早不宜迟,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任老对这个问题有清醒而坚定的认识,一直到他去世前还关切、忧虑这个事。他常对我说:“政治体制改革宜早不宜迟,早改要比迟改好,主动改要比被动改好,上下结合、体制内与体制外互动最好。”他还说:“政治体制必须从根本上、体制上去理顺,切忌用高压政策压住、捂住,否则,终究会因为一件小事,引发积压已久的社会矛盾,后果不堪设想。”他认为要正确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认为稳定是动态的稳定,只能用改革来求稳定促稳定,舍掉改革来求稳定,那无疑是“缘木求鱼”。他说:“稳定压倒一切,最后就压倒了稳定。”

五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最需要的就是勇气。他非常赞同小平同志改革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的思想。他说:“过政治改革这一关一定要有勇气、胆识,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来。小平南



任仲夷

巡就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经济改革要有这样的勇气,政治改革更要有这样的勇气!”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得民心顺民意的好事,会得到中国多数人的拥护,有这样的民意基础,改革不会乱。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民主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任仲夷的回答非常明确:民主。他说:“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的政体,这是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时向人民庄严的承诺。这是中国共产党还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任仲夷在这里所说的民主是“具有普世价



1977年任仲夷(正面右二)陪同邓小平视察辽宁

质和科学的成分就是权力制衡,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他说:“现在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他还强调说:“在和平环境下,对人民造成伤害的不是杀人的强盗,也非不可抵抗的天灾,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针对一些人对他的观点的非议,他对我说:“西方民主制度的这些形式我们不需照搬,也照搬不了,但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原则恐怕不能违背。”4、竞争政治,优胜劣汰。他说:“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

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是真理。”又说:“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常识,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垄断必然带来腐败。政治上有竞争,执政者就不得不为民办事,不得不当‘人民公仆’,不然你就会下岗,淘汰你,这是保持先进性最好的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没有选择就会腐败,绝对的权力就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远的不说,改革开放的实践就是明证。过去我们实行计划经济,谈不上竞争,结果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我们搞市场经济,经济立上去,为什么?就是有了竞争,有竞争就有进步。经济上需要竞争,政治上也需要竞争。”“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他非常赞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的提法:“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人民选择的结果。”5、依法治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他说:“依法治国,只有一条,对于法律,不管是谁,大小官员,平头百姓都得遵守,谁违反了,都要依法制裁。”6、保护人权。他认为保护人权是民主制度的标志,没有人权保护就没有民主。他尤其重视言论自由,认为这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他说:“什么叫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就是‘人人都说话,大家有饭

值”的“人类政治文明”的民主。在任老的眼里,民主是类同的,专制则各有各的不同,也就是说,天底下的民主都是大同小异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人类创造的文明。他认为,民主有以下的共性:1、主权在民,由民作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任老说:“毛主席曾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群众给的。宪法也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又说:“民主是由民作主而不是为民作主,权为民所授,要保证人民有权以有秩序的方式选举官员、罢免官员、监督官员,使各级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上司负责。”还说:“普选没什么不好,只不过是时机还不成熟而已,小平不是说了吗,五十年后中国也可以搞普选。”2、多数决定,保护少数。他认为民主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同时要保护少数,防止“民主的暴政”,因为多数的意见不一定都是对的。他说:“‘服从多数’与‘保护少数’是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两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在行动上必须按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办事;另一方面,应当保护少数人,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能对他们歧视和排斥,更不能扣上‘敌对’的帽子进行打击。”3、权力制衡,互相监督。任老主张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也可以参考可以借鉴。他解释说:“‘三权分立’的本

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是真理。”又说:“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常识,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垄断必然带来腐败。政治上有竞争,执政者就不得不为民办事,不得不当‘人民公仆’,不然你就会下岗,淘汰你,这是保持先进性最好的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没有选择就会腐败,绝对的权力就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远的不说,改革开放的实践就是明证。过去我们实行计划经济,谈不上竞争,结果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我们搞市场经济,经济立上去,为什么?就是有了竞争,有竞争就有进步。经济上需要竞争,政治上也需要竞争。”“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他非常赞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的提法:“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人民选择的结果。”5、依法治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他说:“依法治国,只有一条,对于法律,不管是谁,大小官员,平头百姓都得遵守,谁违反了,都要依法制裁。”6、保护人权。他认为保护人权是民主制度的标志,没有人权保护就没有民主。他尤其重视言论自由,认为这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他说:“什么叫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就是‘人人都说话,大家有饭

吃。”又说：“言论自由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非常重要，你想想，一个人不犯错误可能吗？重要的是能及时把错误公开，接受监督从而改正错误。这样一个人就可以在改正错误中成长并强大起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亦是如此。如果我们国家真正做到了言论自由，就不可能发生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人间悲剧。现在有人一提‘言论自由’就说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就是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这些人不是无知就是明知故犯。只要读过马克思著作的就知道，第一卷第一篇就是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通篇都体现了言论自由精神。”他认为，言论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权利，现在关键是要遵守宪法，落实宪法。他还认为，透明公开也是民主制度的标志。

上述就是任老概括出来的民主的共性。他说：“当然，中国实现民主是一条漫长的路，要一步步来，但目标要清楚，尤其是官员，头脑要清醒，心中要有数。”

三、政治体制改革要走改良主义的道路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选择一条怎样的道路？任仲夷思虑的答案非常明确：走改良主义道路，要改良，不要流血的革命。

2005年8月31日，任老让秘书打电话约我谈话，谈话结束后，我们一起步出大厅，突然，他停了下来，明亮的双眼凝视着我，拿着拐杖拄着地板，一字一顿语气坚定地对我说：“我是一个坚定的改良主义者！”这是他留给我最后的话。几天之后，他就住进了医院，病情急转直下，延至11月15日与世长辞。

现在回想起来，最能代表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恐怕就是，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化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这是改良，不是革命，是社会进步代价最小的最佳选择。从这个角度讲，邓小平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五十年不变也是有道理的。

任仲夷的改良主义思想，概括起来，大概有如下几个观点：1、只有改良（改革）才能救中国。中国既要发展又不能乱的唯一出路就是坚定不

移地改革，把改革进行到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我们不坚定地进一步深化改革，矛盾将越积越多，以致积重难返，后果不堪设想。他说：“我不赞成老百姓造反，因为造反是没秩序的，必然造成社会的混乱，生产力的大倒退，全民族的大灾难，但如果固步自封、不思改革，积压矛盾，就会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2、循序渐进，依法实施。他说：“政治改革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步步推开，一步步扩大，一步步深化，保证改革能有序地进行，不能没有章法地一哄而起。不能指望一个早上就解决所有问题，不能急躁冒进。”3、“只有中国共产党牢牢地把握改革的主动权，这样的改革才是成功的有意义的改良。”他认为共产党应该在它还能基本控制局面的时候，在软力量和硬力量都相对强大的时候，与时俱进，主动地改，积极地改，果断地及时地向社会让步，才能掌握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主导权、主动权，才能获得新生。只能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用民主、法治的办法去解决，退回去是没有出路的。4、政治改革的最佳途径就是“内外结合、上下互动、有序改良、和平转制”。他最担忧的就是前怕狼来后怕虎、优柔寡断停滞不前，错失改革的良机，使体制外改革的力量超过体制内改革的力量、民间的力量超过政府的力量、下层的力量超过上层的力量、激进的力量超过理性的力量而酿成暴力革命。他一直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利益的调整，有时矛盾可能会很尖锐，但是无论多尖锐，都要坚持非暴力。要充分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不能乱，一旦天下大乱，什么都谈不上，要大造这个舆论。

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策略、步骤、方法和措施

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采用怎样的策略、步骤、方法和措施？任仲夷有如下几点主张：

第一，大胆地“学习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文明。任仲夷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要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学习借鉴国外（尤其是西方）先进的政治文明。”他说：“政治就是管理，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虽然民主制度源于西方，

却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具有普世价值。他说:“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现在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达,生活富裕,是他们总结了许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的结果,这是人类的文明,肯定有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参考、借鉴。”任仲夷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专制,缺乏民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需要好好地向西方学习。因此,他反对用简单的“西化”、“自由化”这种帽子整人。他对我说:“简单地批‘西化’难以服人,马克思是哪里人?科技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我们的衣食住行有多少只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又说:“自由有什么不好?马克思不是说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吗?现在西方人认为共产党不让人自由,这不对,当初我们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老百姓争自由要民主,我参加革命的初衷也是这个。”

第二,开放言论,集思广益。他认为这既是政治改革的先声,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政治改革涉及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涉及每个人的利益,必须让每个公民参与,不能搞黑箱操作、闭门造车。因此,必须开放言论,公之于众,让全民参与讨论,集思广益,共同设计蓝图,上下沟通,共同推进。针对目前意识形态控制思想的弊端,他批评说:“我们的意识形态方面还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期那一套。八十年代,报纸传媒还是活跃公开的,政治改革不像今天那样敏感,是可以公开讨论的,经常能看到和听到不同的声音。而现在,往往是有一点出格的言论,就禁书、封报、拦网。这是解放思想还是禁锢思想?是启蒙还是愚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政党、一个领导人,如果听不到批评的声音,是很危险的。小平同志就说:‘革命政党最怕的是听不见人民的声音,最怕的是鸦雀无声。’况且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写进宪法里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央不是反复强调要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吗?如果我们有法不依,知法犯法,就谈不上法治。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统治的社会绝不是民主的社会,也不会长治久安的。”

第三,透明公开,阳光政治。这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我向他介绍了北欧透明公开的阳光政治,任仲夷对北欧的做法十分赞赏,认为透明公开既

不姓“社”也不姓“资”,我们完全可以搬过来用,并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在技术上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也体现了任仲夷接受新事物、新科学技术的高度敏感性和洞察力。

第四,办“试验田”,搞政治特区。任仲夷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要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搞“政治特区”,办“试验田”。他说:“不仅要搞经济特区,而且也要搞政治特区。政治改革必须审时度势,先做试验,突破一点,再行推广,就可以稳步前进。可以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领域先搞试验,取得经验,然后推广。比如能不能选一个县、地级市甚至一个省,例如海南省,办政治特区,搞民主选举。就是试验失败了也不要紧。失败是成功之母嘛?我认为只要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稳步前进(先做试验就是为了稳嘛),是出不了大乱子的。”

第五,结合国情,重视启蒙。任仲夷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专制,并且根深蒂固,需要民主的启蒙。没有公民意识的提高,政治体制改革也不会成功。因此,他主张开展公民教育,补上这一课,让老百姓都知道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民主是什么,怎么样搞民主。

第六,“正本清源,以史为鉴”。任老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对马克思主义要正本清源,要弄清楚“真经”是什么。要弄清楚哪些是马克思原本的东西,哪些是歪曲和强加到马克思头上去的东西,还马克思主义本来的面目。同时,对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要立足于当代,弄清楚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过时了,哪些要校正,真正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二是对历史要正本清源。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任仲夷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就能看得更清晰透彻了,要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风云变幻、成败得失中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的大势,找准我们前进的道路,敏锐地捕捉和把握机遇。他一再说,对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尤其是建国后的历史,都要实事求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他说:“我们可以宽恕历史,但不能忘记历史,更不应歪曲历史。如果对历史问题、对历史人物、对历史事件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怎么以史为鉴,你写的历史都是错的,那么照的镜子不是哈哈镜?能照出真相来吗?能以哈

哈镜为鉴吗？一个不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民族是没希望的。”又说：“建国后，不但是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犯了大错，就是改革开放后，我们也有失误，我们都要实事求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只有从这些错误中汲取教训，我们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他又说：“但是我们做得很不够。（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党的两任总书记，尤其是胡耀邦同志，为改革开放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但有关改革开放历史的宣传报道中鲜见他的贡献，这样的历史怎样向后人交代？”

第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任老非常赞同小平同志这一思想，认为政治改革一定要自始至终坚持这一原则。他在我的面前多次引用小平同志的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来批评那些形形色色的“两个凡是”和“左”的言论。他极度反感个人崇拜，他说：“我们对任何人都不能搞‘两个凡是’。”他认为我们党历史上犯的错误绝大多数都是“左”的错误，因此，我们今后的政治改革要特别注意防范“左”的干扰。

上述就是我所知道的任仲夷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我认为，这是任老一生勤于学习，独立思考，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结果，既平凡又宝贵。说它平凡，是因为它立足现实，基于历史，符合逻辑，只要实事求是，不难得此结论，甚至可以说，这些都是常识，并非重大理论创新，事实上不少人有类似的认识，只是不想说不便说不敢说而已，说它宝贵，是因为这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的“世纪绝唱”，是他刻骨铭心的经验



2004年底，任仲夷（中）、田纪云（右）与杜导正在一起交谈

体会。我认为，任仲夷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具有世界眼光和穿透历史的洞察力，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先生是“五·四”时代出生、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与那些吃不饱穿不暖活不下去揭竿而起的革命者不同，先生有文化有知识且生活条件不错，他跟我说他参加革命的初衷就是为民主、自由和民族的复兴。作为一位有近7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辈子，对党自然有很深的感情，也有报恩的情结，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但毫无疑问，先生是一个不忘革命初衷的人，一个能摆脱既得利益羁绊的人，一个能遵从良知召唤、敢讲真话的人。他不像一般政客那样伪善虚伪、投机拍马，保留着罕见的坦荡、无私与勇气，正如他所说：“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先生对党始终保持理性的忠诚，义无反顾地让党性服从理性，利益服从良知，理论服从实践，谬误服从真理。一次次说这些“不合时宜”的真话，一次次为改革开放大声疾呼，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任仲夷的人格比思想更伟大！

（责任编辑 杜晋 吴思）

我在高层机关挑起的两次辩论

朱成贵

发起以钢为纲的辩论

从1952年成立国家计委开始，我一直在办公厅从事会务秘书工作。由于我有速记专长，1957年被抽到全国人代会会务组，荣任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的记录任务。从担任委务会、党组会以及专业计划方案研讨会会议记录工作中，了解到钢铁翻番高指标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特别是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及人民公社化以来，城市粮油肉菜蛋等副食品供应紧张，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日趋下降的情况，我十分忧心，亟盼1959年的庐山会议能扭转经济工作“左”的倾向。然而会议不但未纠“左”，反而在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我心里想不通，感到很不安。经过思考和搜集相关资料，我试图从计委业务角度提出建议，抵制庐山会议的不良势头。我写出两篇文章：一是《来一个以钢为纲的大辩论》，列举苏联历年钢的增长幅度和相应条件，对比中国的增长幅度，说明按高指标要求，将加剧严重失调和紧张局面。农村、农业和农民生产承受不了工业跃进带来职工人数和城市人口猛增的压力。我又写出《城市人口、职工人数的增长必须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的论文。两篇文章于1959年8月10日和8月17日刊载于计委办公厅编印的内部刊物《经济研究资料》。有人发问：中央已作出反右倾的决定，正在批判“右倾”之际，你挑起这样的大辩论，这不是跟庐山会议决议相对抗吗？果然，这篇文章引起当时中央五人经济小组内部刊物《经济消息》的注意，将前一篇文章摘要刊载在《经济消息》的第四期上。不久，我成为“顶着风”、“边反边犯”，系统大量地散布右倾言论的典型，从支部、总支到全机关党代会上，经过重点批判，被定性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指责党中央毛主席的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经过大张旗鼓的批判，对我的错误性质作了结论，调离机要岗位，另行安排工作。

发现粮食数字的秘密

1960年2月我下放到陕西省延安县李渠公社阳山生产队劳动锻炼。下放干部和农民，在食堂吃的一锅饭，在地里干的一样活。这里继续坚持大跃进开办的公共食堂。干部和社员每天一斤粮食定量，普遍吃不饱。中午一顿糠窝窝，早晚两顿稀饭。“五一”之后，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公社党委要求下放干部保证食堂不散灶。没有粮，挨户动员说服，发现有粮，登记后将粮食送到食堂。而我在执行时，却是挨门挨户“说服动员”不成，就翻箱倒柜搜粮。

头一户是在老乡灶锅底、炕洞里掏出用层层纸包的四五斤湿潮杂面，刚想登记后送到灶上时，一位与我母亲年龄相仿的老大娘，抱着我的腿哀告说：“后生哩！这点杂面留给娃娃、老汉吧！”我和参加搜粮的生产队干部、民兵排长等商议咋办，我提出要让群众自愿，他们说：“从合作化到公社化，大办食堂，上级派下的要粮、要鸡、要猪等项任务，要讲自愿什么都搞不成。这家的不忍心收，谁家的也不该收，当不了就是散灶？”听了后，

我态度果断起来,说服老大娘体谅我们:您一家给挡住,谁家的都收不成了,还是听毛主席的话,响应粮食到堂号召吧!就这样,我成了这次挨门挨家搜粮的“能手”。这样,全村粮食彻底到堂不到千斤,食堂仍然难以维持,社员就靠刚产出的红豆角、野菜糊口。

我们下放干部小组八个人,我平时劳动最卖力气,最吃不饱,也学社员们收工时,采拾野菜,装满上衣的两个口袋。到吃饭时,别人排队打饭,我却忙着洗菜,用小刀切碎,放在饭钵子里,到锅灶前,领了两勺玉米渣稀饭,洒一把盐,吃得满香。不料在一次小组会上,有人说:老朱干什么那么认真,表现挺好,可是吃饭也太认真啦,表现特殊。次日早饭前,我上茅房时摸到准备早饭吃的一衣袋野菜,想到前晚因为吃饭挨了批评,便赌气把这袋苦菜抛到茅坑中。没几天,我的腿浮肿得迈不了步。伙伴们关心,不让我劳动,留在窑里休息。社员们听说“老朱饿浮肿了”,他们没有把我搜粮干下对不起他们的事放在心上,反而提议“看看老朱”。大队支书和队长买了饼干慰问我。又张罗安排社员用手推车把我送到延安医院。打了点滴,特别是吃上了两顿炸酱面之后,我精神起来,也能迈动步了。当地干部和群众如此厚待我,加深了我对延安人民的深厚感情。

在我挨家搜粮时,发现家家都有六七个或十几个柳条编的大粮囤子,每个可装2石至4石粗粮。我问:“没打下多少粮,为啥有这么多粮囤子?”他们说:“是合作化前粮食多,有的囤子是老先人留下的。”我问:合作化以后每年分来的粮能装多少囤子?他们说:“一到秋冬打场时,先完成送交公粮、购粮任务,分给社员的,顶多装满两三个囤子,有的吃到春节后,就要吃返销粮。”随后我访问李渠公社,一位领导同志说:“你们不明白粮食统计数字是咋回事。每年秋季不等公社报测产产量,县委早就定出各个公社的产量,公布下来,比实产高出一半甚至成倍,公社书记怕批‘瞒产’,只好领回来,开管区、大队干部会,



2006年8月,作者(左四)访1960年下放劳动的延安县李渠公社阳山生产队,和干部、社员合影

也是照样往下‘硬估’。产量高估,公购粮交过头,就挤了口粮和饲料。”我听到后不寒而栗:合作化一层层命令向下压,粮食产量又一层层向上谎报,这样下去,给党和国家的决策带来的隐患,多么不堪设想啊!

致党中央毛主席的第一封信

1960年底,结束延安劳动锻炼回到北京,得悉我早已被列入编外的待分配人员。当时经济形势异常紧张,人们越来越看清庐山会议不纠“左”而反“右”所带来的恶果,但谁也不敢口吐真情。我是黑龙江人,准备要求到东北农村基层,把在延安看到令我惊诧困惑之事,到东北再看个究竟。这时办公厅领导提出让我随宋平同志到西北局工作,我有所犹豫,最终还是服从了分配。1961年3月到中央西北局计经委办公室从事资料研究和会议记录等秘书工作。

1961年,中央称为“大兴调查研究之年”,党内外乃至报刊媒体的民主气氛有所活跃。我没有机会下去作实地调查,却可以从资料室内部文件中看到一些地方农村贫困饥饿的困境,看到一些社队实行分田到户和单干。有的领导同志还向我发问:“小朱,你在延安农村干了一年,有什么

看法？”各地的信息，机关领导和一些同志的提问，联系在延安发现合作化后农民粮囤子空着，我在学习经济工作“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形成一条思路：农业生产关系，农村政策有没有一个调整问题？我越来越把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甚至单干看作是扭转形势的必由之路。

这时，在东北家乡的老母亲（68岁）由于长时期营养不足病危，我不远千里来到她病床前，她拉着我的手说：“成贵呀，我总想吃几块肥肉。”我走遍全镇未能买到。在她离世时，我痛哭：“养儿一回，连买一块肥肉的孝心都未尽心！这是为什么呀？！”悲痛唤醒我：许多闹粮荒的地方，不知有多少缺乏营养的老人和婴儿病死饿死？我不能无动于衷，要为千千万万饥饿的人们着想，设法让党中央毛主席听到他们的呼唤。

196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份简报，提到广西各县干部会上，“公开主张单干或包产到户的占1/4，有的县超过半数以上，没有公开表示的还不在此内”。简报的小标题还标出《主张单干的种种谬论》。

1962年4月14日，我写出了呈寄党中央毛主席的第一份意见书。一开头就对中监委简报所列“主张单干的种种谬论”明确表示：我不以为是“谬论”，可能是个刚刚开始辩论。我分析说，一些地方集体经济不能巩固，农民积极性不高，粮食减产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在于“五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平调风等）或工业高指标的影响，而在于急于求成地全面实行集体化，违反自愿原则。我还从理论和路线上剖析，按生产关系变革适应生产力性质原则，过早过快地全面集体化与生产力的要求不符，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相当长时间”、“逐步”的要求不符。为扭转经济形势，扭转农村、农业、农民面临的困境，我明确主张包产到户和多种经济成分应继续存在。

挑起第二次辩论，再次给毛主席写信

1962年4月14日致党中央毛主席的第一封信发出后，时过两个月未见动静。1962年6月16日，我向党支部提交了《来一个允许包产到户

的大辩论》的建议信，摘要表述了致毛主席第一封信的基本观点。文章又从理论上辨析“什么叫过渡时期？”讲述生产力发展的现阶段，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多种经济成分，搞“青一色”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同相当长的过渡时期经济规律的要求相违背。信中还为自己的观点主张可能带来的后果郑重表示：在此关乎亿民兴衰的关键时刻，不该一事当前先为个人着想，要为饥饿乏弱的人民着想。

1962年7月，西北局计经委总支组织学习讨论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改草案，分一般干部和司局级干部两大组，我本应在一般干部组，但通知我参加司局级干部组。头一次会议一开始，主持人直接点了我的名：“据说朱成贵同志有些见解和看法，现在农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可以畅所欲言地谈一谈。”我意识到我的意见信，没有受到正面肯定和支持，很可能是抓我这个典型，展开辩论与批判。我在第一次发言中，不加隐讳地摆明自己的基本观点和主张。此后，从七月中下旬到九月初，历经两个多月多次的辩论和批判，发言的政治分量和温度一次比一次高，到会的计经委五十余名正副局级干部，大部分人都根据我的观点做出了很有针对性的批判发言。列举集体经济办得好的社队典型，或粮食增产的地方和年份，说明集体经济的优越，对农民积极性不高和粮食减产的原因，强调是自然灾害和干部作风造成的，把包产到户的主张认作是倒退到单干道路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意见，都改变不了我先前的观点。我在辩驳中说：“农民劳动力的付出，粮食产品的分配，都离不开商品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既然是商品，就该是商量之品（听者为这一新鲜之说有惊有笑），不应该成为上交之品、命令之品。排斥等价交换对待劳动力的投入和粮食分配，农民是接受不了的，这是农民出工不出力造成粮食减产的症结所在。”针对辩论和批判中提出的观点，我又综合整理出《关于两条道路问题的争论》一文。1962年7月22日，我发出了第二封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见信。

大辩论的收场

1962年9月初，最后一次的辩论批判会，为

集中辩明粮食减产的原因,我根据在延安获悉粮食产量数字的真相,把上层机关夸大的虚假数字,设作真实的加以换算:先求出西北五省区从1956年到1961年各省区粮食总产数,然后减去农民上交国家公购粮留足农民口粮、大牲畜饲料和种子,剩下的余粮按全区当时农村总人口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拥有余粮400多斤,大大高于合作化前的平均数200多斤。如果这些粮食是真实的物质存在,试问:农民有了留足的口粮,为什么会大面积地发生口粮不足、挨饿、逃荒?留足了牲畜饲料,为什么会发生全区近一半(10万)的大牲畜死亡?如果每人平均实有储粮400多斤,为什么农民家庭副业养猪养鸡大幅度下降,城市肉菜蛋的供应为什么这么紧张?对比合作化前,如果粮食生产确实不如合作化以后的产量高,为什么那时没有发生大牲畜的大批死亡和城市副食品的供应枯竭?在作出这些分析之后,我当场质问统计局长:“您说说增产的那么多粮食弄到哪里去了?我们手头上的国家统计数字有没有虚报浮夸?”不但这位局长闭口无言,在场的同志也都愕然无声。这时,我更加明确表示:“包产到户,单干,实践上要正视,理论上要承认,政策上要允许。最后,主持会议的同志宣布:“朱成贵同志经过几次会议大家的启发帮助,观点和主张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发展了,态度也越加强硬了。鉴于各种意见大体都摆出来了,学习讨论会就告一段落。下一步再按中央文件精神自行学习和研究。”自此,我同计经委50余名司局级干部的舌战,以暂时还做不出谁对谁错、谁胜谁负的结论而告结束。

辩论之时,机关正酝酿职工精简下放,我申请调回东北老家从事农村基层工作。西北局组织部给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商调函得到回复,同意我调到老家黑龙江省克山县工作。

写出论文《继续完成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1962年9月16日,我又以《继续完成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为题写出一篇近3万言的论文,基本内容是:按生产关系变革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原理,结合中国国情的实际情况,社会主义

过渡阶段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不容忽视,不可逾越;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具体剖析粮食产量的实际情况,对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发挥与效果,以及农民和基层干部思想觉悟要作切合实际的估量;农业生产关系组织形式要按不同地区不同条件,实行多样化的对待。这篇论文抄清一份,正式交给了党支部。与此同时,我不顾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发表,就几个月的辩论写出《保留个人意见》的书面报告,于10月12日正式交给党支部和局机关党委。

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公布后被大张旗鼓地批判

1962年9月27日,要写的文章和报告都交了稿,调动手续业已办完。10月13日正准备动身时,机关党委和支部通知我:“回东北的调动手续不要办了,留在机关学习十中全会会议精神。”我心里一下凉了大半截:“一定是出了问题。”果然全机关听西北局领导传达八届十中全会文件精神的党员大会,支部书记向我说:“你不参加。”尽管先前有了“豁出来”的准备,但突然没有资格参加党的会议,还是不痛快。

根据局机关党委的布置,计经委总支党员大会上,在传达毛主席关于形势、阶级和矛盾问题的讲话时,联系阶级斗争形势,点了我的名:坚持“包产到户”和单干,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代表地富资产阶级利益,疯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自此,从支部到总支连续召开数次批判大会。后来又放到西北局全机关数百人的党员大会上,作为全机关“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典型,进行重点批判。

我个人虽然有挨批的足够思想准备,可是在西北局保育院工作的爱人却分担了莫大的委屈和痛苦。此前,她曾被保育院认定为工作表现最积极的教养员(教师),常常利用休息日整刷班内教室桌椅,自制一些玩具和教具,博得家长们的好评。《西安晚报》的记者根据她的事迹,写出新闻报道稿,听说我正在受批判,撤了稿。她在全院保教人员会议上遭到批评质问:“你爱人写的一些什么,你能不知道?知道了为什么没有制止,你跟他划没划清界限?”爱人回到家里又再一次

为“划不清界限问题”而委屈和气愤：“我上一次被你牵连上，跟着受气，现在又这样坑害我。跟你这样人一起过，总是划不完的界限，受不完的气，遭不完罪！”然后提出和我离婚，我只好耐心解释求其谅解。

1963年2月14日的一次支委会，鉴于我承认自己的观点主张是全面攻击和否定了党在农村的政策和路线，鼓吹实行单干和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等，提交支部大会正式讨论通过对我的处分。1963年5月21日，机关党委正式批准计经委总支的处分意见，认为朱成贵同志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可在登记党员时，按照不够党员条件加以处理”。

二次下放延安

1963年6月29日，计经委总支和人事处正式通知我：因为你犯了严重错误，决定把你下放到基层去接受改造和考验，地点是延安地区安塞县。

1963年7月13日，我和爱人携三个孩子乘着一辆胶轮马车到了安塞县。组织部的同志介绍了县社概况后，把我俩的工作安排在离县城较近的真武洞公社（徐家沟）。公社院内共有十座用大小不等的天然石块箍起的旧窑洞。据说延安时期，中央西北局曾在这里住过。刚离当今的西北局，又到了老西北局，难得如此妙遇！

公社干部除留一名文书外，一律下农村蹲点包队，每周或两周按公社通知回公社集体汇报工作，研究下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刚到公社，我看到的头一份文件就是以县长胡永清名义发出的纠正和查收“小自由”地的命令。头一次公社干部会就是布置收“小自由”地的任务。我参加数次下乡汇报会后，了解到几点情况：一是收“小自由”地的任务很艰巨。到一个生产队，队干部和社员一个心眼，让你没法摸到底细。即便公开了具体地片，秋后能否一律收到队里，也靠不住。二是地主富农分子表现不轨，有“反攻倒算”散布反动言论现象。三是封建迷信、赌博和外出“投机倒把”弃农经商等活动程度不同的反复发生。四是部分生产队领导班子涣散，

内部不团结，干群矛盾多，有的“撂挑子”不干，有的争权抢着干。公社把这些概括为“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各种表现。

从1963年10月到1964年10月，我连续参加了沿河湾、高沟口两个公社的社教（四清）工作团，县领导指定我为工作团的文书，在团部承担会议记录、编发简报、起草报告和讲稿工作等。有时还派我到问题较多的生产队，协助工作。1964年秋至1966年秋，我从四清工作队回到公社，承担蹲点包队任务。全公社有20个大队，120多个生产队，我先后下过6个大队、20多个生产队。所到之处明显看出普遍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工分计酬上的强劳好劳不多赚，粮食分配上劳力多、工分多不多得。这样就更加助长了脱离集体另找门路的倾向。要么不出工，偷开小片荒（即“小自由”地），要么出工不出力，省下力气收工后到自留地和“小自由”地里大卖力气。妨碍农业生产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广种薄收，宜林宜牧的山地都种了庄稼，挤了牧业，出现牛羊越少，越没有粪肥，产量越低，越要搞广种薄收的恶性循环现象。加之，一年四季过分强调搞农田基建，大部分劳力都摆在修梯田、打坝上，挤了积肥、造肥、送肥所需要的劳力。一些农田建设工程，是在群众想不通的情况下进行的，质量不高，刚修起的梯田，要么倒塌，要么因为伤了表土而减产。

以上问题都被看作是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问题。别人下去，处理不好，可以过得去，而轮到我的头上，就是考验我过去的观点是否转变的问题。我自己也曾向组织保证一定在行动上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和政策，决不另搞一套。因而我确实不折不扣地实施“大批促大干”，在工作中坚持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和“三过硬”（抓两条道路斗争过硬、生活吃苦过硬、劳动吃苦过硬）。

后佛店沟是“小自由”地泛滥较多的队，在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协助下，经过深入摸清小片地的地点，把所收获的庄稼（大部分是谷子、糜子）全部集中到集体场院，集体打粮，集体分配。我除了天天参加修梯田劳动之外，还亲自到场院，亲自查证粮食到库。为了自始至终抓到底，防备“玩鬼”，我协同队长和会计，按以人定量的口粮标准算出基本口粮分配方案，一斗一斗地把

粮分到各家。一直抓到当年腊月二十三。由于即抓实事,又注意做思想工作,除了“小自由”地种得多的社员不那么高兴外,多数社员,特别是参加集体劳动较多的社员比较高兴。

公社领导认为我是最先过硬地实现收回“小自由”地的一个榜样。此后到其他队,对于同类问题,以及逃避参加集体劳动,外出搞副业,参加封建迷信,搞“投机倒把”和赌博的,只要让我掌握了实际情况,都分别作了严肃处理。特别是对于领导班子涣散,干群关系矛盾较大的白家沟、白家营、张家砬、李家沟、前宋庄等队下的功夫较多。

尽管工作不遗余力,方法上千方百计,但一些队有我在的时候局面较正常,离开之后,大多又有反复。当时提倡把领导班子工作做好,实现“不走的工作队”,实际上“人一走,什么都走了”。我意识到:讲革命化,讲突出政治,意味着对每个队干部、每个农民都要求达到共产党员的觉悟水平,既不怕吃苦,又不怕吃亏,能毫不计较酬地为集体出力,这样的先进分子是有,但是为数极少。这是我内心的思考。我仍然坚信农民的劳动价值,得不到等价回报,是粮食增不了产的关键所在。我一边老老实实接受“左”的考验,也一边观察和考验着“左”的政策,为什么行不通。

县、社领导和一般伙伴们,虽然知道我是下放改造的干部,多数都能一视同仁地善待我。下到农村所到之处,公认我什么苦活脏活都能一样干下去,什么粗糠杂饭都能一样吃下去。县委根据公社领导和群众的反映,于1965年9月向原机关中央西北局送交了我两年来表现的报告。

1966年秋,文化大革命烈火已经烧到了安塞县。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对我“老账新账一齐算”,经县革委批准,作为重点清理对象,背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牌子,在公社干部会、全公社和全县群众批斗大会上,多次被激烈批斗,身心倍遭摧残,后期下队巡回劳动待处理。1969年秋季后,县革委明文通知“解放”我,继续蹲点包队。

1975年秋,家中出现不幸。“文革”时,我遭到数次批斗,爱人刘凤琴分担忧愁,“往后这个日子可怎么过呀。”于是积忧成疾,常常神志不正常。我恢复正常工作,继续下农村,留给她的

沉重的家务负担,她的病情恶化为精神分裂症。县医院难以治愈,我曾领她去西安医治,回来后仍不时复发。要么哭个没完,要么笑个没完,有时无缘无故地打骂孩子。鉴于家庭的困苦,我向组织上申请返籍到爱人老家黑龙江省五常县。

1976年3月15日,县里派汽车送走我们全家。汽车沿着延河行驶,没觉出怎么快,已经到了宝塔山下,我感慨万千:在陕北的十四年就这样结束了,回到东北,又是一切从头做起。这是我大干的地方,这十多年到底有多大变化?除了县机关所在地增加几处新建的办公窑和汽车站、电影院,农村的羊群照样没有增加,荒山、荒地开不了,农民吃糠的日子仍旧没结束。农村的许多矛盾纠纷,一直当作阶级斗争,一抓再抓,一再反复,抓不完的抓。为什么像你老朱这样卖力气地抓两条道路斗争、抓大批促大干,都没有把你所到之处的面貌彻底改变?靠“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过日子,何年何月能“灵出”农民生产、生活面貌根本改变,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好日子?如此无声地发问,使我最终得出的理念:全局的前途命运,我难左右,个人的前途命运也难独立主宰,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党的正确决策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转机

1976年4月至1978年,我先后在黑龙江省五常县城郊两个公社任公社副书记,继续下乡包队。大量的工作也是给基层干部搭班子,“砍资本主义尾巴”,解决干群一些纠纷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经宋平同志致信黑龙江省委领导,把我调到哈尔滨科技大学。1980年底,对我在1959年、1962年和“文革”三次遭受的政治打击分别给以平反。1983年秋调入国务院东北规划办。1989年规划办业务结束,调回别离了30年的国家计委。

通过几十年从上层到基层的长期实践,我见证了共和国建设时期的决策历程,获得了鲜活的实际依据,可以向那些对党的决策探索历程不甚了解的人,说明50年代发动的“大跃进”为什么失误,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理论政策为什么正确。

(责任编辑 吴 思)

章伯钧拒绝给刘少奇加罪

阎秉华

1967年初,章伯钧被民盟中央机关的“造反派”——“燎原队”囚禁在中院过厅东侧的一间空办公室,不许他出囚室自由活动,吃饭和上厕所时也有看管他的人跟着。

这年春天的某一日(具体月日忘记了),“造反派”——“燎原队”的队长突然找我说:“有个单位派人来要向章伯钧调查一件事,很重要。你与章伯钧熟,派你做记录,他可能少些顾虑。”我当时也想想章伯钧成了什么样子,答应了。我到了指定的东院会客室,已



章伯钧

有三个男青年坐在沙发上,不一会儿,“燎原队”队长领着章伯钧走进会客室,他向三个调查的人介绍章伯钧后就走了。调查的人最初表现还客气,让章伯钧坐在靠南墙的大沙发上,他们三人坐在靠西墙的大沙发上。北面大玻璃窗户前摆着一个大写字台,我坐在写字台东侧,与章伯钧对面。他看见了我,点点头,我也点点头。大家坐定后,一位年纪稍长一点的人对章伯钧说:“我们来是向你了解一个情况,希望你讲真话。你讲实话,对你有好处,将会给你改变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你的主要反动言论是主张我们国家实行两院制。我们查到,这话是刘少奇先讲的。刘少奇早在1956年12月(或11月,未听清)一次国务会议上就曾提出,在我国实行上、下议院的两院制主张了。你是在1957年春天才提出来的,可见你那个两院制的主张,是从刘少奇那儿听来的,你是受了刘少奇的影响。你应当把这个真实情况讲出来,对你有好处。”

章伯钧先生听完这番“启发”的话后,沉默了一会儿,平静地讲道:“你们一定了解我的过去,

我曾到外国留学多年。我对欧美国家的议会制、两院制,比刘少奇知道得早,知道得多。解放前,我们搞民主运动,就有效法欧美,实行两院制的主张,拥护实施宪政的活动。我的这些所谓政论、政见,解放前是公开讲的,许多人都知道。说刘少奇提出的两院制是受我的影响还可能像点(说时发笑,边笑边说)。至于刘少奇1956年底在国务会议上讲没讲过在我国也实行两院制的话,我没有听到,我不知道。我讲的两院制是我自己多年来的想法,与刘少奇无关!”

“难道你没有参加那次国务会议?你不老实!对你没有好处!你要老实讲!你讲老实话,对你有好处!”

章伯钧先生讲到“与刘少奇无关”一句,话音刚落,三个调查者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吼叫起来。六只眼睛虎视眈眈地盯着章伯钧先生,气氛骤然紧张。我住笔看着这情景,不禁为章伯钧先生担心。只见他若无其事地背靠着沙发,低着头,又沉默了片刻,抬起了头,平静而严肃地讲道:“我正是凭良心,讲的是老实话。我在什么时候参加过哪一次会,或者没有参加哪一次会,事隔十多年,我记不清了。但是,我没有听说过刘少奇讲实行两院制的话,这是事实。我的错误和罪行,是我自己的事,与刘少奇无关!”

章伯钧先生讲最后一句话时,两眼看着我,我会意,急忙记了下来。

调查者反复追问,软硬兼施。但章伯钧先生始终不为所动,或者默不作声,或者重复说过的话。那三个人纠缠了将近一小时,一无所获,最后吩咐说:“你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写份材料交给我们,

对你有好处。你知道吗？你走吧！”章伯钧先生站了起来，看看我，掉转头时，轻蔑地微微一笑，眨了眨眼走了。会客室的门向东，来人看不见。

这三个人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当时“造反派”是不告诉的。但我后来对“燎原”队长讲：“从那三个人的神气和讲话口气看，我认为他们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是不是？”这位队长看着我笑了，点了点头。

上世纪80年代中叶，我听到我的小儿子讲，章伯钧先生的大女儿章诒学和他在一个单位工作（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我将我已写就的《回忆章伯钧老先生在十年动乱时期一件感人的事》一文，抄一份让我儿子交给章诒学。当时李健生同志（章伯钧先生夫人）还在世，我也熟，意在让李健生同志知道。

1992年8月1日上午，我听到有人叫门，开门一看，是位不认识的六七十岁的男子。来人自我介绍说：“我叫萧翰湘，是农工民主党的副秘书长，住在二号楼（指全国政协在团结湖的宿舍，我住在一号楼）。我听说你老伴患牛皮癣，我有一个偏方想告诉你们。”

我一听当然高兴地欢迎来人进屋。坐定后先谈治牛皮癣的偏方，他并答应给我们找药。

萧翰湘先生接着对我说：“我看到了你写的章伯钧先生应付‘文革’办公室调查人的那件事的文章，是李健生同志让我看的，文章写的很好。李健生同志对我说：‘还确有其事。1957年春，统战部给章伯钧发来召开座谈会通知，就在章伯钧出席座谈会那天凌晨两点来钟，正是深夜，李维汉部长打来电话说，刘少奇主席有在中国实行两院制的意思，但他在党内不好讲，希望由章伯钧在座谈会上提出来。因为章伯钧是民主党派，比较好说话。章伯钧在解放前即与中共很近，支持中共。解放后一切听中共的，所以他就按照李维汉（统战部长）的意思在座谈会上讲了。原以为他还是按中共指示的办哩’（大意如此）。”



王光美在迎接刘少奇骨灰的专机上

我听了萧翰湘同志讲的话后，理解了1967年春，我看到的章伯钧先生对“中央文革”办公室派人来向他了解，他讲在我国实行两院制的话与刘少奇主席没有关系时，他的异样表情。同时也理解了我几十年来不理解的另一个问题，即我们没有在民盟多次举办的座谈会上听到章伯钧讲实行两院制的话，他为什么敢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讲。

我今年已88岁，1945年在重庆参加民盟，1950年到民盟总部（后改称民盟中央）工作，现已离休。近年来，我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民主同盟六十年》两本书，感慨颇多，许多往事历历在目。

198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证实通过复查并不存在‘章罗同盟’这个组织或组织系统。所谓‘章罗同盟’的‘反动纲领’，即民盟起草的《关于科学体制和高校领导制度的建议文件》，也得到了平反。”（《中国民主同盟六十年》第133页）

有了这样的评定，回想我在1967年春看到的章伯钧先生与“中央文革小组”来人较量的那一幕，对章伯钧先生究竟应该如何评论呢？我决定将我的见闻记录下来，供大家研究。

（责任编辑 吴思）

彭真像读毛主席语录 那样读宪法

俞梅荪

1985年间,我多次参加彭真委员长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等会议,与他多有接触。每次开会之前,我熟识的那位大姐(会议秘书处)都要向彭真递上《宪法》单行本。彭真在每一次讲话的开场白都要郑重其事地翻开《宪法》,抑扬顿挫地宣读第5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那铿锵的声音,试图给与会者以法律至高无上的信念和信心,然后才开始他的各种切中时弊的宏论。

每次开会,彭真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单调的动作,犹如十年文革期间,人们习惯在开会时先翻开《毛主席语录》读一段,然后再谈其他。当时我想,这部《宪法》是在彭真主持下并倾注大量心血,为时两年完成的。他还参加了1954年《宪法》的制定,他对《宪法》了如指掌,似无必要每每如此虔诚地照本宣科。

直至1989年“六四”以后,我国的民主与法治气氛萧条,使我深深想起当年彭真委员长次次高声朗读《宪法》第57条的情形。我省悟到,他言必谈宪法的身体力行,是向人们强化宪法意识,用心良苦,意味深长。

尽管彭真从未担任过中共政治局常委,也就从未进入中共领导人的前10名。但是,彭真在十年的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我国宪法规定的最高岗位上,每每高扬法治的至高无上,这才是他的最为精彩之举,他是真正的宪法大师。

彭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说:“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6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9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真是痛定思痛的彷徨与呐喊。

1966年,毛泽东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彭真深陷囹圄之中,深入思考我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毛泽东去世后,77岁的彭真复出,夜以继日地致力于立法,三个多月就主持制定了1949年以来的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1980年,他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宪法修改工作。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国家

机构、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经济、涉外等方面的基本的重要法律,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1985年1月3日,彭真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成员,听取国务院的经济立法工作汇报,为加快经济立法而探讨,能否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先行制定条例的新问题。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从下午一直讨论到傍晚,当时84岁的彭真临时请大家在会场里共进工作餐后,继续讨论至深夜,其中有87岁的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张友渔先生。我散会出来时,天上飘着雪花,气温已降至零下十余度。1月23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圆厅召集地方人大负责人座谈经济立法,我散会出来,天已漆黑了。1981年,他曾高烧39度仍坚持宪法的修改工作而病倒了。

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中提出了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的社会大讨论,犹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彭真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即为,党的领导是原则性的,党自己必须守法是具体的,而司法就是具体的,其结论当然就是“法大”了呀!

早在1954年9月,彭真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担任副委员长,他发言指出:“人在法律上平等,法律应当是也必须是全体人民、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实际行动的指针,不允许有任何超越于法律之外的特权分子。1982年,他在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再次强调,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保证民主和法治实施的基本原则。”

彭真在晚年多次指出,《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不管是谁,不论党内、党外,不论领导干部还是老百姓,都必须遵守宪法。党员服从宪法和法律,就是服从党的领导,就是服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责任编辑 吴思)

长征中的两位总书记

史甄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杰出贡献,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参加长征的十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人,他们也为长征的胜利,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其中就包括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位中共中央总书记。

有错误也有贡献的博古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博古(原名秦邦宪)原来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决定去中央苏区;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准备去苏联,在周恩来和王明离开上海前,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9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负总责。1933年博古与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在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的会议上,博古被推举为总书记。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他继续任总书记。当时,以周恩来名义在5月23日《红色中华》报上发表的文件中,公开称博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在博古主持中央工作期间,1933年9月来到中央苏区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掌握了军事指挥大权,他不运用过去几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又不采纳部队指挥员的正确意见,固执己见,独断专行,使红军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连连失利。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被迫决定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并得到共产国际批准。同时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筹划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



博古

中央苏区,准备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红军通过敌人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还算顺利,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刻调集重兵,部署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27日,先头部队控制了渡口,但因部队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大部队还未过江,就遭到刚刚赶来的优势敌人的夹击。红军主力虽然突破了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但部队损失惨重,在突击扩红中发展的新兵逃亡的也很多,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湘江失利后,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痛心疾

首,一筹莫展。12月12日,周恩来召集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李德和博古仍不愿意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主张避开敌人的重兵,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也是这个意见,周恩来也表示赞同。博古这时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则愤而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红军主力西进,于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18日,周恩来在黎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张闻天、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根据多数同志的意见,做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会后,周恩来把这个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质问周恩来,两人吵得很凶,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桌上的马灯都倒掉了,警卫员赶紧又把马灯点上。这时博古的态度已有转变,尽管他的意见被否定,但他服从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开会。决定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还做出了“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规定,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湘江战役之后,大家议论纷纷,不论是随军长征的中央领导人,还是红军将领,都要求开会统一思想。1935年1月15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仍由博古主持,首先讨论行动方针问题,“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讨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这时博古已看出当时的形势,在报告中对军事指挥的错误

作了一定的检讨,同时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被后人称为“反报告”。之后,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王稼祥等也都发言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会后不久,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但会议认为博古还“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没有撤销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革军委委员等职务,并决定他代理总政治部主任。

列席遵义会议的伍修权回忆说:“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伍修权认为博古“为人是正直的,对革命的忠诚和个人品质是应该肯定的”。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内,有的同志不同意更换总书记,但博古按照中央的决定,顺利地将总书记的职权移交给张闻天,为长征的继续进行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

博古代理总政治部主任后,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在长征中,总政治部及时向部队发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在红军通过彝族区前,总政发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红军强渡大渡河前,博古亲自领导的《红星报》,发表了《强渡大渡河的宣传鼓动工作》,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夕,博古写了《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的文章,刊登在《前进报》上,给指战员很大鼓舞。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博古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斗争中,博古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他是当时在中央红军中的四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所以,张国焘在分立中央的组织决议中,第一条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在沙窝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常委分工时,决定博古负责宣传,并主编中央机关刊物《斗争》。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在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中央决定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名义,博古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主席,后又兼任外交部长。

在中央发现陕北肃反错误后，决定组成在博古指导下的董必武等五人党务委员会，经过深入调查，为刘志丹等彻底平反。之后，博古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直至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

在长征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张闻天

早在长征之前，张闻天就用“洛甫”的名字。在1934年1月举行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书记。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同时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转移前夕，张闻天根据中央的要求，写了一篇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发表在1934年9月29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当时，《红色中华》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共青团中央的联合机关报。这篇社论实际上是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宣言书和动员令。红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布“政治指令”，要求根据此文“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当时，对于一贯奉行的进攻路线，谁也不能触动，但是张闻天在这篇文章中做了全新的解释。他写道：“我们党的总的进攻路线，决不能解释成为只要采取进攻的斗争方式，就可使我们得到胜利。……我们依照当时的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一切这些斗争方式的运用，都是为了实现党的进攻路线。”这就在当时允许的范围内，突破了只准进攻不能谈退却的教条。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进行战略转移，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都编在中央纵队，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在互相交谈中，张闻天和毛泽东的看法不谋而合。早在一年多前，张闻天与博古就在思想认识和政策方针上逐渐产生分歧。还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张闻天就怀疑李德的军事指挥，曾问给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这样打下去能有胜利的前途吗？”对待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张闻天主张在政治上公开支持，军事上积极配合，而博古把支持福建事变当作宣传措施，在军事上则采取不配合的策略，以致福建事变失败后，被“围剿”的红军更加被动。特别在广昌战役前



张闻天

后，张闻天与博古的矛盾更加突出，张闻天和毛泽东都不同意固守广昌，博古和李德不听他们的意见，以致使红军遭到重大损失后被迫撤出。在1934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公开批评单纯防御与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而且提出我们的事情不能全靠李德。博古不但不听，还给张闻天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两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与会的同志都未表态，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博古和李德都表示，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要团结，不要闹摩擦。张闻天对这种宗派观念不予支持 and 理睬。1934年7月14日，张闻天在《斗争》杂志上发表了写就的《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一文，虽然在当时还不能突破右倾是主要危险的框子，但这篇文章主要是批评“左”倾，批评党内流行的“‘左’倾总要比右倾好”的观点，表明他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

红军在湘江战役中遭到严重挫败后，仍然按原定的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越过老山界，经广西龙胜，于12月11日进占湘西南的通道城。这时，蒋介石已彻底弄清中央红军准备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集结重兵，形成一个口袋等待红军去钻。情势极其危险，而博古和李德还执迷不

悟。中央纵队进入通道后，张闻天到毛泽东住处，为当前的形势和毛泽东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在12日举行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反对李德的方针，提出事先与张闻天和王稼祥商量过的不去湘西而向贵州进军的建议，获得多数同志的赞成，中革军委当晚发布了第二天入黔的命令。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红军行动方针发生激烈争论，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主张。在部队向遵义行军途中，张闻天向王稼祥谈到应该更换中央军事领导、要毛泽东出来指挥的想法。当晚，王稼祥就把张闻天这个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接着又告诉毛泽东。消息很快传到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得到大家的赞同。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发言，反对李德等仍坚持待机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赞同毛泽东关于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这次会议是在黎平会议上就决定要召开的，许多同志会前都有了准备。张闻天针对博古在会上所作的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重要发言，王稼祥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也纷纷发言，批评博古的报告，支持张闻天的报告和毛泽东等的正确意见。

会议推举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在扎西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严正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种种错误。决议指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红军的特长。共产国际在敌人五次‘围剿’开始时（前年十月来电）即向我们指出：‘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去年二月来电又重复地说：‘很明显的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取得胜利。’国际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五次围剿敌人堡垒主义之下，我们虽不能像在一、二、三、四次战争中当敌人长驱直入时取得大规模运动战的机会，然而运

动战的可能依然存在，事实上已经多次的证明了。”这里说的过去的经验，就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决议还批评博古、李德贻误了实行战略退却的时机，而突围又成为“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大搬家式的行动”。在对待十九路军反蒋事变上，博古和李德没有在军事上采取与之直接配合的方针，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这个决议共分十四条，全文载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卷和《张闻天文集》第一卷。

张闻天担任总书记后，很注意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严格遵守遵义会议之前中央就做出的“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决定，经常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作战方针和具体行动计划。例如，1935年2月6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土城战役，讨论今后的行动方针。2月8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并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布由他起草的决议大纲，他与毛泽东等陆续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上作了传达。2月9日，他在扎西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缩编问题，第二天军委下达了《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

在红军二渡赤水之前，在指战员对灵活机动的迂回作战还不大理解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2月16日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说明“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2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以整版报道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内容，指出：“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委，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当时中央与上海临时中央局失去电报联系，红二、六军团将决议转达给上海。3月5日，从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中得知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张闻天代表中央找当时任总政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的潘汉年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派陈云和潘汉年离开部队到上海长期潜伏，并设法打通和共产

国际的联系,让潘先走,如在上海联系不上,就设法去莫斯科。3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

在红军二占遵义期间,张闻天曾提议让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商议,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3月4日,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发决定:“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六天后的3月10日,张闻天在鸭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同志对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县城),发生激烈争论,多数同志坚持要打,只有毛泽东不主张打,并以当不当前敌总指挥来力争。有人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张闻天鉴于博古过去领导的缺乏民主,便根据多数同志的意见做出取消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的决定。当天夜里,毛泽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先说服周恩来接受他的建议,后又说服其他同志,第二天军委下达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毛泽东从这件事情上感到,打仗不能那么多人集体讨论,向张闻天提议成立几个人的小组负责军事指挥。张闻天采纳了他的建议,经过讨论,中央决定成立了以周恩来为团长、毛泽东和王稼祥为成员的新三人团。这对于改进军事指挥起了积极作用。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或是中央和军委领导人的联系会议,一般都是由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发出的电报、指示和通告,也是张闻天起草的。这些文电不仅发给中央红军各部队,还包括给任弼时与红二、六军团,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项英与赣南中央分局的指示。从现已出版的各种文集、文电看,在遵义会议后很长时间内,在中央领导人中,张闻天为中央起草和签发的文电是最多的。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军事行动,都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例如,1935年4月28日,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负责人会议,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采纳了毛泽东关于抢渡金沙江的建议。4月30日,张闻天向军委干部团和上级干部队一千多人做抢渡金沙江的动员报告。5月12日,张闻天在四川会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渡过

金沙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到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5月17日或18日,张闻天又在四川礼州附近的铁坑主持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负责人会议,决定放弃对西昌的围攻,取道冕宁过彝族自治区,到安顺场抢渡大渡河,到川西北与四方面军会合。5月31日,张闻天在泸定城附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的形势和任务,做出两项决议:一是红军北上避开人烟稠密的地区过雪山;二是派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去上海恢复党的地下组织,会后张闻天向陈云具体交代了任务。

新三人团成立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得以充分发挥,虽然中央决定他是周恩来的帮助者,但周恩来很尊重他的意见,经常是按毛泽东的建议作决定,由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向部队下达命令。从1935年1月中旬到3月中旬,中央红军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发扬运动战的特长,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时变换作战方向,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先后四渡赤水,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这一成功的战略转移,在当时有许多人都不理解,埋怨只走路不打仗,兜圈子走冤枉路,部队没有被打垮倒会被拖垮。3月,三军团在鸭溪召开团以上政工干部座谈会,到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的刘少奇,将会上反映的情况和他本人的意见电告中央,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也签了字。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一直埋怨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怀疑毛泽东的指挥,他给新三人团写信,建议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在新三人团中,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办法也不理解,向张闻天反映:老转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

为了统一思想,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事先与毛、王商量过的报告,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批评了林彪的观点。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指责林彪:“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他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还有刘少奇、杨尚昆的报告,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也怀疑张闻天是同彭德怀结合在一起的。张和彭虽然心里觉得委屈,但在会内会外都没有争辩。会议开了两三天,最后

张闻天作结论,使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的方针得到确认,毛泽东在部队的领导地位进一步提高。张闻天和彭德怀没有料到的是,在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批评张闻天在会理会议前挑拨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再次为此事批评彭德怀,林彪当场申明“那封信彭德怀不知道”,但“文革”中这件事又成为张闻天和彭德怀的一条罪状。不过,历史已经证明,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上的表现,是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彭德怀也是无可指责的。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先后在两河口、芦花、沙窝、毛儿盖、巴西召开了8次有一、四方面军领导人共同参加的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些会议都由张闻天主持,由张闻天作会议总结,他还起草并经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之后,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在与张国焘关于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的争论中,在反对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斗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5年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的分裂错误和当前的行动方针。决定北上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20日,张闻天在哈达铺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了陕甘支队的改编方案和各纵队领导人的任命。在哈达铺期间,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情况,立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商议,决定红军改去陕北。9月27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一致决定将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张闻天根据天津《大公报》披露的红军在陕甘活动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写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一文,发表在9月28日出版的《前进报》上。同一天,在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上,毛泽东作到陕北去的战斗动员,张闻天和彭德怀、林彪也都讲了话。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22日,张闻天在吴起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张闻天作总结,指出长途行军已经完成,“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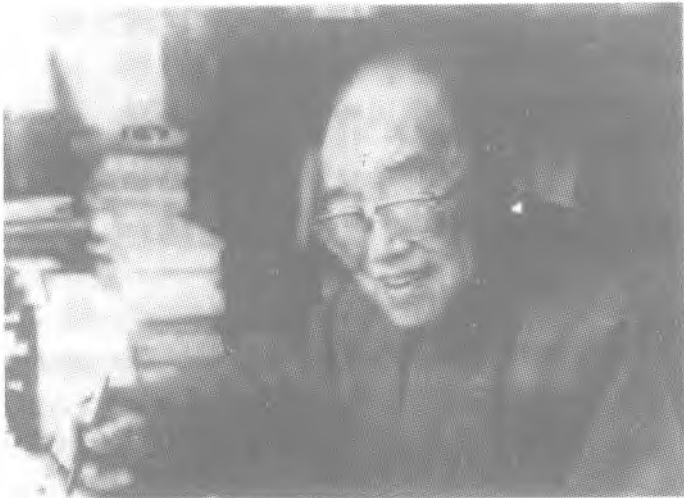
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发生了一件具有历史

意义的重大事件,就是从莫斯科被派回国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带着密电码,不畏艰险,长途跋涉,于1935年11月中旬到达陕北瓦窑堡。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在前线,张浩在张闻天隔壁的窑洞住下,首先向张闻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新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的具体内容,即关于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当时党内许多同志对这一方针不理解、有抵触,张闻天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2月17日,就在张闻天住的窑洞里,由张闻天主持,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12月25日,政治局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为中共中央确立了实行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命运,乃至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重大决策。正因为有了这一正确的决策,才有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有了国共合作的抗日局面和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张闻天为此做出的重大贡献,是不应当被埋没的。

(责任编辑 吴思)

世纪		中央文史研究馆 主办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主办	
		《世纪》大 16开 80页,逢单月出版 定价:6.5元,全年6期 39元 邮发代号:4-557 全国各地邮局征订	
答谢新老读者优惠活动		2006年《世纪》部分篇目选录	
<p>欢迎您到当地邮局订阅《世纪》。如订阅不便或错过邮订时间,本刊发行部随时为您办理补订和邮购(平邮免收邮费)。为答谢新老读者的厚爱,本刊特推出优惠活动:</p> <p>1、凡订阅2007年《世纪》的读者,可5折邮购本刊2006年合订本,其他历年合订本和精华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目击20世纪丛书》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笔记掌故丛书》2册),可享受8折优惠(免收邮费);</p> <p>2、凡向发行部寄2元邮票的读者,可获赠2006年杂志1本试读。</p>		<p>世纪特稿 包产到户:中国农村改革的突破 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的日子里 张学良身边的红色秘书郭维城</p> <p>共和国风云 1976:我亲历中央玉泉山紧急会议 斯大林在中苏谈判中的首次让步 邓小平一天中的两个春节</p> <p>口述与回忆 我随蒋经国赴东北的岁月 建造中山陵的姚锡舟 在“牛棚”结识陈布雷胞弟陈叔时</p> <p>史卷拂尘 中共“七大”确认的革命烈士黄负生 周扬与陈伯达晚年的交往</p> <p>黑匣曝光 盛宣怀开办金融大案</p> <p>国共舞台 陈友仁与两次国共合作</p> <p>名流综谱 从公子哥到书画鉴定大师</p> <p>故人旧事 “皇二子”袁克文的青帮生活 弥足珍贵的鲁迅丧仪文献 1935年故宫国宝亮相上海</p> <p>洋场纪事 玄采薇与张幼仪陆小曼的友谊</p> <p>翰林风采 顾维钧的晚年生活</p> <p>百年留真 顾维钧的晚年生活</p> <p>笔记掌故 李宗仁回国前给友人的信</p>	
社址:上海市(市南)思南路41号《世纪》杂志社 邮编:200020 电话/传真:(021)54657202 64675768 联系人:葛女士			

石西民谈徐铸成划右派实情



徐铸成

我是《文汇报》创办人徐铸成的儿子，数遍拜读刊登在《炎黄春秋》2004年第10期上姚芳藻女士撰写的《徐铸成划右派问题的争论》一文，感触颇深。姚老年事已高，视力较差，仍为还原历史真面目伏案奋书，实在令人钦佩。温崇实先生在反右运动的腥风血雨中，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说真话，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不失为一位无私无畏的共产党人。

文章也引起我的一段回忆。

1981年父亲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全国政协第五届四次会议，被安排在特邀代表小组。同组有在文革期间饱受“四人帮”迫害的石西民同志。父亲与石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是老熟人、好朋友。解放后，石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是父亲的顶头上司。1957年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二十多年来两人从未有过交往。这对相识四十多年的老朋友，在各自饱经磨难之后，再次在全国政协同一小组意外重逢，心情格外激动。相互之间只谈友情，没有套话和官腔，知心的话说个没完。石专门邀请父亲到政协住宿的京丰宾馆小餐厅吃饭，为1957年参与将父亲打成右派分子一事当面道歉，并说出了如下事实经过：1957年某月（石没讲具体时间），中共上海市委得知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即将发表，社论点名《文汇报》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的，帅上有帅，就是章罗联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某日，石随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分管宣传工作的书记张春桥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处去商定《文汇报》编辑部的帅，途中张问石：“你看此帅应是谁？”当时浦熙修是《文汇报》副总编辑，浦的领导只有总编辑徐铸成和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钦本立两人。石答到：“徐铸成3月27日就出国访苏了，这几个月《文汇报》由钦本立主持工作。徐出国前，毛主席曾亲自接见，并对徐和《文汇报》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个闹资产阶级方向的帅应该是钦本立。”张春桥说：“你说得不错，但是老人家（指毛泽东）的心思谁也吃不透，哪天他又要揪钦本立的后台，岂不揪到你我身上来了吗？还是定徐铸成，再要揪徐铸成的后台，往章罗联盟身上一挂不就了事了吗！”随后柯庆施同意了张春桥的意见。这样，徐铸成的右派分子帽子在未经群众揭发批判之前早就内定下来了。

徐复仑

为了说明中共《文汇报》党委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正确领导下与以徐铸成为首的、坚持资产阶级方向的民盟支部作坚决斗争，《文汇报》社中要多定民盟盟员为右派分子，中共党员一个不定。因此，连原来内定为右派分子的钦本立和唐海都成了反右英雄，温崇实理所当然也就幸免于难了。

父亲接受了石西民的诚挚道歉，从此两位老朋友尽释前嫌，重归于好。会后父亲回到上海家中与家人谈起此事时还感叹不已。

（责任编辑 吴思）

改变知青工龄政策的一封信

黄海

上世纪60年代,我与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把我们的青春热血、理想和追求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的广阔天地、山山水水。蹉跎岁月,时光流逝。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祖国大江南北,全国上下平反冤假错案,百废待兴,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陆续返城时,我们韶华已逝,一切已事过境迁。我们这些当年热血沸腾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们一下子成了城市里安家立业的困难户,在很多人眼里我们是“三等公民”。即使给安排了工作,工种一般也是最差的。苦,我们并不怕,上山下乡这么多年,什么苦没吃过,最令人感到不平和辛酸的是,都已人到中年即将老年的我们,如今上有老、下有小,可由于下乡插队农龄不算工龄,我们的工资级别、住房、培训、福利待遇等都将从零开始,这就使我们陷入经济困窘之中。下乡的农龄不算工龄,这个问题解决与否,直接影响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及其家人的生活乃至生存问题。在这种情境下,我与1979年返城的老知青,当时就职于湖南株洲湘江机器厂办公室秘书的萧芸商议,决定鼓起勇气就农龄问题给湖南省委省政府领导写了一封信,此信最后得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亲笔批示,根据这一批示,1985年国家劳动人事部颁发了1985(23)号文件——《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闻讯的知青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因为我们在农村插队期间的农龄可以堂堂正正按规定转成工龄了!

翻开被深藏封存了近30年的8368号档案卷宗,这封被誉为数千万知识青年福音书的信件原文如下:

各位领导:

我们都是六四——六八年下乡,七八——七

九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天地的热烈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境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十多年(最长农龄达十五年),在党的政策召唤下,我们流着眼泪回到“娘家”。

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的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我们并不是牺牲者,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们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在国家机构几乎瘫痪,生产停顿的动乱时期,我们几千万知青在农村,自食其力(不与城里同胞争饭吃,争穿用),深居茅棚(不与城里同胞争房住),荷锄肩担(不与城里同胞争饭碗),粮棉田里,我们曾洒下了多少汗水,这对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的平衡,社会秩序的稳定应当是有积极作用的。若不如如此,国家又会是何模样,这些看不见的、因而不被人重视的贡献,不应当随着历史的推移而被抹煞。

令人费解的是,在城里复员军人军龄算工龄,家属、闲散劳动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期都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下乡知识青年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不能理解,也不能忍受。上山下乡在当时来说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部分(应当这么说!这是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遗憾的是,有的人总是把知识青年回城看成一种“恩准”(这种人的另一种观点是下乡“活该”),因而知青的“苦衷”无人过问。弹指间,皱纹、白发都爬上了我们的眼角、头上,堂前父母老,膝下儿女大,说来惭愧,我们的工资数(元)比年龄数(岁)还要少。若遇不测,还要欠债度日,甚至一如过去,老着脸皮伸手向亲友要钱。如今提倡向前看,国家前途

是令人鼓舞的,但我们个人前途是不可卜的,现在大家多在传说:八五年以后,国家工资制度将要改革,我们这些“无学历、少工龄、缺乏技术特长”的老知青将会作何安排?国家是否能理解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人的忧虑(也是成千上万人的)?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干在农村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语:“老天不欺负老实人”,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定工资改革政策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换回祖国领导者传送的福音。此致

崇高的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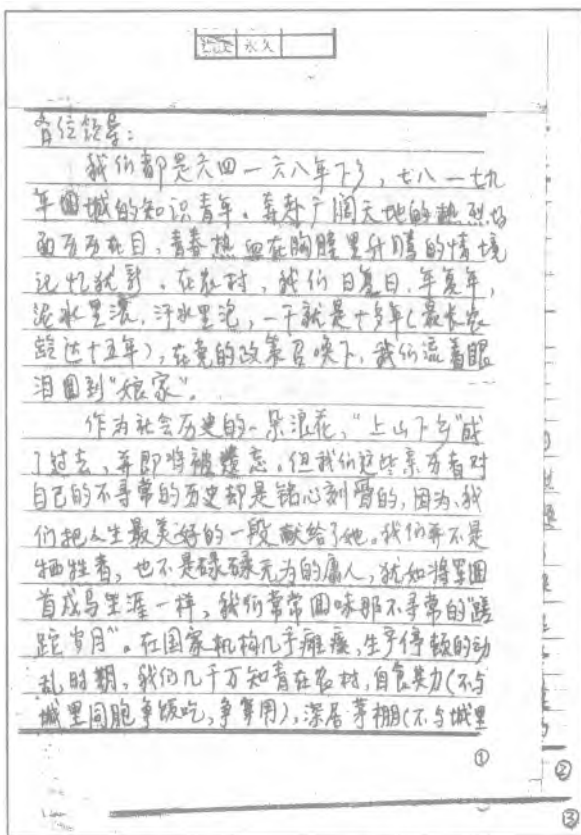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

萧芸文才很好,在湘潭地区乡下插队时曾担任过连队秘书,尤其擅长撰写反映知青生活、思想情况的报告,文革期间她还给中央写信反对“血统论”。知青返城后,由于

插队农龄不算工龄,造成广大知青工作安排差,工资待遇低,精神上受歧视,内心苦闷压抑,经济上十分拮据,生活上陷于困境。在这种不得已的境况下,我与几十名知青战友再次找到萧芸,恳求她能为广大知青写一篇申诉报告。这封信就这样诞生了。而当萧芸兴冲冲地把几易其稿的定稿信拿出来请知青们阅读、签名的时候,大家却你让我、我让他地互相推诿,谁也不敢带头签名。因为当时文革“文字狱”的遗风还盛,如果撞到政治枪口上,判个“现行反革命”也不是不可能。面对签名纸上的空白,此时

的萧芸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孤独。毁稿肯定不行,一旦有祸,定会罪加一等,只有独自承担风险了。想到这里,萧芸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又促使她一不做,二不休,毅然把信尾落款的“湖南省部分老知青”划掉,改写成了“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办公室萧芸”,随后立即把信寄了出去。

这封信一寄出,萧芸当时感到如同寄出了自己的命运。据萧芸后来回忆说,自从信发出后的那一段时间,她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只要一听到电话铃响,心里就紧张地蹦蹦直跳,害怕是公安部门打来电话追查信的问题;看到陌生人到厂里或到厂办公室问什么情况,害怕是便衣警察来调查写信人……其紧张程度不言而喻。然而,谁又会想到,就是这封信,后来使成千上万名历尽千辛万苦插队生涯的知识青年们得到了一份尊重,一个肯定,也从而奠定了广大知青返城后在工作、经济乃至生活的起点。因为工龄涉及到中国劳动者未来的养老退休金核算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说,萧芸这封信最重要的是解决了广大知青的插队农龄算工龄这一关键问题,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广大知青后半生的命运。



被誉为千万知识青年福音书的信件原文

此信寄出后,一路顺风,历经三位领导之手。信最先寄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潘运告书记手上。据萧芸后来说,当时信写好后没有人敢签名,她以个人名义签了名,也觉得问题难办,如果没有熟悉的领导引荐和督办,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因信件内容涉及当时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可能被追查打击;二是被作为一般群众来信处理,石沉大海。萧芸将信直接寄给潘运告书记,是有其渊源的。因为潘运告原来在萧芸下放的湘潭县担任过县委副书记,分管过知青工作,萧芸当年写的知青材料,还几次得到潘运告书记的批示。所以,

当萧芸陷入进退两难之际,一下子又想起了当年曾分管过知青工作并关注过她的老领导。潘运告书记接到萧芸的信后十分重视,因为“知青问题”家家有,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了。他将信当即交给办公室主任林大智,并嘱咐及时转交其他社领导传阅,以出版社收集民情民意的名义提交省委。出版社党委在信件前附了呈词,加盖了鲜红的大印章,将信立即派专人送转到了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委办公厅文电处看到这封信和出版社的呈词,觉得事情重大,当即将信

转呈分管文电和来信来访工作的办公厅领导,办公厅领导看后又立即将信转呈给分管来信来访和知青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刘正,刘正副书记看完信后当即批示:此信件反映情况属实,请中央批示。当时,正好湖南省委有一批急件派专人坐飞机到北京呈送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于是,这封信又加盖了中共湖南省委的大红印章,青云直上的到了北京,并顺利转到了总书记的办公桌上。不久,知青农龄转工龄,成为胡耀邦总书记落实政策“六年两千件”中的一件。(责任编辑 吴思)

代购代邮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胡耀邦传	张黎群等	50.00	7.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5.00
冷石斋沉思录	吴 江	16.00	5.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5.00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册)	李宗仁口述 唐德刚撰写	68.00	8.00
斗室中的天下	资中筠	30.00	6.00
季羨林谈读书治学	季羨林	19.00	5.00
季羨林谈人生	季羨林	19.00	5.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走进怀仁堂(上下)	董保存	55.00	7.00
国事忆述	陈锦华	48.00	7.00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熊向晖	39.80	7.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 们 祝东力	17.00	5.00
农业学大寨始末	宋连生	28.00	6.00
工业学大庆始末	宋连生	30.00	6.00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28.00	6.00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江 涛	40.00	7.00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宋 波	40.00	7.00
侵华日军主要将领的最后结局	朱晓艳 班惠英	40.00	7.00
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	马立诚	36.00	7.00
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版	钱 钢	28.00	6.00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朱元石整理	26.00	6.00
红墙见证录(上下)	尹家民	69.80	8.00
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	马畏安	32.00	7.0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季羨林	22.00	5.00
共和国大审判——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	沈国凡	26.00	6.00
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	李海文整理	25.00	6.00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汪东兴	23.00	5.00
从“董怀周”到审江青	汪文凤	18.00	5.00
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钟 庆	28.00	6.00
东张西望——朱厚泽摄影作品散篇	朱厚泽	150.00	8.00
跬步斋读思录续集	董 健	18.80	5.00
红色家书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	35.80	7.00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作者走访当时夹边沟、明水和十工等农场劳教右派中的健在者,查阅有关历史档案,历时一年半写成的心血之作。对于关心那段历史的人,是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 我国变乱百余年来,民穷财尽,今日差得此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应再使内乱出现于中国。至愿红色政权好自为之,毋蹈吾人昔日的覆辙。我个人戎马半生,不愿再见铜驼于荆棘中也。——李宗仁

东张西望——朱厚泽摄影作品散篇 提起朱厚泽,人们会想到他深邃而富于前瞻的思想,缜密而颇具雄辩的理论,他的思想理论一如他的摄影作品,有独特的视角,充满着历史的动感,洋溢着人情味、人性化和对人权尊崇的内涵,他的摄影作品渗透着他敏锐而透彻的感知、广博而自由的思想。

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作者以海外留学生常见的两种行为——刷盘子和读书来比喻一个国家工业化道路的两种模式。前者是以出卖简单劳动,以GDP速度为目标的模式,后者是以出卖知识和技术,以技术力提高为目标的模式,在本书中,作者严肃地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坚信并指导中国经济实践的“比较优势理论”,分析西方工业化的进程,研究了落后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的追赶路径,通过中日两国工业化发展的比较,使读者看到了工业化和国家政经体制的紧密联系,并总结出简单而深刻的强国之道:民族责任、长远眼光、科学精神。

本书将会引起关注中国经济和民族命运的人们的思考……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 :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严文井口述中的中宣部作协琐事

陈徒手

2006年7月28日去八宝山送文坛老前辈严文井先生，我早到了半小时，就发现第一告别室门前已聚集二三百人左右，人群中以文井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的老同事居多，个个白发苍苍，大多一脸哀戚。门前横幅上不写别人常用的“沉痛悼念”等字样，而是独特地写道：“你仍在路上。”进场致哀时放的是舒缓的西洋乐曲，透出人生一种从容、明朗的意味，让人体会到解脱一般的轻松，压抑的心境竟有些平复。我个人觉得这很像严老生前所喜欢的格式，不由对严老家人的安排生出不少敬意。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中国作协机关工作时，很少能在会议场合见到严老。从老作协人的嘴里，知道他当年带着两个人（一个是后任丁玲的秘书陈森，另一个就是我在作协时的老领导束沛德先生，时任作协党组书记，两人在肃反、反右运动中均遭到清算，先后被逐出作协）筹办了文协（作协前身），这个过程有些简单但也带有几分传奇。我奇怪，这个作协的开办人（或称创办者之一）为何与现在的作协关系这么疏离，与文坛纷争相隔如此之远？几位老同事说，作协某些高层人事安排对老头有些伤害，老头在延安鲁艺的学生都升至副主席的位置，而老头只挂了一个难于让人重视的闲职。从此老头毅然地采取了决绝的态度，对作协敬而远之。这很令我诧异，这种个性化的举动在当时官场上是难得看到的。

与严老的接触大约在1991年，之后延续了较长的一段时间。翻开记录本，从日期上看有一阵还较为密集，大概是我在作协机关闲来无事，一有空就骑车去红庙老头家聊天。有时聊到傍晚，我就陪老头下楼去买猫食，他走路缓慢，有时甚至觉得是在走碎步。他自称从不锻炼，买猫食就是一次身体运动，就是一次与人民群众相互接触的运动。

我那时暗地里开始收集文坛史料，收集时间长了就有些痴迷，一碰到难题就到严老家去排忧解难。1952年以后严老长期是中国作协的党组成员、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身居文坛要职，历经多少风吹雨打。我曾用“阅人无数”来形容他在文坛位置，他叫起来说：“看了很多本不想看的事，也做了不少本不想做的事。”

我拿了一些作协往事问他，他答得很细，老头对自己的记忆颇有几分自信。但有时问到政治运动中的某些作协党组内幕，他竟流露茫然的表情，有些不快地说：“今天才第一次听你说到。”他忿然地说：“领导层里有更核心的人物，他们瞒着我、骗着我这么多年，很多事我不清楚。文革中人家造反派一问我，我说不知道，造反派都不相信，说我狡猾。”

对经历过的人和事，他一再说难以忘怀，并在劫难过后默默地、相当坚韧地去咀嚼。他跟不少朋友提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放映电影《荣誉属于谁》时，中宣部机关众部长众处长们都觉得不错，夸奖声不断。但最高领导却有不悦神情，表态时语焉不详。周扬回来后多次与众秀才揣摩都不得要领，不知如何是好？只等到高岗出事了才有所明白，因为《荣誉属于谁》的后面有高岗的插手。最高领导对高岗的疑虑和防备当时是无法同周扬他们谈的。周扬此时方觉得有些后怕，庆幸当时没有进一步宣传影片的举措。

老人说了这么一个场景，解放初期胡乔木兼中宣部副部长，开会时他坐在主席台上，而正部长陆定一倒坐在台下受训一样听着，也与别人一样

掏笔做记录。陆定一能够承受这种处境，众人们也习惯于这种处境，似乎相安无事许久。说到这里，严老总是习惯性地总结一句：“这其中有不少奥秘可寻。”作家史铁生有一次在饭桌上听严老讲了这些故事，感慨而道：“真是有趣。”又说，一个作家写作时都想像不出这样的细节，想像不出文人与官场还有如此值得回味的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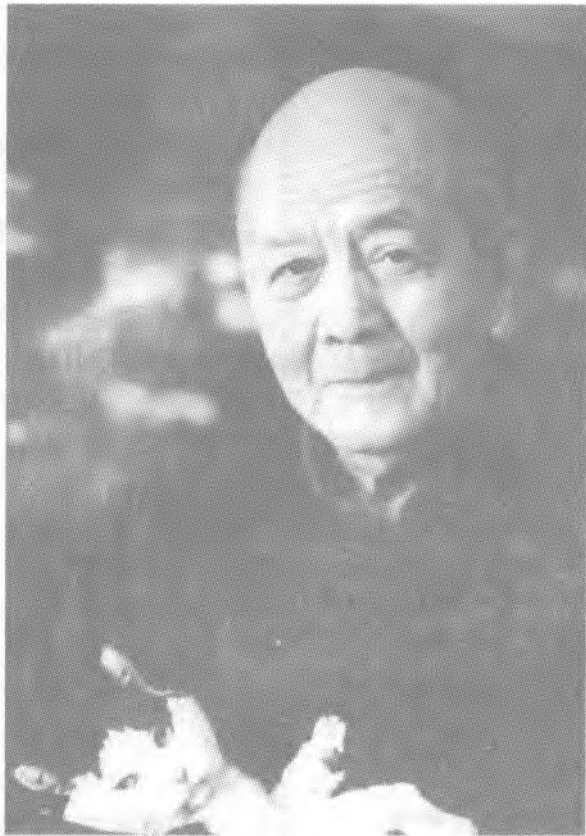
后来我就此又询问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任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的熊复先生，他说严文井的表述是对的，胡乔木在部里是说得算的，陆定一的意见是可以不执行的。中宣部机关以人划线，确有几个小圈子在活动，互有防备，正常的部务会就不起作用了。熊老说：“有一次很突然，习仲勋来当中宣部正部长，陆定一屈居副部长，我们不懂中央决策的原因，只是隐约知道陆定一犯了什么错误。可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陆又官复原职了。我们在机关这样复杂、变动的情况下处境很困难，难以开展工作。”

严老讲了很多文人在风雨飘荡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有爱有怜，有憎有恨。最令他感怀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作为小京派文人参加沈从文召集的茶会，与沈从文、林徽因、肖乾等品茗畅谈的场面使他铭记了温馨的内涵。他多次谈到与丁玲在延安共事的小细节，临结束时就说一句：“丁玲算是一个作家。”见我诧异，他又补充一句：“我称呼一个人人为‘作家’是不容易的。”

他记得周扬早年在延安时的自信，周扬几次对人说：“在上海时党没有了，我们几个人就弄了一个小组织——”周扬的这点自信说了多次，在延安圈子内颇为自得，然而他也很快为此吃尽苦头，苦不堪言。

严老说，只要台下坐二三百多人，周扬就能说二三个小时，有东西，但车轮子转的话很多。1965年开青年作家创作会，底下人拿来周扬报告的原始记录稿，我坐在宾馆里就为如何整理稿子发愁，为上句子和下句子伤脑筋。周扬最后只能请中宣部笔杆子改。

他多次谈到老诗人田间在1955年肃反时受到的种种遭遇，说到诗人的不适和反弹。有一次为了收枪之事，田间不知不觉中受到刺激，突然在严老家中往外跑，边跑边喊：“你们看，你们看——”刹那间意识上有些崩溃。田间在以后很长一段时



严文井

间里没有缓过来，严老心里觉得内疚，有一次就积极提名田间参加访问埃及的文化代表团。没想到埃及人在访问时顺便搞了一个照片展，都是随手拍摄的，巧的是里面没有田间的身影。田间一下子又受到刺激，很激动地表示要向埃及政府提抗议。严老提到田间另外一次波动：“胡乔木这个人有时爱管人家写的诗，有一次在大会上就点名批评田间，说，田间你的诗怎么越写越差，越写越糟。田间一下子非常紧张，情绪上又控制不住了。”

他形容文艺界的不少领导人物在政治风雨中始终跟得很吃力，对高层领导之间的关系没有吃透，几次跟错。比如1959年、1962年原本要开会反左，但是紧接的就是风向大转弯，弄得一批人要斗争别人，一批人却要做检讨。他回忆道，庐山会议后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念了彭德怀的信和全会决议，然后问与会者：“你们懂了吗？”没有一个人吭气，大家怎么会想到中央开会竟是这种后果？当时连周扬都上不了庐山，谁也不知山上会议的开法，大家只是感到一种莫名的慌乱。

他讲到作协诸多人物的事例时，往往几句就能概括传神，如说一个人，“善辩，能在曲里拐弯

中取胜”再说一人，“他是某某的左右杀手，一生世故，集江湖上的经验，内心隐密不向人说”；他又描述一个人的霸气：“能在会上咆哮两个多小时，无人能敌。”他会说某某没有味道，因为某某在延安时招供说延安的南方特务都是他联系的，咬伤了很多。周扬他们明明知道这个人的不足，却在解放后着力使用他，让他成为一名好用的政治运动能手。

他零零碎碎地谈了一些五六十年代高层的幕后琐事，从他的个人角度提供了有意味的片断：“胡乔木对周扬是暗暗使劲的，明知道胡风和周扬不对劲，偏要安排胡风担任《人民文学》编委，偏要发表路翎的小说。后来批路翎，有人说我是《人民文学》主编，是我让发表的。但我不怕，因为我知道是胡乔木同意的。当时胡乔木提议彭柏山担任作协党组书记，华东局不放，之后胡就考虑让邵荃麟来作协，邵是忠厚的，有时想下点命令，但总难于实现，没有掌握什么实际权力。

“有一次丁玲和舒群吵架，胡乔木让我去开个会解决。丁玲当着我的面大骂周扬，说了难听的粗话。后来胡乔木要我汇报，我就说了实情，胡听了就笑笑，可见他们之间是好的。丁玲借这个机会也等于向胡表明，她骂了周扬了。

“有一次胡乔木请我转告周扬，让周赶紧搬到中南海，否则会犯错误的。口气大得很。我只好委婉地告诉周扬，说乔木同志劝你搬到中南海。我猜测，当时周扬兼文化部副部长，属于政务院文委系统，归周恩来管。而毛泽东想让周扬多掌握党的宣传系统，所以胡乔木就让周扬住进来。周扬是一个明白人，就每个星期到中南海住一次，两边来回跑。

“胡乔木有一回想解散全国文联，胡风不同意，就写信给毛主席，说文联是统战组织，不可解散。毛主席就在信上批了‘同意’。毛对胡乔木说，以后你别管文艺的事了。胡跟了毛这么多年，自然心领神会，以后就少管文艺的事。”

有一次我去看严老，发觉他心事重重，细问之后才知老人所苦的是如何写好一篇新作，他甚至说早晨上卫生间时都坐立不安。他说，心里老想写一篇文章记述某文艺界领导，但不能写得中性含糊，要按着自己的思考去写，但这可能永远也写不出来，写了又有什么用处呢？突然间他大声念出文章

的开头：“我怕你，我讨过你的好，但我不算你喜欢的前列干部，因为我是一个笨蛋——”老人脸涨得通红，念完后他沉默了半天，浮出一丝不易觉察到的苦笑。我知道他偷偷地写了不少类似的手稿，零碎，甚至是只言片语，记录了他的最新的思考，也记下了回想往事时所特有的愤慨。

他说1965年被挤出作协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险境。他说不去，周扬不轻不重地说：“那也有几百号人呢。”因为前任两位社长冯雪峰、巴人是那样一个悲剧下场，谁去接任都觉得害怕。严老告诉我：“巴人是冯雪峰的老朋友，调到人文社。可巴人1957年斗冯雪峰很狠，上纲上线，而巴人自己二年后也整倒了，后来死的时候是用绳索自缚的。我害怕，含着泪在心里说，不能去人文社，因为当社长都没有好下场。这是我当时不能告人的心里话。”他当时去找周扬说：“我已经45岁，我想写些东西，搞一点创作。”周扬说：“再干5年吧，如果那时我还在这圈子，我一定让你搞创作。”没想到不到一年文革便爆发了，周扬进了监狱，严老关在牛棚，因属于周扬黑帮分子屡挨斗，处境更加不堪。老人谈到此仰头叹息：“什么都无言可答了。”

文井老人在晚年已经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人，对历史走向有着透彻的把握，也有深切的期待。在他们那一代文化人中持有这种思想探索的品质已属不易，尤其是老延安人具备这种反思的能力已十分稀罕，可惜他没有机会把闪光的思想亮点展示给人们。想到他和像他一样勤于思索的老人经历如此坎坷，思考如此之深，却没有留下此类文字，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国家民族都是无尽的损失。

在这样一个时代，寂寞无语有时是美丽的，结果却是异常残酷的。让人无言。

（责任编辑 吴思）

来函摘登

阅贵刊今年8期9期，方知《炎黄春秋》创刊已满十五周年，这是中国出版界一件大事，也是幸事，值得大庆贺，尤十分佩服编辑的胆识。

代候编辑部诸同事。

吴江

2006年9月16日

张元济与中国图书馆事业

越 宁

史海茫茫,知人论事。学习中国图书馆史,不能不知道张元济,读张元济,可以知道图书馆事业的创业之艰巨,守成之不易。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开拓者张元济先生曾手书过一副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些简单的话里,似乎沉淀了许多代人的文化经验。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鼓吹“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其中一个文化思维就是启发民智;启发民智的一大措施就是办图书馆。张元济也贯彻了这种思想,先后创办了通艺学堂图书馆、合众图书馆。

—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人海茫茫,恐怕并无多少人了解张元济的生平事略。如果说“响远不在音高”那倒也是。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正是维新活动特别开展的时候,张元济的想法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开民智”的主张是相近的。当时他已有了“自强以兴学为先”和“以醒人为救人”的启蒙意识,也是他维新思想的核心。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8月,张元济考取总理衙门供事,在此供职期间,他的“有所为”体现于三方面:进书、分报、办学堂。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初,张元济与若干同道着手创立一所新式学堂——西学堂(后改名通艺学堂),参与筹办者有陈昭常、张荫棠、何藻翔、曾习经、周汝钧等,学堂内设有图书馆。张元济为学堂聘请教师,购置图书仪器及拟定章程花了不少精力。按“图书馆”专用名词,一说最早是梁启超提出的,但也有说源自“通艺学堂图书馆”。可见通艺学堂图书馆颇有

影响。1898年(戊戌),百日维新流产后,通艺学堂连同图书馆一起移交给京师大学堂。由他创办的图书馆,即近代中国第一个图书馆消失了。

二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张元济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1903年他在上海应邀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正如高凤池认为,商务初期之发展,有两件事是关键,一是接盘修文书馆,一是编教科书。王云五也认为,张元济的加入,关系极大:“自是厥后,商务印书馆始一改面目,由以印刷业为主者,进而为出版事业。其成为我国历史最长之大出版家,实始于张君之加入。”当时的商务印书馆主要是编译出版西方社会科学哲学名著,以后随着清廷废除科举,又推出各种中小学堂教科书,因此资料室收藏各种文字的图书。张元济对编译所藏书有一个全方位的设计。他自称为购置藏书,“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目的是要囊括国内大藏书楼的珍本善本。为此,他先后购置绍兴徐树兰熔经铸史斋50余橱藏书,购入长洲蒋氏秦汉十印斋藏书、广东丰顺丁氏持静斋和清宗室盛氏意园部分藏书,又赴太仓收进顾氏謏斋藏书。此中有不少珍本,如宋人江少虞的《宋朝事实类苑》、《大宋宣和遗事》。

张元济主要收书不为个人,这也是同以往藏书家不同之处。尽管如此,由于他尽力搜罗散出各家藏书,亦渐以藏书家和版本家著称。1906年春,号称清末四大家之一的归安陆氏皕宋楼,据说以拥有二百种宋版珍籍名重书苑,有意出售。当时商务印书馆已谋求建立自己的图书馆,意图购进,然因售者要价甚高,事竟未成。1907年夏,

皕宋楼藏书终以十万元之约被日本人购去,中土宝贵文献舶载而东,归入岩崎氏之静嘉堂文库。此番落魄情状,使海内士人无不疾首痛心。皕宋楼的流亡海外,在许多人看来,比水火之患还觉痛心,这中间包含对民族文化衰落命运的悲伤与忧虑,似在时代变换期格外突出,古籍的命运尤有象征意义。文物与文献大量耻辱般地由母邦流出国外,引起了广泛而效果有限的呼吁,混乱年代的政府和权贵似不肯顾及此事。张元济有感于此,势不能不投入抢救和护持文化遗产的努力之中。他曾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一方面是性情,即爱书藏书传播书,成了生活的内容与趣味;另一方面又是责任,是文化托命之所在。这二者,使张元济成为著名的藏书家与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

因为收买皕宋楼的失败以及珍本的外流,可能刺激了张元济与商务收书典藏建立图书馆的计划加紧进行。张元济的收书之愿、积书之志,在清末数年间渐次付诸实行。到1909年建立了商务自己的善本书室——涵芬楼,后于1926年发展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私立公共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善本书藏于该馆三楼,仍名“涵芬楼”。

自有涵芬楼成立,张元济保存善本旧籍之事业心日笃,除委托孙毓修管理图书馆事务,还躬自访书于京沪晋鲁诸地书肆。涵芬楼之起于沪上,一借商务的财力,二靠张元济的热心擘画。而它的存在意义又超出藏书本身之保存,更在于成为公共图书馆,使无力藏书的读者受益,同时,为商务出版古籍奠定了高质量版本的基础。涵芬楼藏古籍的版本和学术价值,对于历史文化的了解和研究,是极为宝贵的。

张元济于1910年作了为期半年的欧洲访问,先后到巴黎和大英博物院图书馆,目的是观看所藏中国敦煌古书。欧洲之行,张元济带回来的不仅有拍摄中国文物、图书档案的大量胶卷,更有满腔爱国情愫,促使他弘扬文化,开发图书馆的决心。1911年他就提出:“本馆善本书目请用小册子速抄,拟添购旧书免重出,并示藏书家用。愈快愈好。”后编印了《涵芬楼古今文钞》。



张元济

张元济还着重搜集了各省县方志。他认为:“地方志虽不在善本之列,然其间珍贵之记述,恐有比善本犹重者。”他搜集地方志一是为编辑各种专科辞典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了制止帝国主义对我国方志的掠夺。他说:“事关国脉,士与有责。”他在上海觅购方志,并要求各地分支馆协助访购或借抄。

至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的藏书迅速增加,藏书已达463000余册,其中善本古籍3700余种,35000余册。全国地方志2600余种,25600余册,以及15世纪前印的西洋古籍多卷珍本、中外报章杂志、各种照片等。1928年10月至11月,张元济东渡扶桑观书,带回了宫内寮(6种)、内阁文库(28种)、东洋文库(2种)、静嘉堂文库(9种)善本的影印底片。

正如版本目录学者赵万里曾追述:“涵芬楼要算当时江南唯一的大藏书库,方面之广,数量之多,无论宋元旧槧、明清旧钞,足足塞满了二三十个大木柜子。虽然其中名贵的,已经盛了几十个大衣箱运到租界里金城银行内库避风火去了,剩下的一部分,据我看来,还是值得羡慕。”自从1932年1月28日,经过日本飞机队巡礼以后,

涵芬楼同东方图书馆一道可悲地毁于日本侵略的战火中。涵芬楼与明末清初兴盛一时的汲古阁一样,既重藏书又重刊刻,本来以商务印书馆的实力可以长保于东南,何期战祸突来,火于一旦,竟不如当年的汲古阁,百年之后散归江湖。这是涵芬楼的经营主持者张元济一生最为不幸的一件事了。

三

敌伪侵占上海时期,张元济目睹“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私人藏书因战乱而大量流失,便与叶景葵等商议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由张元济任筹委会主任,请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顾廷龙主持馆务。创办意见书宣称:“抗战以来,全国图书馆或呈停顿,或已分散,或罹劫灰。私家藏书亦多流亡,岂不大可惜哉!本馆创办于此时,即应负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任。”1941年合众图书馆馆址在上海落成。以叶景葵所赠全部藏书为基础,以其顾祖禹手稿本《读史方輿纪要》为镇库书。后又收藏了李拔可、陈叔通、叶恭绰、胡朴安、顾颉刚、蒋抑卮、潘景郑等所捐藏书,这批书达22万册,其中名人稿本及名校精抄,不亚于当年东方图书馆所藏图书。当时,张元济捐赠给合众图书馆历年收藏的旧嘉兴府先

哲遗著476部1822册,寄赠(后作为永远捐赠)海盐先哲遗著355部1115册,张氏先世著述及刊印评校藏之书104部856册,还有石墨图卷等。这批地方文献对研究社会文化发展极有史料价值。1950年,张元济主持《涵芬楼烬余书录》,由顾廷龙协助整理,翌年出版。他代表商务印书馆将涵芬楼所藏的《永乐大典》21册捐献给国家。1953年,张元济主持董事会议决,将合众图书馆捐献给国家,这就是后来的“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为了纪念张元济和他在图书馆事业上的贡献,1987年5月8日,在他的家乡浙江海盐武原镇建立了“张元济图书馆”。

四

张元济一生在“文教兴邦,开启民智”的事业上走的很艰难。但第一,耕耘总有收获,实际上张元济在出版事业和兴办图书馆事业上的努力,对于中国文化变迁所产生的潜在影响之大,是很难估计的。第二,这条道路的坚持仍然为文化思想史的反思提供了一个线索,即不得不考虑到社会文化变革系统中,这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忽视这种建设性的努力,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变革将不可能成功。这已经成了一个历史教训永远留在那里。(责任编辑 吴思)

《随笔》2006年第6期目录

(总第167期)目录

林 达 \ 亚马逊热带雨林里的信仰之路
述 弢 \ 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命运
薛忆沩 \ “域外读书”三则

李 普 \ 楚狂本色总依然
林冠珍 \ 不该忘记伍连德
李南央 \ 于光远先生的一件小事
沈 宁 \ 与大师谈大师

周正章 \ 马克思、伦勃朗与阿垅
鲁 阳 \ 在重温历史中寻求道德重建的勇气
——读《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章 明 \ 泰坦尼克号船长的两难
白 桦 \ 大厦的基础
范若丁 \ 有感于井与天街

舒 展文 方 成画 \ 时间咏叹调
金炳亮 \ 黄石国家公园笔记

苏福忠 \ 赵树理印象
——写在他的百年诞辰
钱理群 \ 迟到的敬意
——读李蕴晖《<追寻>>

邵燕祥 \ 《公刘纪念文集》序
附公刘先生遗作
留 白 \ “没有什么终极目的”
——重读顾准

翟永明 \ 飘零叶送往来风
舒 芜 \ 程木匠的林黛玉论
肖潇雨 \ 从《家书》看曾国藩治经之要

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随笔》杂志
邮编:510075 电话:(020)37592344
欢迎邮购,免收邮费,每册定价6元
邮发代号:46-90 email:suibi2005@163.com

上海社保基金案的初步警示

周瑞金（作于 2006 年 9 月 10 日）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 7 月中旬被中纪委“双规”后，上海民营企业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荣坤也被监视居住。接着，相关官员及国企领导“落马”的消息接踵传出，先是上海社保局社保基金监管处处长陆祺伟、上海电气副董事长韩国璋，继之上海电气董事长王成明也被“接受调查”。短短一月之内，一些政府官员与民企富豪相继被查，这在多年来很少案件报道的上海，引起极大震荡。与三年前周正毅案不同，这次张荣坤带出一批官员“落马”，周只是操纵证券和虚报资本金（最近传闻周正毅又被“协助调查”，这次“二进宫”有可能突破案情），而这次损失的社保基金可是上海千百万人的“养命钱”。由此引起上海上下强烈关注，自不待言。

但是，上海的民众很难从上海主流媒体上了解到案件具体情况。八月中旬，新华社上海分社播发了一篇有关上海社保基金案的报道，令人惊讶的是，上海市属媒体竟概不刊载。而在过去，大凡新华社上海分社发的有关上海的正面报道，上海各大报几乎同时都在头版显著地位刊登，上海的广播、电视、网络也全面跟上，声势唯恐不大。这次，素来新闻敏感的海上媒体却噤若寒蝉，集体失语。除按规定刊发简要新闻外，一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避而不宣，好像这个大案不是发生在上海似的。于是，上海民众只好到非上海市属的报刊、杂志、网站上去获取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信息。

上述八月中旬新华社上海分社有关上海社保基金案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令人回味的話：无论是介入高速公路、进入关键国企集团，还是首发非上市民企融资券，“张荣坤总能捷足先登，他究竟凭什么搭建了‘近水楼台’，从而屡屡顺利地实现‘先得月’？”毕竟是新华社记者的水平和眼光！这句切中要害、一针见血的话，在不到一个星期就得到了事实的验证。8月24日宝山区委副书记、

区长秦裕“落马”了！秦裕“落马”给宝山区的声誉带来不少损害，难怪宝山区官员叫苦不迭。原来，秦裕从市级核心机关“空降”到宝山区当区长才一个多月，与祝均一“落马”的时间相差无几。他的问题显然不是发生在宝山区。秦裕的“落马”，恰恰把新华社记者提出的“近水楼台”问题，推到了公众的面前。

看来，这次中纪委办案效率很高，中央领导处事也十分果断，案情进展颇快。我相信中央和上海市领导一定能把此案查清，向上海市广大老百姓有个明确的安心的交代。

上海社保基金案曝光到现在，已过去一个多月。从目前公开报道的材料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给我们的警示，虽然初步，却是十分深刻的。

警示之一，类似社保基金（包括住房公积金）这样事关广大职工的“养命钱”、“购房钱”，离开社会监管，全由政府部门包办，暗箱操作，任意投资，必定非要出事不可。199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保险制度的决定》，明确规定社保基金结余除预留相当于两个月支付费用，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银行专户，严禁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接着1999年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就上述投资原则进一步制定实施细则。到了2002年，彻底收回社保基金运营权的上海社保局，非但全市社保基金的运营大权仍然掌控于政府之手，原来可自主选择投资经营主体的数十亿企业年金，也牢牢握在社保局长手中。于是，2002年2月上海社保中心刚一成立，3月张荣坤就通过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委托贷款方式，快捷拿到32亿元社保基金，去收购上海路桥公司的99.35%的股权，获得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的收益权。

2004年5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同时颁行《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明确规定企业年金运营要采用信托模式,年金受托人,与账户管理人、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分开,形成多元化管理主体,以打破企业年金由政府长期一手包揽的积弊,按市场化运作完善企业年金的管理。然而,上海社保局全然无视这些规定,将托管权、运营权、监督权全部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毫无顾忌地把社保基金与企业年金混用,以企业年金中心名义去乱投资,甚至充当寻租的资本。如此管理全市职工的“养命钱”,就必然要曝出大案、要案、窝案了!

警示之二,慈善事业要社会化,不要政治化。由于贫富差距拉大,中国政府正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慈善事业有利缩小贫富差距,推动社会公益事业。中国人有乐善好施的好传统,但我国慈善事业起步晚,慈善管理体制仍沿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慈善事业成为政府管理的事业,而不是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是社会事业,由社会组织管理。像比尔·盖茨那样捐赠慈善金高达310亿美元,堪称世界级慈善大家,但我们没有听说,他因此当上美国众议院或参议院的议员,也没有当上州政府的官员什么的。而在我们这里,张荣坤来上海发展,不过在2000年捐赠200万元,2002年捐赠2700多万元,总共不过3000万元左右,他就在2002年5月当上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名誉副会长兼副监事长,7月当上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8月当上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名誉会长。2003年3月又当上全国政协委员,接着又当上全国青联常委。与此同时,他乘机风头大健地收购了上海多处繁华高速公路的收益权,当上了上海最大国企上市公司之一的上海电气副董事长。一笔慈善捐赠竟产生如此大名大利双收的神奇功效,显然,张荣坤把神圣的慈善事业当作了建立“近水楼台”的资本,当作了爬上巨富新贵宝座的桥梁。因此,他捐的钱变成黑幕交易的不义之财,哪有慈善可言?这是我国当前慈善事业管理体制弊端结出的恶果,将慈善事业异化成钱权交易、官商勾结的又一通道,这个教训很值得记取。

警示之三,上海社保基金案还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有了很

大发展,但公共治理方面问题成堆,积重难返。这使得企业界中一些人采取不正当手段与相关政府官员相勾结,以便获取公共权力资源来提升企业竞争优势,荫庇自己膨胀的私欲。这使得企业主和官员寻租活动有增强趋势,企业主与官员陪吃陪喝陪洗桑拿陪打高尔夫不已成为见怪不怪的普遍现象了吗?张荣坤、周正毅正是上海滩的两个代表人物。上海的政治资源太丰富了,寻租的土壤太肥沃了,运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诱惑力太大了,如不警惕,不彻查,仍不免会曝出类似社保基金案,仍会有一批祝均一、王成明、秦裕之流“前腐后继”地走向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这个教训不令人警醒吗!

总而言之,上海社保基金案暴露出中国进一步发展中制度性的障碍已经十分严重。如果不及时深入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将受到严重威胁,甚至会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这已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了!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萧 徐)

邮发代号2-868

每期7.5元 全年90元

欢迎订阅
2007年

博览群书 月刊

名刊名社联手回馈读书人

订杂志 获图书 得礼品

由光明日报社主办的书评月刊《博览群书》,联合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真情回馈读书人。凡订阅2007年全年《博览群书》杂志,于2006年12月31日前寄回订单或复印件的读者(请在信封上注明2007),将和通过编辑部邮购的读者一起,由杂志社抽取200名,获赠价值百元左右的优秀图书(书目见下)。除此之外,还将抽取300名读者,获赠精美纪念品一份。

北大岁月/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我知道什么”丛书
二十世纪看得见的历史/资本主义与社会进步感受印度/
中国问题报告(第四版)
修正力/远逝的风景
无用米/音乐处方/用心带你去留学

推介评论 书海导航 兼容并包 促进沟通

社址:北京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邮编:100062
电话:(010)67078104 67078107 67078197

为什么在中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王幼辉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结束,已过去整整30年了。“文革”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反思。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大浩劫,毛泽东为什么要亲自领导、亲自发动这场“大革命”?这些问题,已有很多文章叙述过。例如有人著文说: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是对干部的一次大审查,他容忍群众的“自发性”,让群众放任自流。毛泽东认为:谁好谁坏,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群众都“清楚”。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可放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检验。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对干部的一次大考验、大审查。就这样,在放弃了党的各级领导的情况下,各种矛盾,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积怨,就在失控的情况下爆发出来,掀起了全国性的群众斗群众,甚至可以乱抓人、乱打死人,造成全国的动乱。另一方面,苏共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使毛泽东震惊,毛泽东想到,会不会他在百年以后,也会有人像赫鲁晓夫一样的来否定他,故他在“文革”中多次提到要注意身边的赫鲁晓夫。毛泽东认为:只有他,只要按他的一套,以阶级斗争为纲假想众多的阶级敌人,不断地革命,来治理、统治国家,中国才有前途,中国才不至变修,才不会变色,才会千秋万代。这是一般认为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的原因。还有一种认为,特别是广大老百姓,他们认为毛泽东要发动“文革”,主要是想除掉刘少奇等。刘少奇也是我党、我们国家的缔造者,少奇同志为我党、我国不论在革命工作、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有不可磨灭的功勋,这应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但自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毛和刘在某些大是大非上出现了矛盾,例如在1962年的7000人大会上,刘少奇明确指出,我们的工作不能老用一个手指头和九个手指头来评判(这是毛泽东常用的,即成绩是九个手指头,缺点是一个手指头),而是应该用几个指头和几个指头来评价,又向毛泽东讲:历史上人食人,要上书,在四清工作上亦有较大分歧,刘少奇认为,四清工作是四清与四不清为主要矛盾,而毛泽东则把四清工作提到严重的阶级斗争上,是清理农村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大事;毛泽东也流露出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有点大权旁落。老百姓只是看现象,因为党的二把手、国家主席可以遭这样的残酷迫害致死,这不是个人恩怨又是什么?但有人说:如果只是解决刘少奇个人问题,对毛泽东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事,即不必涉及范围那么广、那么多人,故说是毛刘之争是说不通的。其实在“文革”中,刘根本没有与毛争,毛在发动群众之后,刘少奇毫无还手之力,就被打倒。但有这样认为的人,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想一想。到了1966年,如果还想用会议或用举手的办法来解决类似彭德怀同志的问题,那样是否还可行?毛泽东一辈子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他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一位女红卫兵说:你的名字不要叫文质彬彬的彬彬,而改叫“要武”。这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着全国红卫兵讲的。

为了国家防修也好,是因为毛刘之争也好,我认为都不是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根源。主要根源是体制,没有民主与法制,于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没有民主与法制,一个人说了算,天下没有不乱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要负主要责任,但体制要负最大责任。毛泽

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有哪一位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出来反对过，在造反派乱打人，乱揪斗干部时，谁出来反对过，国家主席被害致死，又有谁出来说句公道话。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要开除刘少奇出党，除了陈少敏这位女同志不畏高压，在全会表决通过《审查报告》时，拒不举手，还有谁反对过？（陈少敏同志后来被残酷迫害）在“文革”前夕，毛泽东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他已经不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他喜欢杭州的西湖宾馆，喜欢华东的柯庆施。因为这个柯庆施讲过：“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崇拜毛主席要崇拜到迷信的地步。”这些“话”使毛泽东听起来多么舒服。毛主席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威？这是制度造成的。早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央政治局于1943年3月20日通过的《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在明确“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同时，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就赋予了毛泽东超越中央集体之上的权力。翻开历史看看，在全国解放之前的战争年代，还没有见过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典型事例，那时是战争年代，大家都在“共苦”，毛泽东很愿意与大伙一道打天下，但建国之后没多久，在和平年代情况就不一样了。

1952年11月，刘少奇同志在苏联黑海边索契休养时，当时江青也在那里，她去看望刘少奇，并很认真地对刘说：“主席身体不好，以后中央会议上已经原则决定的事，你们几位领导同志可以办的，就不要事事请示主席，让主席多活几天。”刘少奇回国以后，把这个情况同周恩来、朱德等几位领导同志讲了。当时大家认为，这可能也是主席本人的意思，因为毛主席曾几次说过类似意思的话。这样，有些具体小事的文件就不送到毛主席的案前了。可能毛主席发现报他的文件少了，引起他不高兴。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写给刘少奇、杨尚昆的信中，说了几件事，其中有一条就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见王光美访谈录）

由此看出，毛泽东在建国后是不愿意放一点

权的。毛泽东的战友彭德怀，就是因为对“大跃进”提了一点点意见，写了个万言书，开始连刘少奇都认为彭总信中所说的是符合实际的。但后来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了反党集团，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彭德怀被撤职，“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彭德怀是毛泽东的老战友，一生立下战功无数，他保卫延安时，毛泽东写下“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又点将彭德怀率领百万志愿军，不畏敌军优势装备，不畏天寒地冻，拼着一口气，以人力拼钢铁，打赢了这一仗。但是不管他功劳有多大，只要你与毛泽东意见不一，你只有挨整的份。又如1964年12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刘少奇谈了与毛泽东的不同看法，受到毛泽东的多次严厉批评。对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出现分歧，党内不少人感到忧虑。因此朱德、贺龙等找到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接受大家的意见，主动找毛泽东作自我批评。

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也是站在毛泽东一边批评彭德怀的。刘少奇认为彭的意见虽然不算犯错误，但彭德怀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要人表态站在哪一边，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刘少奇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即顾全大局。

维护领袖个人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利益，这就是“大局”。这个逻辑能成立吗？

大局就是党的最大利益。那么什么是党的利益呢？人民的最大利益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妨翻开毛泽东在1945年4月24日写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他说：“应该使每个同志明瞭，共产党人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著文《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讲到：“我们的责任就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就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志们，人民要解放，

就把权力委托给能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还是那篇《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又说道:“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的任何政党有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读了这几段毛著,可以看出,服从大局,是讲要服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这里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党有一条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路线。服从大局,绝非服从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或无原则地去维护领导人的个人权威。上世纪的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把毛泽东的权威提高到至高无上,下至老百姓,上至政治局常委,都把维护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当作维护“大局”,就是维护“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看来,毛泽东在上世纪40年代写的文章,我们没有学好,连写文章的人在建国后也忘记了,导致了建国后20年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悲剧。所以,真理光口头上讲,远远不行,要使它法律化、制度化、体制化,从而成为人人要遵守的准则才行。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下大乱,搞得天怒人怨,出于对党和国家利益的考虑,1967年2月,叶剑英、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师和副总理在北京京西宾馆、怀仁堂对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进行批评和争论。这批老同志可以称得上“都是彭德怀”级人物。江青、张春桥、陈伯达论资历、社会地位、声望、革命贡献,怎么能与这批老师们相提并论呢!但他们有毛泽东这个后台。于是未经中央集体讨论,毛泽东一人定调,就把这些老师和副总理打成“二月逆流”,使党内高层再也无法进言,党规、党法荡然无存。还谈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工具,个人权力不受限制,以至于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形成父子君臣关系。邓小平把这些都归结为封建主义色彩,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思想。我们国家经历了二千年封建主义统治,封建思想根深蒂固,高喊“万岁”,是封建王朝里才有的规矩,但在解放初期,我们喊万岁,我们称毛泽

东为“大救星”,这大概不会是毛泽东叫唱、叫喊的吧,是我们把他捧为“大救星”,当作“红太阳”,是我们自甘匍匐高呼万岁的。我们唱了,喊了,毛泽东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孙中山就任大总统时,有人喊“大总统万岁”,孙中山马上制止,并且以后不准再喊。《国际歌》里说,不靠神仙皇帝,只靠自己救自己。而新中国建国后,却出现了“大救星”。不但是“万岁”,而发展到“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这些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上一个历史发展阶段,连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都没有接受。一个资产阶级的民国总统孙中山,不准喊他“万岁”,而我们无产阶级却喊了,而且被广大人民接受了。于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是历史的必然性,是势所必至,理所必然的。“文革”这种事件的发生,显然不是由一个人或几个小丑、小人能发动起来的,也不是几个跳梁小丑可以随便利用的,不能只怪罪于毛泽东。毛泽东是不可否认的伟人,但也会受到不好的制度的影响,有了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土壤和环境,即使没有毛泽东,也会有其他人或早或迟以这种或那种的形态使其发生,不叫“文化大革命”,也会干脆就叫“武化大革命”。毛泽东本人不是也说过吗?“文化大革命”要几年来一次。前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写的名著《青年近卫军》中有一个情节,青年近卫军的领导被德军抓住以后,要被活埋,当他走过一个德国军官身边时,他对德国军官说:“可怕的不是你,而是你们的制度。”的确如此,希特勒这个法西斯头子,依靠它的制度把德国军人变成兽兵。上世纪70年代初,西德总理勃兰特却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以真诚反省的姿态,表示德国人的忏悔。同是一个德国,同是德国人,但制度变了,人也彻底变了。现在的德国,谁要是再公开宣传法西斯,那就是犯法。“文化大革命”时的红卫兵,手拿带有铁头的皮带,随便打人,把教他念书的老师活活打死。现在对30多岁的年轻人讲起“文革”中的惨事,他们无法相信,认为是天方夜谭。这就是因为体制发生了变化,反映出什么样的时代会造成什么样的人。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中国人民的重灾难,

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一笔宝贵财富,它
是用惨重代价、无数人的生命、鲜血换来的。如今
我们当老百姓的还是幸运的,老百姓幸运的是邓
小平从这笔宝贵财富里找到中国前进的方向,从
而寻找出正确的思想路线、经济路线和政治路
线,并且制定出相应方针、政策,最终发展成为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邓小平理
论。这个理论显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
他老人家空想出来的,而是从我们过去走过的道
路中总结出来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把我们
体制中的缺点突出地集中地暴露出来,使我们把
问题看得更清楚,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找到出路。
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这笔财富加以利用,邓

(上接 80 页)画卷也进入高潮阶段。官府宅第,
酒楼茶肆,店铺民居,鳞次栉比;仕工农商,男女
老幼,摩肩接踵;真是工笔传神,精致而微。据说,
南宋时期的临安城,这幅画的摹作复制品在杂卖
铺的售价已经高达一两银子。而张择端的
原作亦成为历代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对象。这
幅画卷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它真实反映
了北宋以来古代城市生活的巨大变革,城与市开
始紧密结合,随着古代城市经济发展,城市应当
具备的功能也趋于完善,市民生活日益成为城市
生活的主体。

据一些学者研究,自从北宋的“城市革命”
后,坊墙毁弃,街市融合,一扫唐朝以前古代城
市的森严封闭,古代城市的发展也由此走上多元
化的道路。比如,有国都、陪都之类的政治城市,
也有踞于战略要地的军事城堡;这一类型的城市
是以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威来带动文化和经济的
发展,而市场的商品流通,往往被控驭于官僚的
垄断体系之下。再有,就是江南新兴的多功能
综合城市,以及镇市之类的经济城市,这一类城
市较多地依靠民间的商品生产及市场流通,虽
然对官府也有依赖性,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这
两种不同类型城市的发展趋向,自宋朝始至明、
清时期更为显著。尤其明朝中叶后,江南地区
工商业迅速发展,两种类型城市的文化风格也越
来越截然不同。一种是“城”的文化,宫廷森严,
王府豪宅,京昆梨园,书店画铺,富有政治与文化

小平同志做得非常成功,挽救了濒临崩溃的党
和国家,为中国开辟出一条富强的康庄大道。为
了国家和人民的前途,我们应该不害怕把“文化
大革命”的真相说出来,以警后世,不致悲剧重
演。

杜润生同志说得对,“历史造成的损失可从
后来更大的进步得到补偿”。胡锦涛同志最近
讲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几条均作
为新起点,逐步走向科学社会主义,抛弃斯大林
主义模式。苏联亡党、解体,验证斯大林主义彻
底失败。历史的曲折造成的损失,往往可从后来
更大的进步得到补偿,不是吗?中国辉煌的改革
成就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责任编辑 吴思)

特色;另一种是“市”的文化,幽坊小巷,酒馆
歌楼,花山香阵,南货北味,见著于经济与市井
风俗。这大概就是京派与海派文化的古老源头
吧。

(责任编辑 吴思)

新而不猎奇 博而不芜杂
精而不晦涩 快而不粗糙

文摘报

仅有的一家由中央党报主办的文摘类报纸

邮发代号 1—4

2007 年刊出 100 期
全年定价 60.00 元
零售每份 0.60 元

本报四开八版,每周四、日在北京、上海、
武汉、沈阳、西安、济南、郑州、广州、兰州、乌
鲁木齐、太原同时印刷,国内外发行

欢迎向本社订购《文摘报》合订本。全年 6
册,每册 9.80 元。现有 2005 年以前少量合订
本,价格优惠

社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邮编:100062
发行部电话:(010)67078050(传真) 67078061

六十春秋忆李庄

燕 凌

60年前,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办不久,中央局组织部把我分配到这个报社工作。报社的同志们大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从事新闻工作的,编辑部和通讯采访部的骨干,大都比我们大三五岁,我们自然把他们当作老大哥老大姐。其中就有李庄同志。

初识李庄

我对李庄同志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的头一件事情,是由他和安岗同志“过于积极”地“组织”和发表的一条新闻引起的。

当时的《人民日报》,平时每天只出对开两版,第一版是时事版,第二版是地方版。那年8月初,第二版头条地位登出一条轰动一时的新闻:翟士贤献田。翟家就在报社驻地附近,是当地三大地主之一。翟士贤本人则是30年代初上中学的时候就入党的一位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奋不顾身做出不少贡献,当时是北方大学教员。按照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指示,当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刚刚展开。根据“五四指示”的精神,为了减少土地改革的阻力,说服开明地主主动地把土地所有权献给无地缺地的农民,本来是一件好事情。太行区党委、武安县委都号召“向翟士贤同志学习”。这条新闻是通讯采访部负责人安岗、李庄为了宣传根据“五四指示”进行的土地改革,抓典型,安排记者采写的。到了后来,土地改革运动越来越过火,献田被定为阻碍群众斗争的“方向性错误”。翟士贤在北方大学遭到批斗,为此坎坷一生。安岗、李庄则在报上公开作了“检讨”,上纲说自己“由于没有坚决站在农民的立场,不自觉地扭到了地

主方面”。

当时我对于这件事情是想不通的,对土地改革运动中的过火的做法也是心怀疑惧的。但也只能告诫自己,有这种情绪是由于自己的立场感情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对于这两位老大哥在报上作公开检讨,我心里有说不清也说不出难受。实际上并不认为事情真有那么严重,同时又提醒自己,作为刚到解放区不久的知识分子,更要注意“锻炼自己的立场”。

后来渐渐知道,李庄特别克己忍让,成了报社里大家认为“最善于做检讨”的人。在报社通讯采访部(同时也是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安岗是第一把手,李庄是第二把手。主要是安岗出主意的事情,受到了上级批评,也多是由李庄执笔写检讨,共同负责。在工作中,他常常采取低调的求实的态度,写起检讨来,则严于责己,调子很高,力求“深刻”,也就容易过头,而过头也往往容易“过关”。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作检讨是“诚恳的,并无任何为难之处。但以戴帽子的方法代替具体分析,这种检讨不能律己,更不能服人,实不足取。”——其实,当时在政治运动的高压下,有的“检讨”也是无可奈何而为之。所谓“诚恳”,“无为难之处”,不过是在某种大气候之下的一种自欺,是对无奈的一种不自觉的掩饰。在内心深处,还是无可奈何。而自己在经历过“整风”的“锻炼”之后,作为“驯服工具”,这种表层的“诚恳”几乎已经成为第二本能。特别是对于他这个献身于革命而又信奉中庸之道的人来说,更是这样。

人民日报社这些老大哥老大姐们,抗战开始不久就在太行山山沟里活动,环境闭塞,生活艰苦,在反“扫荡”时期更是艰险备尝,从20岁左

右奋斗到30岁上下，日想夜盼，盼到了抗战胜利。刚刚“一肩行李下太行”，在中等城市邯郸创办了《人民日报》，刚一个多月就只得离开城市，向后转，再到农村，再上山。我们到报社的时候，在武安南文章村，不久再西迁，到河西村，又是山区了。可是，大家都认为，拳头缩回去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相信再坚持几年，就能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几年？至多再来个“八年抗战”吧！不可能再有反“扫荡”那样的日子了，总比那个八年要好过得多。一迁再迁，依然人人斗志昂扬。

报社的知识分子们，原先毕竟大都来自城市，离开城市久了，未免想念城市生活。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胜利以后要去办报的地方设想为北平，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工作之余闲谈起来，不时来个“精神会餐”。并不只是念叨什么著名的餐馆美味，更有兴味的是种种文化生活，特别是议论到了城市里怎样把报纸办得丰富多彩。大家摇笔杆子手腕已经很累了，还要到池塘边洗衣服，感到有些沉重。李庄开玩笑说：捉住了蒋介石，叫他给我们洗衣裳。大家哈哈大笑一通，也就把疲劳驱散了。

谁也没有想到，战局时局变化得这样快，1947年秋天，解放军就开始战略大反攻，冬天，华北全境除了少数城市以外，都解放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大片。中央决定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1948年5月，华北局决定，《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合并为华北局的机关报，仍名《人民日报》。1949年1月1日，以叶剑英为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31日下午，我们作为头一批进城的文职人员，从西郊乘三辆大卡车，进西直门到了北平城内。8月1日，华北《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央党报。

仗义为“大老虎”开脱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期间，秘书长王友唐被当作“大老虎”，隔离审查，并没有任何犯罪证据。只是由于他负责管理行政工作，经手财物较多，就被认为“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他

从抗战开始就参加革命，一直在太行山一些文化单位担任这种繁杂的工作，一向任劳任怨，清清白白，富于开拓精神，为文化工作创造物质条件，为同志们谋福利，为一起共事的同志们所称赞。李庄当时担任报社管这次运动的“节约检查委员会”的编辑部分会主任，他凭着自己对老王的深切了解，坚决不同意把老王“关禁闭”。他一再向邓拓同志正式提出这样的意见，认为这样对待老王是违法的，要求老邓干预此事，予以纠正，并且郑重地提出，愿意用自己的党籍保证，老王不会贪污。可是，由于其中有山头情绪在隐隐地起作用（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报合并的时候在人事安排上处理不周，原晋察冀的一些同志一直有气），有些人抓住一个在运动压力下假坦白的人交代的材料，加罪于老王，说得很邪乎，“涉案”数字很大，真实性很可疑，按常理本来应该先把那人查清楚之后再追究别人。可是，在“运动”的高压氛围中，老邓也无可奈何。不但老王被继续隔离审查，连李庄的“节约检查”分会主任的职务也被解除了。李庄无奈地说：老王出来以后，我先和他下一盘棋（表示慰问）。王友唐是我的同乡，老家两个村子距离只有几里地。他的兄弟王经川早年参加革命，是我敬仰的一位作家（笔名魏伯），我走上革命道路也受到他作品和为人的影响。我1946年到人民日报社以后，王友唐一直关心我。“三反”期间，我自然对他很同情，根本不相信什么“大老虎”的说法。在批斗他的大会上看到他满脸微笑，从容自若，就更加放心。李庄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我也更加敬佩。几十个人内查外调几个月，连老王的老家以至妻子的老家都查遍了，假坦白的人的说辞也彻底推翻了，事实证明，王友唐的确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李庄自然也很高兴。

《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央党报以后不久，李庄就改任总编辑室主任。我作为编委会政治秘书和版面编辑工作负责人，同他一起在一个小房间里工作，自然常受教益。1952年整党以后，编委会政治秘书一职取消了。我要求到农村组（后来改称农村工作部）工作，得到邓拓同志批准。李庄担任总编辑室主任期间对农村工作特别关心，而且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正在这时候开始发展，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调查研究，他就经

常同我一起磋商了,对我常有亲切的帮助。

“合作化”宣传的遗憾

建国之前,最高领导人就确定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大政方针。建国后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发展前途教育,有一个响亮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报刊上宣传苏联的文章,电影院放映苏联电影,总是高调渲染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1952年夏,国家农业部出面组织全国各地一些农业劳动模范和农林工作者到苏联参观学习了三个月,主要是看一些拔尖的集体农庄。他们回国以后,在北京停留了一段时间。中央领导人指示,要人民日报社派记者采访他们,集中报道,以此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

报社农村组人手不够,李庄作为总编辑室主任,负责从社内别的部门抽调子冈、赵培兰、陈大可等人,与农村组的部分同志一起,组织了一个临时的采访班子。报道计划由他和我商定,写出稿件由我“总其成”。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苏联的真实情况,按照国内当时的实际需要,李庄提出,不可过于突出地片面地宣传所谓苏联农民的幸福生活,以免助长一些人急于“攀高”的倾向,而要比突出地讲生产力的发展,这才是为远大前程打基础。还要强调按劳分配,科学管理。大家分头采访后写了几篇访问记,在版面上挂了一块“苏联农民的道路就是中国农民的道路”的牌子,陆续发表。我特别注意到李顺达访问十月胜利集体农庄的材料,写了一篇《从一个集体农庄看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历》,放在最后,在纪念“十月革命”的11月间发表。其中特别介绍了苏联农业集体化初期这个农庄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的危害,一度办“公社”,生活集体化,办公共食堂,弄得乱糟糟,破坏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真是害死人。那位农庄主席告诫李顺达,切忌他们走过的弯路,从中汲取沉痛的教训。李庄后来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说:“这些教训同我们后来‘大跃进’中的一些教训何其相似!前车之辙看来不是都能成为后车之鉴的。”还说,不知道“这篇文章为什么未使某些头脑发热者清醒清醒”。其实,在那个人迷信的时代,一声号令就能

震撼得地动山摇,小记者的一篇小文章能起多大作用。

1953年初邓子恢同志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后,报社由李庄负责与他们联系,李庄和我们一起探讨农村报道和评论的时间很多,还时常一起到西郊农村工作部驻地去,向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李庄在太行山时代的老相识杜润生同志请教。我们一致服膺邓老和老杜对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反对脱离实际急躁冒进,提倡一切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此后,我们按照邓老和老杜的意见报道和评论农村工作,大体上顺利而舒畅。李庄还特意抽出时间到农村去进行调查研究,证实邓老的指导思想确实切合实际,受到下面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衷心欢迎。

好景不长,到1953年夏秋之间,最高领导思想从支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一变而为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批评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批评了邓子恢的方针,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报社大张旗鼓地宣传,特别是向农民宣传。

我们怎么办?李庄一时精神恍惚,对我们说:“跟不上啊!”作为“驯服工具”,跟不上也得跟。在“绝对权威”的号令下,只能像李庄所说的,“找一切理由说服自己,要充分认识他是正确的”。他说:“我原来衷心赞成邓老对互助合作的意见,现在听说毛泽东对此提出了批评,我立刻毫无根据地认为主席的见解毕竟是高。”还说,原先自认为到农村调查后摸到了农村干部的脉搏,听到毛主席的新意见,又对自己说:“那不过是个别地区部分干部的反映,毛主席才是高瞻远瞩,综览全局,拨正了运动发展的方向。”他后来回忆,“这就是我当时的思想水平和精神状态,新闻工作者不可缺少的独立思考精神是太少了。”我那时候的“思想水平和精神状态”也只能是与他在一条线上。1953年夏秋之交,突然出现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中央提出只有加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走出危险境地,走上光明大道。我们也就“恍然大悟”,全力投入这场“大张旗鼓”的宣传。李庄和我与很多同志一样,当时对宣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都是很卖力的,我们完全想不到这样做会有后来出现的那些恶果。

邓老则一直是很清醒的，坚持着他的见解。毛泽东对他越来越不满意。1955年7月，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邓老用“大炮轰”。10月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把邓老作为“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批判的声势更加浩大。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随之爆炸式地上升，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正像毛泽东所说的，是一场“大风暴”。

那时候，李庄作为具体组织《人民日报》的农业合作化宣传的编委委员、总编辑室主任，一方面也为合作化的飞速发展而兴奋，另一方面也还有些困惑，总觉得不正常，心里不踏实。我心里也未免犯嘀咕。这种思虑，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难免露个头，可是谁也不敢说透。内心有复杂的矛盾，还时时担心曾经按照邓老的意见进行宣传报道会挨批评。六中全会期间，就以“补过”的心情赶紧集中发表“大发展”的文章和报道。六中全会以后，李庄和我们一起按照这次全会的“新精神”，战战兢兢地拟定了一份关于合作化的宣传计划，由邓拓报送中央审批，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怎样的命运。毛泽东对我们的宣传计划的批示，出乎我们意料。他提出：直接影响农业合作化的右倾思想已经解决，当前要强调提高合作社的质量；宣传要力求解决实际问题，要提倡及时解决问题，不要问题成了堆再去解决；要随时就下边发生的问题写评论，加强及时指导实际的作用。邓拓把这个批示传达给我们以后，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至少，看来不会挨批评了。更重要的是，不再强调加速发展而强调提高质量、解决实际问题了，这正适合我们的心思。我们一下子来了劲，在李庄帮助下，我们连续起草了《发展农业合作社必须注重质量》、《一有问题就去解决》、《解决新问题，巩固合作社》、《闻胜勿骄》等一系列社论，反对合作化运动中那种简单粗糙、不切实际，急于争先进、赶任务、比数字的做法，批评了动员群众入社的时候断章取义、信口开河的宣传，提醒人们及时发现和切实解决快速发展中发生的种种问题。

可是，“高潮”一经掀起，注重提高质量、及时解决问题云云的论述就都很难再起多大作用，只不过说说而已，哪能抗得住对“右倾机会主

义”“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连续“用大炮轰”的威力。对于农业合作化的狂风骤雨般的态势和来自最高领导的指示的多变，李庄总是连叹“跟不上，跟不上”。看到毛泽东在《中国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说“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我们也觉得自己太“右”了。当时我们谈起来“高潮”中的种种现象，不但望洋兴叹，甚至瞠目结舌。正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所说的：“加速合作化的群众运动的浪潮，像海啸一般席卷中国的大地，几个月的工夫，合作化就骤然完成了。”这样的“完成”，其后果也就像海啸过后一样，一片狼藉。在看到恶果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李庄就又想到邓老和老杜，说起来依然满怀深情，赞佩不已。

“大跃进”之后的尴尬

1958年“大跃进”、“公社化”期间，李庄被派到莫斯科当苏联办的《苏中友好》杂志的顾问，我则自请下放到延安农村劳动锻炼，我们俩都没有经历那时候的报纸宣传。我在1959年回到报社农村部，由于讲了人民公社制度违反经济规律的话，加以1958年在延安写了报告反映“大跃进”中的虚夸、强迫命令等问题，在“反右倾”运动中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被撤去农村部副主任职务，降了两级，仍在农村部写评论。1960年3月李庄回报社，任农村部主任，私下对我深表同情。看到几个熟悉的同志都吃了“右”字的亏，他自然更加小心谨慎，既为“左”祸愈演愈烈忧心忡忡，又怕在农村宣传报道工作中“跟不上”而“犯错误”。不得不维护“三面红旗”，又没有多少好事可说。前两年报上吹嘘了那么多不着边际的大话，要从天上回到地上，这个弯子可怎样转。群众在饿肚子，还要说“形势大好”？他说，做了二十多年新闻工作，从来没有遇到这样尴尬的事情。我完全理解，他在那时候是多么犯难。无奈，在报上只好多讲业务性、技术性的事情，避开政策性、思想性的问题。他概括为两句话：少说人与人的关系，多谈人与物的关系。甚至写社论也是如此，那时候的许多社论，实在不成其为社论，而更像是农业技术普及读物。上边指

定的题目,如公共食堂,说是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必须坚守,要旗帜鲜明地突出报道,写社论赞扬;自己心里满是疑问,也得捏着鼻子执笔。上边说只能正面宣传,表扬好人好事。李庄一面照办,一面嘱咐大家:讲好的也要实事求是,宁可留有余地,不可说得太过。选择典型,不可选拔尖的,那无法推广,最好是“中不溜”的,多数人都能学。这是他一贯的指导思想。他坚持:做新闻工作必须实实在在,不要追求作惊人语。普普通通,才能真正发挥指导性。

眼看“大跃进”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严重,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觉得这与自己的想法相符合,很高兴。李庄则认为,调查研究固然好,可是现在做起来相当难。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何出现严重的全国性的偏差?并不是没有人了解实际情况,并不是没有人提出正确意见,而是由于主要领导人听不进不同意见,谁反映了实际情况谁遭受打击。1962年初举行“七千人大会”,说是保证“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皆大欢喜”,宣布可以自由发言,“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这时候,“反右倾”运动中给我做的“结论”和给我的处分一风吹了,我自然很高兴。李庄则仍然认为这次大会还没有解决形成严重困难的主要问题,因为定了一个调子:“三面红旗”必须坚持。当然,这想法他并不敢公开表露,只能私下半吞半吐地透露一点。不久以后,他参加了全国人大的一次会议,听了周总理在政



1986年,安岗(右六)、李庄(右四)、燕凌(右一)、宋琚(右二)等在参加“安岗从事新闻工作50周年座谈会”后合影

府工作报告中对“大跃进”以来的缺点错误作了公开的检查,还说明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再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指出国内阶级斗争正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不断尖锐化。这个报告受到全体与会者热烈拥护。他听了周总理的报告特别高兴,回到报社转告了大家,大家也为之兴高采烈。正准备按照这样的新精神进行宣传,传来“中央指示”,这次政府工作报告的全文不在报上发表。这是没有先例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都说“不解”——大家心里其实都明白,只是谁也不说出来,甚至自己警告自己:涉及中央内部分歧,想也不要想。

农村人民公社实在难以照原样办下去了,“人民公社”的名称却不能改变。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以后一次又一次修改,一次又一次后退,就管理体制说退到同原先的初级社差不多。第一次大修改,是取消公共食堂和供给制。这时候,吴冷西、李庄任正副组长的调查组在北京郊区房山羊头岗做了半个月深入的调查,着重了解农民心里最大的疙瘩是什么。证实了群众最恼火的就是公社的公共食

堂。1960年李庄在奉命写那两篇鼓吹公共食堂的社论的时候就很有抵触,这时候有了“解放的愉悦”。

有一天,我正在对比《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几次修改稿,写一份材料说明每次都修改了些什么。李庄看到了,提出警告,说不要写这样的东西。显然,他认为这材料会显示出来最高领导的多次失误,写这种材料的人以后又可能遭遇不幸。我告诉他,这材料是吴冷西要我整理的,他才释然。但我内心又一次深切感受到他对我的爱护。

十年浩劫轶事

“文化大革命”正在暗中准备、即将发动的时候,人民日报社的头头吴冷西与中央最高领导的联系就被掐断了,社内同志们当即陷于非常尴尬被动的境地,处境险恶。千方百计,费尽心思,也赶不上趟。因为“史无前例”,不知就里,用正常的思维习惯,无论怎么做也是错。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当奉命转载5月4日《解放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爆破人民日报社的第一颗炸弹引爆了。就当天的版面看,第一版容纳不下,主持报社日常工作的一位副总编辑决定把这篇文章加以删节。李庄当时是分管夜班工作的副总编辑,他本来认为还是全文转发为宜,但主持工作的同志执意要删。李庄怕交给别人删节会删得不恰当出乱子,只好自己和一位老编辑同时动手,在看来有些重复之处删了几百字。当时他们都不知道此文是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一点也动不得。不然,哪有这个胆量!报纸一出来,康生看到了,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严加指责,趁势追究,说《人民日报》上出了这样的大错绝非偶然,就在会上查根源,追动机,声色俱厉。

在报社以常写检讨、善写检讨、勇于承担责任出名的李庄,这次当然又得写检讨。过去他的检讨总是比较容易“过关”,这一次可就大不相同了。检讨书写了一次又一次,认错再认错,上纲再上纲,总是通不过。康生还说,这个检讨还要登在报上,公之于众。压力就更大了。他后来对同志们说,那几天真是度日如年,寝食俱废,只觉得天

昏地黑。过了4天,有了转机,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在国际上的影响,决定此事不必登报检讨。这样,李庄才得以解脱。经此一击,报社的同志们也就被动地表现“积极”,连篇累牍地发表对“三家村”的大批判文字,照搬当时军报文章创造的种种侮辱人格的词句,无所不用其极。这也无用,《人民日报》早被内定为受到“资产阶级司令部”操纵,必须由“无产阶级司令部”派人来夺权——换领导班子。

李庄当然与报社其他领导干部一样,被解除了职务,接受“审查”、批斗,由造反派“革命群众”监督劳动。我在1964年被任命为报社编委成员之一、农村部主任,自然也忝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更加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文人”、“阶级异己分子”等等帽子,被关进“牛棚”。李庄的劳动项目,头一年多是在搬运组搬运每卷半吨重的卷筒新闻纸、每箱50公斤的制作油墨用的松香。就在这时候,他的腿被沉重的卷筒纸砸伤了(留下后遗症,容易跌倒,最后的中风可能与此有关)。受伤后,被派到图书馆打扫阅览室、厕所。我在“牛棚”里和胡绩伟、田钟洛等同志在一起接受“群众专政”的管制,每天被押送到不同的地方从事各式各样折磨人的劳动,与李庄很难碰上一面。

有一次造反派批斗我,拿着从我家里搜查没收的一个笔记本,指着上面记录的一句话,追问来源。那是讽刺政治运动中无限上纲的手法的:吐一口痰,引申开来,说这直接传染了多少人,又间接传染了多少人,以致妨碍了社会主义建设,也就会被说成是反革命。我没有应付这种局面的经验,也怕被说成是我自己的创造,本能地要自保,就老实交代是李庄作为一个笑话对我讲的。那时候李庄大概正在干活,穿着一身脏了的劳动服,被拉到斗争会场上对质。这对他来说也是突如其来,难以应对,他就按照造反派给我戴的帽子厉声说:我怎么会对这个阶级异己分子说这种话!我从来没有在运动中挨过整,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其实,我认为很精彩而记录下来的这句话,本是另一位副总编辑在一次小范围的会上说的,李庄觉得这句话很形象也很准确地揭示了政治运动中随意上纲的荒谬,就在一次闲谈的时候转告给我了。他也许已经忘记了这个过节,在

突然袭击中无意识地作出了保护自己的反应。

1968年秋天,人民日报社的人员开始轮流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被剥夺了工作权的领导干部则是长期在“干校”劳动。“校址”先在北京房山农村,后来改在河南叶县农村,最后迁回北京远郊小汤山

附近,房子都是“学员”们自己动手盖起来的。李庄和我都长期在三处“学习”,劳动则不同工种。虽然“同学”多年,但是由于都在被审查之中,只得有意识地避免接触交谈,犹如不相识的路人。

“难得清醒”终于清醒

毛泽东去世了,“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我被调到刚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参与创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离开了报社。李庄在1983年11月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到1995年8月离休。他离休以后,我写信给他,祝贺他“安全着陆”——在他以前人民日报社的历届总编辑中,他是唯一得以正常地干到最后的。我在信上说:能够如此,大为不易。看来惟“诸葛、吕端”一联可以当之。就是说,遇事谨慎,而大事不糊涂。在这以前,我寄给他一篇我写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叙述了1952-1953年突然终止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而大搞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那时候他仍然很谨慎,给我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但是如果还没有发表,还是暂缓为好。我说,已经发表了。他就说,时机不大好(1989年“政治风潮”之后不久),不过也不会有多大问题。他显得很高兴,



李庄写作间隙小憩

说起“文革”期间说过一些荒唐话,觉得好笑。我说:我也一样啊!很糊涂。(确实,到“文革”后期他已经开始有所醒悟的时候,我在很长时间还是个糊涂虫,在个人迷信的迷宫里爬行。)他说:彼此彼此,都过去了,要怪只能怪那一个人。有一次,谈起来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时候参加土地改革纠偏的事情,他问我当年在十里店采访我们工作的全过程的外国友人柯鲁克夫妇后来的去向。我告诉他,他们两位几十年来一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热爱中国,只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也遭到无妄之灾,坐了牢,有一段时间孩子们只得流浪街头捡垃圾为生。他为此很激动,不禁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大人物大表义愤。

他一再说,过去几十年也没有看清楚了许多不解的事情,现在才越来越看透了。20世纪末,他写了一本回顾自己的一生的书,从“启蒙”、“探索”、“追求”、“苦斗”,写到“攀登”、“考验”、“困惑”,直到最后的“沉思”。书名《难得清醒》。的确很难很难,可是终于得到了自己多年渴望的那种“清醒”。他应该无憾,自己是在清醒的状态中最后安息的。

(此文引述李庄的一些话,见于他写的回忆录《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和《难得清醒》)

(责任编辑 致中)

对父亲徐雪寒的零星回忆

大妹

编者按：

这是徐雪寒先生女儿回忆徐老的一篇短文。徐雪寒同志是一位令人十分尊敬的前辈学者和带有传奇色彩的职业革命家。他是新知书店的创办人，16岁时就任中共杭州地委组织部长，是解放后接管上海的主要成员，曾任多种重要职务，50年代初任国家外贸部副部长。徐老在1943年出任党在华中地区的情报领导机关——中共华中局联络部副部长，作为潘汉年的主要助手直接参与领导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工作，解放后因潘案蒙冤入狱，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平反。2005年4月徐老以94岁高龄去世。

父亲一生坎坷，1926年父亲加入了共产党。1928年初，他16岁时因叛徒告密被捕，在杭州和苏州的国民党监狱中呆了6年，1955年后在北京秦城等监狱中呆了十年，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在“牛棚”和“干校”中度过了大约十年。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他有二十多年是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度过的。

我对父亲第一次有记忆是1949年，母亲携奶奶、我们三兄妹从香港回到上海，在三叔婆家里见到他。之后就是他在上海铁路局当局长时。那时他在办公室搭一个行军床，吃住都在机关，只有周六晚上住在家。每个周六晚上他回家吃晚饭时，一进门我们三兄妹就雀跃欢呼，一拥而上，有抱住他腿的，有挂在他肩膀上的。当时听母亲说，每个周六夜里都是谈公事的电话不断，吵得无法睡觉。年长我四岁的哥哥比我多的记忆是父亲被派到某地工作，待全家迁去时，父亲早已又到另一个地方去工作了。记得大约在1950年老师出了作文题目“我的父亲”，哥哥详细写了家从一处迁一处，又迁一处，却总也见不到父亲的情形。老师的批语是“像捉迷藏”。1952年秋父亲调至北京任中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1953年初全家迁到北京，机关和家只有走几分钟的距离，奶奶为了父亲的身体健康，要父亲回家吃饭，以便对点口味。平时中午我都带饭到学校，周六

因下午无课回家吃午饭。可是每个周六中午都饿得咕咕咕的才能吃上午饭。因为父亲从来不能按时回家，而他不回来奶奶绝对不让开饭。至于他的晚饭更是没有钟点。当时我和父母、妹妹同住在一间大房间里，那里还同时是父亲的办公室和会客室。靠近我的床头有一个小圆桌，每天夜里待他回家，母亲用煤油炉给他热饭后，他一边在那小圆桌上吃饭，一边和母亲说话，我常被他们的声音从梦中吵醒。当时规定，按他的级别每年可携全家去北戴河休假，但我们从未去过，因为父亲说他年纪轻轻的，工作要紧，休什么假？不过那时候，周日有时他会带全家去故宫、北海、颐和园等游玩。

然而好景不长，1955年4月的一天，他去上班后就再没有回家。警卫员和司机告诉母亲，中组部将他留下有事。刚开始时，母亲和一些来访的叔叔、阿姨还猜测他是有什么特殊任务了。因为当时正值万隆会议，一架飞机被国民党放炸药炸了，大家猜测他的不在，可能与处理此事有关，那一年我十三岁，妹妹八岁。哥哥在那年夏天离家去苏联读大学，家里就只有我、妹妹、母亲和奶奶了。后来母亲对我说，家里的事不要我管，天塌下来她顶着，我管好自己的事，把书念好就行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可能有了点什么事情。如有一次母亲带我、妹妹和奶奶去照

相馆拍照,似要寄给什么人;有时母亲又会一个人躲到奶奶房间里去写东西。有一阵放“五四”以来的老电影,每当我唱“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的插曲“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时,奶奶就会让我别唱。需要附带讲一下的是,奶奶虽然是父亲的继母,但父母对奶奶极好。父亲每月的工资一直是全数交给奶奶的,直到奶奶年迈不能管理为止。母亲每天下班回家先要向奶奶问候,我从未见他们婆媳之间红过脸。我知道奶奶是父亲的继母已是六十年代,由我哥哥口中得知。当时我根本不相信,问他是否搞错了,他表示他也觉得很惊讶,这是当时他的女朋友(后来成为我的嫂子)从介绍人(二姨妈)处得知的。

1955年后,父亲的工资和住房一直照旧未动,我也遵照母亲的嘱咐念好我的书,从未问过她父亲是怎么回事。等到再一次见到父亲已是1966年的“五一”节了,当时我已是大学教师。四月底教毕业班的老师和毕业班的学生提前从河北农村“四清运动”中回到学校,我得以从天津回北京过“五一”节。回家后,母亲交给我一份手抄件,它竟是1965年8月对父亲的判决书,父亲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2年!父母都不想让我们为此对党有怀疑,故对此事未作任何解释,只告诉我要将这事向组织汇报。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脑子里全是电影里演的“叛徒”、“特务”的情景,以至于妹妹去天津看我时(大约为1967年)我还提醒她不要受父亲的思想影响(她当时在北京上大学,回家的机会较多)。但妹妹说她觉得父亲对文革中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是对的。

随着文革的深入开展,“叛徒”、“特务”满天飞,人们的思想都有了变化。妹妹1970年后分去内蒙工作,哥哥则于1960年回国后先在湖南



1954年徐雪寒率团访东欧时在波兰签约

后调江西工作。这样三人中唯我离家最近,加之随着运动的推进,学校管得较松,我回家的次数增多。逐渐地我了解到父亲虽然一生主要从事文化和经济工作,但因为他有特殊的社会关系(其姐夫曾是蒋介石的副侍卫长,而表妹夫二十年代留俄时与蒋经国相熟,回国后在国民党军统中任要职),曾受命搞过情报工作,并为潘汉年当了一年多的副手。1955年“潘杨”案一发,他自然成了受审对象。母亲说1955年父亲离家不久,时任外贸部党组书记的解学恭曾专门告诉母亲,父亲的问题审查清楚了,没什么事,很快就可以回家。但随着潘汉年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父亲的事就再没有消息了。后来听父亲讲,当时审查他的人让他承认自己是特务,说只要你承认是特务立刻放你回家,照常工作。他说我不是特务,怎么能承认自己是特务呢?那一位就说:“你不承认,那你就在里面呆着吧。”就这样,父亲一呆就是十年。在里面当然少不了写各种交代材料,除此以外,他读书,翻译书。种菜,养兔子是他在秦城为



徐雪寒与夫人朱光照(1994年)

自己争取到的一点点户外劳动权。最后的判决让他非常意外,但他对审判人说既然党认为判我刑对党有利,我签字。签字之后,公安部放他回家,他对审判人说你们知道事实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要回家,我在监狱里呆下去好了。但他的要求未获批准。就这样,父亲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渡过了文化大革命。打倒四人帮后,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在好心的唐姐姐的帮助下,父亲的申诉材料才得以交到了胡的手中。随后他的老战友薛暮桥、钱俊瑞、骆耕漠、孙冶方、许涤新、石西民(其中,薛和骆是和父亲同时关在杭州陆军监狱的狱友)六位在五十年代初即为高级干部的叔叔伯伯联名上书中央,要求复查父亲的案子。当时对平反文革前的冤案阻力仍很大。经过多方努力,最高人民法院才在1981年宣布撤销父亲是反革命分子的判决,此时父亲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距1955年他被秘密关押起已经有二十六年,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六年!

说到父亲,不能不提到母亲。母亲的一生也不比父亲幸运多少。他们结婚六十年,除年近七十之后,都是聚少离多。1949年前父亲为革命整天不着家,且时时都有被捕杀头的危险,母亲除了要挣钱养家外,还要为父亲担惊受怕。好不容易国民党败退至台湾,好日子没过几天,父亲就又受牢狱之灾。彭德怀的夫人是母亲的同事,是

个十二级干部,在彭出事不久两人就离婚了。但即使如此,很多党内会议她仍无权参加。母亲作为长期受审者之妻,在单位受到的政治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而回到家,面对的则是思子心切的奶奶。同时,母亲还要为我和妹妹撑起一片能让我们身心健康成长的天,不向我们诉说心中的苦楚!听母亲说父亲出事后,

外贸部的一位副部长曾找她说要停发父亲的工资,母亲找到另一位副部长雷任民,表示她的工资可以养活全家,但要求知道父亲到底有什么问题。雷将母亲的要求转告了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安子文。结果父亲的工资和我们的住房一直保持不变,直至判决为止。顺便提一下的是1979年我出国前,母亲让我去谢谢雷伯伯(雷与父亲并无私交)。当我们去后,雷对我说:“我早知道你父亲的事是冤枉的。”因他与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及负责审查父亲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同为山西牺盟会的,关系比较密切。打倒四人帮后,母亲曾托她的老师孙起孟转交申诉材料给安子文,安当面面对孙讲:“这是我经手的错案,但现在这事已不归我管了,我只能负责批转……”

当1965年秋领导通知母亲父亲的判决结果后,母亲不得不表示要和父亲离婚,划清界限。但母亲所在的北师大党组织派人做母亲的思想工作,不但不许她提离婚,还要她好好照顾父亲的生活。可是到文化大革命时,母亲又被批为与反革命的丈夫划不清界限,并为此进了“牛棚”。母亲因受父亲问题的株连,从五十年代初全国干部定级至文革中退休,一级都没有升过。当年和她同级的大舅和二姨父在此期间都各提升了三级。1981年父亲的反革命分子帽子取消了,她受的株连却无反可平。而她只要再升一级就可以有较

好的医疗待遇了。母亲至死也未能得到她应享的医疗待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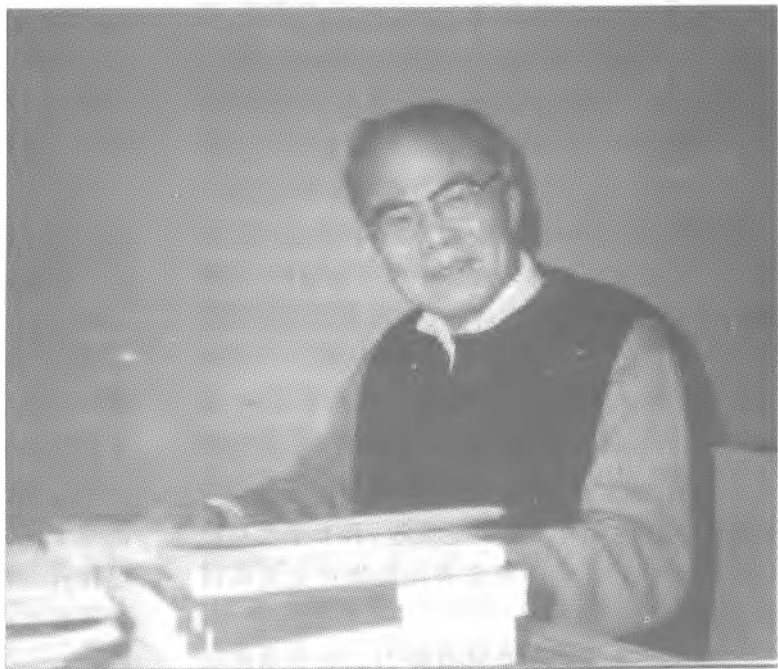
文革中父亲身为假释出狱的反革命分子,在“牛棚”中受到的待遇可想而知。当时父亲所在的国家外文局的“牛棚”中,最大的“牛鬼蛇神”是外文局局长罗俊。罗与父亲在此之前并不熟识,但在“牛棚”中由于父亲的耿直和坚强不屈,以及两人的观念相同成了朋友。待到形势松动后,罗不止一次到我家来看望奶奶,为其拍照等。听说外文局很多人都认为父亲是一条“硬汉子”,连看“牛棚”的工宣队员后来都对父亲不错。记得有一次父亲回家,身边是看管他的工宣队员。恰逢我也在家,父亲非常高兴,询问我的情况如何等等。因为有工宣队员在场,我不敢多言。事后,母亲告诉我,该工宣队员对我很不满意,说我对父亲太不热情。

和父亲一起工作过的人,尤其是1949年前一起工作过的,后来大多成为父亲的朋友。即使在他去向不明的十年里,每年年初二总有大批叔叔、阿姨携全家来看望我奶奶和母亲,这一天总有一二百人之多。有一年,母亲为了送客连脚都走肿了。其实这些叔叔阿姨们大多为各自工作单位的各级领导,风闻父亲出事了,但他们不相信父亲是坏人,故在1965年判决前每年相约来我家拜年,给了奶奶和母亲很大的安慰。待到父亲判刑回来后,仍有像张启宗等叔叔不止一次上门探望。父母为避免对他们有不好的影响,一再不让他们上门。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我从庐山参加全国物理学年会回京,因公在京滞留了几天,接到同事来信说学校有出国考试,可以自由报名。我的教研室领导已替我报了名,让我赶紧回校准备考试。当时正好许静叔叔来家看望。因为父亲的问题,我担心政审有问题,许叔叔告诉我,按国家政策,父亲已不是现行的杀、关、管人员,我出国应该没有问题,但各单位的土政策就不好说了。有了许叔叔的这个消息,我才下决心去参加考试。最后为了政审,父亲又找到许涤新伯伯,在他的帮助下,学校按国家政策通过了对我

的政审。1980年1月,我出国进修,临行前父亲特别嘱咐我“国家送你们出去是希望你们回来出力,不要将家庭受的委屈记在心上”。我也按照他的嘱咐于两年后按期回国。

我从未听说过父亲对他的十年秦城冤狱抱怨过。我想在他因爱国而选定革命时已将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脑后了,个人的委屈当然只是小事一桩。其实早在他1933年从国民党监狱出来之时,就有人劝他别再回共产党,说“你若回去,早晚会为坐监之事吃苦头的”。我的姑爹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因为与死于北伐的小伯父是好友,因而成了我的姑爹。姑爹和父亲政见相左,走着截然不同的路。但父亲不仅是姑爹的内弟,也是他亡友的幼弟,父亲常年不在家,奶奶遵从当时的传统与我们住在一起。故姑姑家对我们一直是照应的。记得小时候当姑姑在上海小住时,她会教我认方块字,带我们去西餐厅吃三明治,去有冷气的电影院看电影,这在当时可算是特别的享受了。也记得姑姑在南京住的是独门独院的小楼。现在想来,那时姑爹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一定已经不低了。父亲若不是一心为劳苦大众,追求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他是完全可以选择另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的。

父亲十六岁就被捕坐牢,他在校学习的学历不高,但他终生好学。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他和牢



1991年徐雪寒80岁生日时摄于书桌前

友一起想方设法将许多公开的和非法的书籍弄进监牢,抓紧时间刻苦学习,在那六年里他还自学了日语。出狱后,翻译了两本书,当时最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译著。他获得了一笔够他生活两年的稿费。他是在牢里念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狱后,他用在牢里学到的经济理论分析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发表了一批经济研究的文章,所以他说他是上的“牢监大学”。他在五十年代前期主管对东欧国家的贸易,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开始自学俄语。文革后期至八十年代初,为了以史为鉴,他还抓紧时间读中国的二十四史。事实上,只要没有工作任务,没有家务活,没有朋友来访,他总是手不释卷的。

父亲一生真是“党叫干啥,就干啥”。1935年他与一批社会活动家一起创办新知书店(后与读书、生活合并成为三联书店)并任总经理。1936年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主编《救亡情报》。随后任全国救国会副总干事。1941年他和汤季宏叔叔等冲破日军重重封锁在上海把进步书刊输送到苏北等根据地,并协助敌后根据地在上海承办和运输军需物资。1943年奉命进苏北根据地在新四军军部协助华中局潘汉年做隐蔽战线的工作。抗战胜利后被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不久奉命在上海、香港等地筹建一批公开的贸易公司、银行、钱庄,进行合法的商业活动赚钱为党筹集资金。1948年共产党接管第一座大城市济南市,他又由香港调至济南军管会接管交通铁路系统。随后随军接管上海时又被任命为华东运输部部长、上海铁路局局长、华东贸易部部长等,直至1952年调为中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一生中他的工作不停地变换,每一行都要从头学起。正是依靠刻苦学习和苦干实干的精神,他在每个岗位上都取得了好成绩。听母亲说王昆仑伯伯曾告诉过她,周总理有一次特别表扬了一位为革命干了许多不同行当的同志。说他干一行,钻研一行,并在那一行做出优异成绩。王说,这指的就是父亲。但父亲从未向我们提起过他的成绩与辉煌。只在晚年有一次听他说过,五十年代初期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表扬他物资交流搞得好。

父亲在各方面都非常有毅力,对身体也如此。他几十年坚持每天冷水擦身。所以虽然几经

牢狱之灾,身体仍很好。七十岁时人们还说他走路一阵风。但1981年任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常务干事后,他一心想弥补二十多年未能为国为民工作所浪费的时间,连周末都每天十几小时趴在书桌前看文件、看资料、写东西,努力探究改革开放的最佳道路,身体逐渐不行了。对他搞的经济学,我一窍不通,只知道他当年一再建议要中央对上海“松绑”(减少上海市上缴的税务收入等)。说只要中央给政策,上海很快就会发展起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当中央领导接受了他的建议后,他非常高兴。也知道他对修三峡水库的意见和中央不合,但他还是要将自己的意见提出来,说这是他的责任。我常想,以父亲的耿直与认真,即使1955年没有被卷入“潘杨”案中,在以后众多的政治运动中,他早晚也是要倒霉的。

父亲知道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勉强我。说既然你对政治不感兴趣,那就好好的做你的学问。每年我用休假时间去探望他和母亲时,虽然他不懂我搞的生物物理,但他总要问我科研做出了什么成绩。每年回去时,看到他一年比一年衰老,但仍然拿着放大镜看文件、资料与报纸。直到不能起床之前,每晚的新闻联播,他是必看的。有朋友来时谈的都是国家大事。我曾劝他说,这世界上少了谁,地球都照样转,您这么大岁数,管那么多国家大事干什么?他总是一笑置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似乎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父亲的一生是不幸的,但比起死后才被平反的潘汉年和一度精神失常的杨帆,父亲又是幸运的。

我们的童年少见父亲的身影,母亲跟父亲结婚六十年,但七十岁之前很少有安稳的日子。从这个角度讲,父亲既不能算是好父亲,也不能算是好丈夫。但我尊重父亲,尊重他一生不谋私利,尊重他一生严于律己,尊重他为了实现自己“建成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的信念,奋不顾身地奋斗终生。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母亲已去世七年,父亲也于去年4月27日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文中提到的叔叔伯伯也多已作古。现仅以此拙文缅怀所有逝去的亲人和曾以各种方式给予我们帮助的叔叔、伯伯、阿姨、姐妹们。

(责任编辑 吴思)

往事悠悠忆尚钺

谈滨若

2006年7月,是闻一多、李公朴烈士殉难60周年,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在缅怀先烈崇高精神的同时,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重庆、昆明,当年,在艰苦的条件下,有一位与我们并肩战斗的老战友,他就是尚钺同志,虽然时间已过去60多年,但他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舍生忘死的情景,尤历历如昨。

抗日战争初期,我和丈夫华岗还有尚钺同志都在重庆工作,同住在重庆郊区永兴场附近,尚钺常来我家,我也有幸在尚钺领导下工作了一段时间。1941年皖南事变后,尚钺疏散到昆明,在云南大学任教,1943年,中央派华岗到昆明工作,我们又经常见面了。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循循善诱,诲人不倦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国民党真反共假抗日的面目越发暴露清楚,在重庆,原来的政治部第三厅,因汇集了重庆大批的进步文化界人士及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撤销了,后经周恩来同志与国民党交涉,才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尚钺就在其中工作。该委员会地点设在重庆郊区赖家桥,尚钺和我家就住在附近。

文化工作委员会虽成立了,但国民党采取种种限制和刁难,不让开展工作。这时有少数同志思想苦闷,但尚钺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反而表现得更加坚强。他经常来我家,与华岗研究如何开展工作。有时也探讨学术问题,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这样久?中国古代史分期和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我如饥似渴地听着,觉得都是新鲜的知识。有些问题我一知半解,就主动提出来,尚钺总是耐心地一一做出解答。

后来我也到了文化委员会,在图书馆工作,尚钺时任图书资料室主任,是我的直接领导。由于我年纪还轻,处世不深,工作经验也少,他对我以一种兄长加同志的态度,一点一滴地教我把工作做好,而且还鼓励我参加了世界语学习班。自然,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心情是非常舒畅的。

有一次天气突变,刮大风又下暴雨,中午我就未能回家吃饭,晚上下班时,雨下得更大,难以回家。当时我正患感冒,由于衣衫单薄,冻得浑身发抖,尚钺很为我担心;此事也被我的世界语老师——绿川英子得知,她马上脱下自己的外套给我穿,但我坚决不要,心想,宁肯自己挨冻,也不能让我的老师着凉。绿川英子是日本人,她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来到我国参加反战同盟组织,中国人民十分尊敬她。后来她和尚钺一再劝我:“你离家远,在风雨里行走时间长,如果病了,明天无法上班,那样既影响身体又耽误工作……”在他们一再劝说下,我只好服从了。不过当时因走得匆忙,忘记了关办公室的灯,第二天上班后,尚钺严肃地批评了我:“工作中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大意。”我觉得他批评得很对。

尚钺对同志的关怀、教育是真诚的。我到图书馆工作不久,与周围的几个青年同志由于对一些问题认识有些不一致,因而对他们态度冷淡,团结不够好,他察觉后,便找我谈话说:“你对人落落寡合,有点清高,是轻视别人思想落后吗?要知道抗战建国,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伟业,决不是少数几个人能成功的。我们的责任是要引导他们一起进步,一同干革命,不能三言两语话不投机,就不愿与人家交谈了,这不是放弃了我们的责任吗?”我听得心悦诚服,从此以后,我一直都很注意团结、帮助周围的同志。

尚钺对孩子剧团的教育更为重视。当年活跃

在重庆地区的一支宣传队伍——孩子剧团，他们共有二十多人都是从日寇占领区流亡出来的学生，大的十七八岁，小的十四五岁。他们仇视日本鬼子，有一定的革命觉悟。孩子剧团隶属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由于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教育，他们对宣传抗日十分积极热心，用歌咏、话剧、舞蹈、打花鼓等多种形式，奔走各地进行演出。全团人员不讲条件，带着简单的道具，废寝忘食地工作着，由于宣传形式为人们喜闻乐见，所以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但是，毕竟他们还是孩子，急需接受教育。我党和老一辈革命者从来都十分重视对青少年的培养教育，当时文工委的蔡馥生同志认为我有一定文化水平，又曾担任过保育院的教师，于是推荐我做辅导员，但那时我正怀孕在身，要和孩子们整天生活、学习在一起，有些难以胜任。于是，蔡、尚二位就暂时亲自参与授课及生活管理。尚钺重点抓政治，结合当时国统区黑暗、腐败的现实，用大量事实说明解放区的民主与进步；其次是气节教育，以自身的经历现身说法，培养他们在白区工作应具备的英勇、机智精神。尚钺还经常带领他们三三两两地来我家（人多了怕引起特务注意），请刚出狱不久的华岗给孩子们讲述在国民党监狱中，如何严守机密，不怕牺牲，不怕毒刑拷打，与敌人坚持斗争的故事，尚钺也常在一旁做启发引导。现在所处的环境犹如茫茫黑夜、荆棘遍地，如果一旦被敌人抓去，关进监狱时应该怎么办。通过许多深入的教育，孩子们逐渐变得成熟起来。他们中也有一些人不安在白区工作，向往延安，尚钺发觉后，总是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从思想上提高他们的认识。

尚钺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子女的教育也从不放松，他的女儿莉莉也在孩子剧团，年龄最小，身体瘦弱，可尚钺总是叮嘱：对她不能搞特殊化、要一视同仁，莉莉也理解父亲的用意，表现得特别好。

剧团的孩子们在党组织和周恩来、邓大姐的直接关怀下，幸福茁壮地成长着，后来都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有许多人还当上了重要的领导干部，这无疑也凝聚着尚钺同志的一片心血。

以革命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

皖南事变后，重庆文化界人士大疏散，我们和

尚钺、绿川英子等许多亲密战友都不得不暂时分开了，尚钺去了昆明。1943年，南方局领导周恩来、董必武同志指派华岗去昆明做龙云（时任云南省主席）的策反工作及知识界的统战工作，需要一个公开的社会职业做掩护，此时尚钺、楚图南、周新民等同志均在云南大学任教，为了尽快为华岗解决职业问题，尚钺将自己担任的两门课，分出一门“古文选读”给华岗，这样华岗便顺利进入云大教学，确保了党的统战工作及时开展。

当时在昆明，知识分子比较集中，除少数先进分子外，多数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了解甚少，大家出于爱国的情，要求民主进步、团结抗日；龙云是支持抗日的。华岗组织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帮助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学习、了解中共政策，参加文化研究会的有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李公朴等，他们后来参加民盟，对推动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起到重要作用。尚钺积极协助华岗工作，成为文化研究会的骨干。由于我党的努力，统战工作影响渐大，昆明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则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为了限制民主进步，他们指使特务摧残爱国知识分子。

尚钺等同志经常与华岗在一起商讨工作，研究如何支持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力量，如何办好民主刊物、发表有分量的文章等等，尚钺总是以革命事业为重，工作态度谦和，从不固执己见。

1945年秋，华岗应周恩来电召，去重庆担任国共谈判我方的政治顾问，组织决定，华岗走后，云南省的统战工作要由尚钺来接替，在这险恶的条件下，在艰巨的任务面前，尚钺没有丝毫的犹豫和畏惧，勇敢地挑起重担，他的无私无畏的革命气势，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弦。就在华岗即将离开昆明之时，国民党在昆明掀起了一阵反民主的黑风恶浪，形势越来越紧张，蒋介石反动派终于要下毒手了。有一天夜里，突然把云南省主席龙云用飞机押到重庆，那一夜，枪声一直不断，天亮以后，我上街一看，已是全城戒严，特务满街，便衣乱窜，抓人搜查，杀气腾腾。在这紧要关头，我们与外界完全隔绝，得不到任何消息。当时我家里有许多党的宣传品，华岗正在紧张地处理着……突然，尚钺冒着极大风险，化妆来到我家，他早已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首先考虑的是周恩来派来负责统战工作的华岗的安全。进门后，他简单地介绍了外面发

生的情况,便提出要华岗马上离开昆明,而华岗考虑到当时的工作,也提出种种暂时不能离开的理由,说:“情况如此危急,我更不能离开。”第二天,尚钺冒险再次来到我家,送来了去重庆的汽车票,并传达党组织的意见说:“为了党的事业,你必须立即离开。我留下来晚几天再走,这儿有许多社会关系可以掩护我。”次日他将华岗送走,自己默默地承担起许多艰难的工作,这就是尚钺对党的赤胆忠心的高贵品质的真实写照!

我知道,尚钺同志的经历是坎坷的。他是在1928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毅然加入共产党的。后曾两次被捕,受尽酷刑而宁死不屈,被组织保释出狱。1932年,任满洲省委秘书长时,因对省委工作提出不同意见,被错误地开除出党,他的妻子被张国焘当作反革命杀掉,儿子又失踪,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在这样严峻的考验面前,他没有消沉,没有抱怨,一边申诉,一边继续为党工作,在危难时刻,甚至不惜赴汤蹈火,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直到1945年,华岗介绍他重新入党,他才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对党的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的极端热忱,他的确是我们革命队伍中久经考验的杰出的战士。

自1945年与尚钺在危难中分别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再次见面。本来,1955年暑假,尚钺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因身体原因欲来青岛休养,我们怀着将要久别重逢的喜悦心情,精心安排好房间,购置了家具和生活用品,期待着他的到来,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时,华岗突遭政治陷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起来,我也难逃厄运,受到不公正的处分,被送去劳改,全家人都受到株连,从此我们与尚钺便失去了联系。

1972年,华岗在狱中含冤离世。直到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经中央批准,才得到平反昭雪。我与一些老战友恢复联系后方知,1959年庐山会议后,尚钺被定为史学界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文革中,他不仅继续受到学术上的批判,还受到肉体上的折磨,更再次遭受丧妻失子之痛,但他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坚持不变,坚信真理必将战胜谬误,他顽强地活了下来,终于等到了胜利的一天。我想马上与他联系,但却不知道他的确切地址,然而不

久,我却意外地收到了他的来信,原来,他从报上看到华岗平反的消息后,辗转打听到我的地址,便立即写信给我,在隔绝了25年之后,我们终于又再次联系上了,我捧读着他的来信,感慨不已,真有一种恍然如隔世的感觉。遗憾的是,华岗未能读到这劫后余生的老战友的来信,否则,该多么高兴啊!

不久,华岗所著《中国历史的翻案》即将再版,我想,尚钺应是为此书写序的最佳人选,便请他写序,他欣然同意了。当时,他已年近八旬,身体虚弱多病,但他冒着盛夏酷暑,很快就将序言完成,这使我十分感动。序言写得非常精彩,在篇首,他写道:“正是此书完稿的那一天,华岗同志约我与云南省委负责人到他家开会,会议决定,华岗走后,由我接替他的工作。在如此紧张忙碌的时刻,他还完成了这篇高质量的重要历史论文!35年过去了,这位不知疲倦的战士的音容,犹宛然在目。”在文章的结尾,他写道:“华岗不是预言家,他不过是在阐述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心得。但他35年前所说的这些话,竟然应验于20年之后,足见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功力之深!”他从史学家的角度,对书的内容作了全面、准确的介绍和评价,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华岗深厚的革命情谊。他说:“这是我唯一能为华岗同志所作的事了。”

后来,我又陆续收到他用颤抖的手,艰难地写给我的信和签名赠送的《中国历史纲要》一书,我一一回复,也赠送给他华岗在狱中以惊人的毅力写下的遗著《美学论要》,并期待着与他重新见面畅谈。不料,噩耗突然传来,尚钺同志于1982年1月6日和我们永别了,我党又失去了一位忠诚的战士、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我们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回想起我们共同战斗的日日夜夜,想到他为今天的胜利所付出的一切,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热泪纵横,我隐忍着痛失良师益友的悲痛,重翻他的信件、著作,这些已成为珍贵的纪念品,我们期待多年的会面,终未能实现,也永远无法实现了。回首往事,虽然时光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尚钺同志的面容仍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所具备的老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始终鞭策着我不断前进,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我了解的台湾“三农”问题

李昌平 周 婷

感谢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陈德升先生的邀请，让我们有机会花 10 天的时间，走马观花式的浏览台湾。台湾是一座宁静的森林公园，台湾有一个务实而活力的民间社会，这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但无暇去做深入的了解。我们的兴趣只能集中在台湾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上。

一、台湾农业的三个阶段及对大陆农业发展的启示

——访问陈希煌（原台湾“农委会”主任委员）

70 多岁的陈希煌先生，称自己是“根在大陆的台湾本省人”。陈先生是大学的教授，在大陆也有不少“学生”。陈先生在李登辉执政台湾时期，担任过台湾“农委会”主任委员一职，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先生说，在我们拜访他的前一天，吕秀莲也登门拜访——顾得上就问了一下。以下是我们访问陈先生的记录：

台湾 400 年来一直是被人统治的，台湾的历史多半是受人欺侮的历史。国民党来到台湾的时候，人均生产总值只有 160 美元。国民党以台湾为基础，建立起政治、经济、军事等独立“国家”体系——主体性，这是台湾 400 年历史中的第一次。“2·28”事件后，台湾就不谈政治了，努力发展经济和贸易。工业是高资本投入的产业，国民党是选择发展台湾农业开始的。台湾农业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

追求技术和劳动密集效益阶段：

这个阶段大致是 1950—1955 年。国民党带来了农耕文明，由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开始向技术和劳动密集型农业转向，发展立体农业（水稻、甘蔗、长豆等间作套种），水稻等农作物的产量由

1800 公斤 / 公顷上升到 3000 公斤 / 公顷以上。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很快就自给有余。

追求价值效益阶段：

这个阶段大致在 1955—1960 年。这个阶段在继续提高技术效益的前提下，重点发展经济价值高的农作物，主要种植香蕉、凤梨、洋菇、芦笋。粮食产量又有了大幅提升，达到 5000 公斤 / 公顷以上，自给有余，经济作物大量出口，“国家”有了外汇积累。

追求市场效益阶段：

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1960 年开始，主要通过发展食品加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开拓国际市场。1963 年，洋菇芦笋出口占世界 60% 的份额。1963 年，国际糖产量大幅下降，价格飙升，而台湾却大丰收，一年就盈利 400 亿美金。糖和洋菇芦笋几乎统治了欧美市场。

由于有了外汇，大约在 1965 年开始，政府将钱投入到纺织工业、化工业，台湾很快走上了工业化之路，经济起飞了。

80 年代后，台湾全面走向经济国际化、贸易自由化。由封闭经济体系升级为开放经济体系。这时台湾农业面临国际竞争，手足无措，农业效率一年不如一年，农民大量转业，农业劳动力由 300 多万，只剩下现在的 60 多万。兼业化，专业农民不到 6%。

陈先生认为，台湾农业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经验也有教训，现在还面临很大的问题。

陈先生举例说，60 年代从国外回来的洋知识分子，70 年代在台湾推广综合养殖。几个人养几千头、甚至几万头猪。大规模的养猪，致使价格暴跌，对台湾农民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养猪原本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还是农民调节现金的工具。当综合养猪导致农民家庭现金链断裂后，农村经济

一片萧条。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出台了金融补贴政策。再如,70年代,政府动员“上山下海”,在山上大量种植槟榔和水果,量是增加了,但并没有增加农民的收入,还造成环境破坏,政府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纠正错误,至今还没有完全补回来。

陈先生认为,封闭经济体系,是以量为核心的农业政策。80年代后,国外农产品进入,量不能为核心,要制定以效益为核心的农业政策,农业政策不仅要考虑促进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改进管理和营销等等。但当时台湾对此认识不足,农业政策跟不上。直到1990年,才充分认知到小农的不足,政府大力推动“策略联盟”,将“小农”整合成“大农”。政府通过规划区域生产、区域加工、贸易组织,效果很好。最近一些年来,由于政治的因素,政策不连续,台湾农业又面临严重的困境。

“策略联盟”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我没有清晰的概念。陈先生作了举例说明。先生说,通过他的研究,台湾社会农产品的价格效益弹性为0.2%。主要农产品一般增产10%,价格会下降50%。2001年,台湾的芒果大丰收,以农会组织为主体的农业“策略联盟”积极配合政府,将芒果的三级品采购30%(政府补贴一点),不许直接上市(做果汁后再上市),市场上的新鲜芒果价格不仅没有下降,还有上升(因为上市的主要是品质好的芒果)。不仅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收购三级品芒果的“策略联盟”定点加工企业(政府为保护果农利益而定点收购三级芒果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是“芒果价格策略联盟”的组成部分)和农会组织加工企业(台湾乡一级农会一般都有自己的农产品加工厂和农产品超市,必要时都会成为“策略联盟”的一部分)也增加了收益。最近几年,台湾“策略联盟”的作用因为腐败或政府官员的外行等因素影响,而大打折扣,农民增产减收是常见的事。陈先生认为,对农民而言,“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

大陆在推行农业企业化(公司+农户),要特别小心。农业企业化,应该是农民有企业家精神,不是企业家经营农业。大陆推行企业家经营农业,是会出大问题的。一个国家,60%是工业和城镇,40%是农村,农业最好,不是农村、农业越少越好啊!

先生说,知识和经验是可以流失的。1950

年来积累的农业经济发展知识和经验,到今天基本上都流失了。西洋文化把知识和经验学问化,这点,中国不如西洋。民进党更不懂这个道理了!

对大陆的农业政策建议:

先生说,大陆是1975年开始改革的(我没有问先生为什么认为大陆农业改革始于1975年)和1949年台湾改革是不同的时代。台湾改革是紧跟世界步伐的,大陆改革时,世界经济水准已经很高了,学台湾一步一步来是不行的,必须三个阶段一起来,三个效益同时追求。高水准技术、管理、营销都要。大陆如果锁国,农业还行,如果开放农产品市场,麻烦就大了。三个效益一起要,一定要发展农民组织,金融制度更要改革。大陆太大,要选择点做,慢慢散开。大陆太大,要搞区域特色互补,在区域互补的前提下,发展食品工业。内部互补很重要,这样可以避免国际冲击。内部互补一定要优先发展,再考虑国际竞争。东部学习台湾,中西部另谋出路。

对于大陆的土地制度,先生认为要从公经济和私经济两个方面考量。照顾公私两难。农民集体所有是好的,这是从长远看。已经私有的不要收归公有,私有的要组织化;农民集体所有的,主要是利益分配问题。要对农村不动产证券资本化,土地本身不动,但可以增加产权收益。

先生特别强调:要想办法让农民工留在城市,这应该是最基本的国家战略之一。要想把农民工留在城市,就要改革住房政策,特别要将农民工的房子安排在最有增值空间的地方,而不是将有增值空间的地方安排给社会强势人群。只有这样,农民工的财富才会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增长,才有能力留在城里。为了让留在农村的人生活得到同步提升,水权应该归农民集体所有,随着城市化,城市要向农民买水,这样也利于水资源保护。

二、参观土改纪念馆

台湾土地面积36000平方公里,其中三分之二是丘陵和山脉。土地改革以前,60%的农民为佃农,生活在极度困苦之中,土地改革的原则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地尽其利等。台湾的土地改革采取的是“和平和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分为三个步骤: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其成果



李昌平采访陈希煌先生

是使 286700 户农民受益,提高了自耕地面积。台湾的土改,是世界上公认的成功典范。

坐落在桃园市中山路 574 号的台湾土改纪念馆也称“国际土地政策研究训练中心”。该训练中心于 1968 年成立,与美国林肯土地政策学会合作,定期举办训练班,学员以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国家人士居多,中心主要使受训人获得管理技巧和方法,对土地出租、都市发展和规划等内容进行教授。维持台湾土改纪念馆的经费,也来自国际组织。

关于台湾土改,大陆学者有不少的介绍。我这里不重复了,但我这里要重复几个不常听到的观点:

台湾的土地制度,在我看来分三大部分,一部分是农地农用制度,一部分是农地转为非农地制度,另一部分是土地非农用制度。

第一 农地农用制度

土改给台湾农民的土地权利,只是农地农用的权利;农民要出售自己的土地,出售的只能是农地,不能用作非农用。最初的时候,为了保护农民,土地只能优先在临近的农民之间交易,非农民是不许购买农民土地的。农地农用的交易,是免税

的。农地只能在农民之间交易的规定,其好处是保证农地买卖按照农村农业发展水平和规律有序进行,这对保护农民和维护农村稳定都有积极意义。这项规定,只是在近些年才有所松动,但交易税率很高。西湖乡的周先生,8年前将 3 甲(45 亩)山坡地出售给城里人(不能非农用,也不能坡改梯田),价值只 900 万台币,但征税高达 300 万元。如果是将这三甲地卖给乡里的农民,可以不征税。

第二 农转非制度

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一部分农地必然会转做非农用地,但土地转变用途必须严格按照土地规划执行。从土改开始,台湾就进行了严格而科学的土地规划,土地规划是台湾土地制度的重要组织部分。如果一片农地,规划在五年或十年后转做工业用地或商业用地或公益用地,在五年或十年之内,是不能改变农用地性质的。有的农地是在数十年或数百年也不能改变用途的。当农地依法(规划)转为非农用地,将有一半的土地“充公”,等于 2 亩农用地换得 1 亩非农地。“充公”的土地主要用于城市道路、绿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建设。

第三 非农地交易制度

农地转化为非农用地,会使土地大幅增值,增值收益分配有严格的规范——“涨价归公”,这也是台湾土地制度的重要部分。台湾的农地和非农地的价格差距很大,一般在十倍以上。我拜访的曾先生,25 年前,花 400 万台币(近 100 万人民币)买了 5 亩农地,随着城市的发展,该地已经是小镇边上的农用地了,明年就可以转做非农业用地了。如果转做非农用地,这块地的价值大约为 6000 万台币。按照台湾的土地制度,曾先生的 5 亩农地,明年转变为非农地时,就有一半“充公”,剩下的 2.5 亩就是他的非农用地了,价值为 3000 万台币。如果曾先生将土地卖出,增值(3000-400=2600 万台币)部分,要严格依法缴纳所得税——即“涨价归公”(涨价 100%,40%归公,200%→50%,300%→60%……)。所得税率是累进的,增值越高,纳税越多。曾先生说,他的地卖出的话,估计缴税在 1000 万台币上下。曾先生抱怨,最近几年民进党执政,经济滑坡,土地价格落去一半。

在台湾,土地交易的所得税,税收全民享有,

而非地方或部门享有,这点和大陆有本质的不同。给人的感觉,台湾的土地制度很规范,清清楚楚,很难浑水摸鱼,而大陆的土地制度很不规范,非常复杂,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和强势人群都可以把土地当“唐僧肉”,中央政府好像还拿这些吃“唐僧肉”的没办法!

第四,台湾的土改和大陆的土改其实有很多的不同

应该说台湾是学习大陆的土改,都是强制性的土改,但台湾在策略上稍有改进,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土改”。台湾政府先将土地地租“减”到很低水平,强制规定农地农用的价格为“年地租的两点五倍”,再由政府按照强制的价格强行收购地主土地,评价转手“卖”给农民。买地主的土地,没有现金给地主,给的是四大“国有”公司的股票。地主强烈抵制土改,有的地主逃到国外组织反抗运动。农民如果没有现金购买土地或认领公地,可以申请无息贷款,分十年还清本金。台湾的土改制度虽然是公认的成功典范,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去学习,但几乎很少有成功拷贝的。台湾的学者认为,台湾的土改,是在“威权体制”下进行的,这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想学台湾土改也学不成的主要原因。

第五,台湾的土地制度是保障台湾建设均富社会的基础

台湾土地制度是世界公认的学习典范。典范的核心意义不在于农地农用“私有化”,而是它用强权建立的“均田”和“涨价归公”制度,奠定了台湾建设均富社会的基础。除“均田”和“涨价归公”为农民和全民提供福利外,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为了帮助“农民工”进城,政府将最有增值价值的土地用于建设经济适用的“农民工”住房,让“农民工”的财产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增值,这样“农民工”就自然成为了城市的居民。

国民党总结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一到台湾,就马上学习共产党大陆土地制度,一直坚信和稳定这个制度。反而是大陆多次改革土地制度,快将“均田”和“涨价归公”改掉了。如果上海、深圳、北京等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土地“涨价归公”归全民享有,我想,大陆社会不会有举世惊呼的“两级分化”。

第六,台湾土改的成果是靠农会巩固的

以前农民只需要把农作物交给地主,由地主来完成销售环节。土改后,农民对怎样销售农作物不了解,这当中,农会组织无论在资金或技术支持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有效的保护了小农,避免了私有制条件下的常见现象——小农破产。台湾农会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如果没有台湾的农会,台湾农民的地位不会像今天这般重要,农民的权利不会和社会其他阶层那样的平等。正是因为台湾的农会制度,巩固了台湾的土改成果,打造了台湾特色的现代化“小农”农业模式。有几个台湾的“农民精英”朋友都对我表达过同样的观点:有农会,没有人(政治家)不敢不重视农民,他们甚至认为“独”也好,“统”也好,“蓝”也好,“绿”也好,都得看农民的眼色。

第七,消除非正规土地制度,完善和规范土地制度,恐怕是大陆土地制度建设的关键。

接待我们的马先生说:“台湾的土地制度是一种有管控的私有制”。了解了台湾的土地制度,感觉国内关于“国有制、集体所有制、私有制”等争论,显得太过于意识形态化和抽象化了,或许更需要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实事求是,建立以增进全民福利为主旨的、以完善增值所得税为核心内容的土地制度。是国有的,就是国有又何妨呢?是村社农民集体所有的,为什么不能发土地证给村民集体呢?农民集体自主选择产权的经营方式和实现形式有什么不好的呢?核心的问题是产权主体要明确,所得税的征收主体和用途要明确。

当前,发达地区和边远落后地区的“非正规”土地制度,应该坚决消除,土地制度必须走向规范。发达地区的“非正规”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涨价”部分既没有完全归属真正的私人,也没有归属真正的公家,“涨价”的部分被“灰色化”后,再通过国有金融“非正规”的协作,就达到了“洗钱”的目的。这样运作的本质是用全民和弱势农民的土地财富,在全民所有的国有银行抵押套现(国民财富转化为个人和少数人的货币收入),等于是少数人和少数地方发了财,全国人民和多数地区“亏本”了,边远落后地区的“非正规”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商人”大量“无偿或低偿”的长期占有“公有”土地。不少地方打着招商引资的幌子,以每年几毛钱、几元钱、甚至不要钱就将“公有”土地、山林和河流给了个人70年甚至更

长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将来,这些几乎无偿得到的土地等资源,也会在“国有银行”里套现的。如果“非正规”土地制度,都穿上“改革”的马甲,就“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了,那我们就等于鼓励偷盗和抢劫!

三, 拜访 (苗栗公馆乡和西湖乡) 农会总干事和理事长

最近几年,经陈先生邀请,已经有包括于建嵘、党国英在内的六十多位学者专家去台湾考察过农会了。关于台湾农会的介绍已经很多了,我在于建嵘介绍台湾农会的基础上做一些补充。

台湾基本上是一乡一个农会,一县也有一个农会,还有省农会,但只有乡农会有农信部。过去,乡农会是要给县农会交钱的,县农会要给省农会交钱,现在不怎么交了。乡农会是农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也是农会组织系统中最具实际功能的组织。一般的农会都有会员大会,会员大会选举出理事会、监事会,由理事会聘请农会总干事,监事会监督总干事的工作。在总干事下面,有信贷部、技术推广部、会务部、产品营销部、加工厂、会员福利部等。公馆乡农会和西湖乡农会的设置大体就是这样。接待我的是公馆乡农会的谢总干事和西湖乡的周理事长。

农信部:公馆乡和西湖乡农会的农信部,都有好几亿台币的自有资金,加上在农村吸收存款,存款余额以数十亿台币计算,而每年贷款总额都在数十亿到百亿台币之间。农信部吸收存款的年利率在 1.9%,贷款年利率在 2.5—4%之间。农信部是农会的最核心部分,是农民经济的血液,是农业产业延伸的纽带;农信部的利息收入,是农会的主要财政来源;农信部更是农民财产(包括农地、房屋、山林等)权利得以实现的金融保证。农民在农会贷款,以土地做抵押,土地估价 100,可贷款 90。现在,一般一甲地(15亩)可以估价 1000 万台币,贷款 900 万台币。房产和山林都可以抵押贷款。土地和房产估价也是农会的职能。

技术推广和产销部:台湾农业的技术推广工作,主要靠农会的技术推广部。这两个农会的技术推广部,每年大约需要 1000 万台币的费用,其中的部分来自政府补贴。农会推广部在每个里(村)

都设有产销经营班,产销班按照农会统一的技术标准组织生产,产品使用统一的品牌和包装。假如在台北市场上,检测到一份农产品的农药含量超标,仅仅凭借产品包装上的条码,就能知道是哪个农会的哪个农户的哪块田里生产的产品,不按照技术标准生产农产品的农会会员,是会受到农会组织的严厉处罚的。品牌是农会成员的共同财富,没有品牌的农产品是很难被市场接受的,农民都非常珍惜自己农会的品牌。

在西湖乡,我住在一户周姓农民的家中,清晨我们还没有起床,主人一家人就下地摘草莓了,摘下的草莓一颗一颗的摆放在专用的草莓盒里,装好后会贴上农会编制的条码。9点钟前,主人的产品要送到农会运销部。中午,主人家的草莓就上了台北的超市或送到了订户的家中。

即使是在最北端的台北超市,每天都能买到最南端的屏东县恒春农会当天产的新鲜农产品。一般农会都能在 24 小时内,将当天产的新鲜产品送到订户的家中,台湾农会的农业管理、农产品营销水平之高和台湾农产品物流之发达令人叹服。

一份经营一份收获,周姓农民家种有 3 亩草莓,据他本人计算,要卖近 500 万台币,纯收入应该不会少于 300 万台币。

农产品超市和生产资料超市:台湾农会都办有农产品超市和农业生产资料超市,是农会下面的经济实体,属于农会统一经营。超市的收入也是农会的财政来源之一。在台湾,农膜等生产资料使用后的废物,谁供应的,谁负责回收;只供应,不回收,是不允许经营的。农会的成员,在农会的超市里销售产品和购买生产资料,是没有大陆多如牛毛的收费的。为了照顾农民,台湾农民的农产品生产和交易是免税免费的。

农产品加工企业:我所参观的这两个农会,都办有自己的农产品加工厂。主要的产品有酒、饮料、调味品、干果、饼干糖果等食品。在农会的超市里,摆着琳琅满目的加工过的农产品和食品。农会的加工企业不仅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也为农会创造收入,更是农民实现增产增收的保障。农业受自然因素影响很大,减产增产是经常的事,产量增加,会出现价格下降,农会的加工企业可以帮助农民避免增产减收。

固定资产出租:农会一般都有很多的固定资

产,主要是房产和土地。房产和土地出租也是农会收入的一部分。

会务部:主要是组织会议等大型活动。如:会员大会、理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选举、游行、产品展销会、演出、文化周、技术比武等等活动。西湖乡正是草莓收获的季节,周末来乡下采摘旅游的城里人,络绎不绝。在城市推介旅游产品、迎接八方游客,也是会务部的职责。

补贴和保险:农会也协作政府,做好休耕计划和对休耕农户的补贴工作。农会也统一支付会员的农业保险费。

养老:农会组织都对70岁以上的老人有特别关照的政策。如健康养老保险等。公馆乡和西湖乡农会,每月都给70岁以上的老人缴纳300元/人月的健康养老保险费。

农会的监督:对农会的监督,主要是财务监督。除了监事会的监督以外,县农委会的农金局和专业会计事务所监督是最关键的。因为监事会没有专业的财务知识,台湾的朋友认为聘请专业的会计事务所进行监督特别重要。

农会与民主政治:台湾的乡村社会数十年以来是有民主传统的。县乡地方领导的选举,从50年代就一直有间断过。应该说,台湾的农会能够长期存在下来,并不断壮大发展,民主也是一个关键因素。民主既是台湾农会内部治理的核心要素,也是台湾农会政治地位的保障。但李登辉时期的民主政治对台湾农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经常有政治人物,动用农会的资源选举,承诺当选后,更多的返还给农会,有的农会就对不同的政治人物“押宝”。这对农会的负面影响有两个,一是影响了农会内部团结,二是对农会的制度造成破坏。据说,这个问题现在得到了纠正。民主与农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期待下次去台湾再做专门的考察。

职业经理人制度:农会总干事是由理事会聘



李昌平(中)参观台湾土改纪念馆时与工作人员合影

请的职业经理人,可以是本乡人、也可以是外乡人、外县外省人、甚至外国人。农会总干事的工资等级分为120点,工作时间越长,点数越高;根据农会的收入情况,每点200—500元不等。农会总干事一般月薪在4-6万台币,每月还有约5万的“交际”费用。总干事可以干三届,但必须是特别优秀的。不优秀的,可能面临随时被解职的危险。在西湖农会的隔壁,有个卓兰镇农会,农会总干事因为争取酿造果酒项目的政府补贴不积极,导致该项目被西湖镇农会申请到了,西湖农会酿酒项目运行后很成功。所以卓兰农会总干事被解职了。

一点想法:台湾农会有很多的财产,这是我来台湾之前不知道的。这些财产用大陆的话语表达,应该叫“集体所有制”。我经常不厌其烦的追问台湾朋友,“集体所有”的这些“公产”为什么不卖给个人?台湾的朋友总是不解的望着我,却坚定的回答:怎么能卖给个人呢?我不完全知道他们为什么坚定地认为不能卖给个人,台湾朋友也不完全知道我为何对卖给个人感兴趣,也许这个问题需要后续的探讨。

四、台湾乡村社会的治理

我感受到的台湾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是这样

的。

1,“乡公所——里”系统,主要职能是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道路等基础建设,环保、维持社会稳定等等。

2,“农会——产销班”系统,主要职能是直接服务农民经济活动。金融服务、技术服务、生产规划、生产资料供应、产品开发、生产管理、产品营销、品牌管理、价格保护等等。

3,立法院议员和乡民代表。收集民意,反映民意,代表人民管理政府,为所代表的民众争取权利。

4,党——社团组织系统。国民党、民进党等,都在农村有基层组织,发展党员,宣传本党主张,监督政府,做好事争取民意等等。

西湖乡有公民1400人,12个(村)里。民选11名乡民代表,乡民代表由乡民直接选举产生,组成乡民代表会,监督乡公所和乡长行政。乡民代表每月有6万台币的工资(包含交际费),每年有出国考察费用5万台币。

乡长也是乡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但不属于公务员。乡长执行乡民代表会的决议(特别是预算)接受乡民代表对决议执行的监督。

(村)里长也是民选产生的,每月有4万台币的工资(包含交际费用),不属于公务员,但里干事(民选里长的秘书)却是乡公所的编制,享受公务员待遇。里干事是里长和乡长联系的纽带,(村)里内的公共设施建设,里长除发动乡民出力外,也会申请乡财政补贴。

县设警察局,乡镇设警察分局,几个(村)里设一个派出所,奇怪的是,在台湾很难看到警察。台湾的乡镇政府,除警察、税务设有机构外,没有大陆的乱七八糟的戴“大盖帽”的垂直管理部门。乡公所有人民调解会,选举产生人民调解员,调解意见当事人双方和调解员签字有效,但报法院备案。如果当事人不同意调解,则需由法院审理,这样的情况不多,一般都愿意接受调解。人民调解员有误工补贴,每出席调解一天,补助500元台币。误工补贴虽然很少,但调解员还是热心做,主要是为了获得声誉,为将来上升为乡长、县长或立法委员打下基础。

乡公所的体系还是比较大的,清理垃圾也是乡公所的职能范围的事。台湾农村几乎每一条河

流都是清澈见底,农村的垃圾是不能随便丢弃的,家庭要做初步的分类处理,再由乡公所的清洁队集中处理。受益人出部分费用,垃圾回收也有收入,不足部分由财政补贴。垃圾中的有机物,会加工成有机肥料,几乎每个县都有用生活垃圾加工有机肥料的加工厂。

乡公所还处理一些突发性事情,如防止禽流感。上面来了禽流感的经费,乡公所会通过农会或里等组织,将经费补贴到采取了防范措施的主体。显然,没有大陆政府的强制力度和动员力度。不过,通过组织对成员的压力——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力——自我管理,效果还是明显的。因为不配合政府,今后申请政府资源就难了。

农牧业技术等服务工作,不是乡公所的直接职能,主要由农会直接承担,农会可以申请政府技术推广补贴,但推广的技术必须符合农业产业规划政策。台湾乡镇没有类似大陆乡镇“七站八所”之类的机构。向“一乡一品”的特色农业、优势农业发展,是台湾各个乡镇追求的农业发展方向。

在台湾,乡域内的水资源不是政府管理的,是由类似农会组织的水管会管理的。关于台湾水资源的管理,我还不十分清楚,期待再次专题考察。

台湾的基本医疗是免费的。大医院的医生每年都必须到乡镇医院工作数月,因此,乡镇医院的条件虽然没有大医院好,但医生的素质不会比大医院差多少。如果一个南部农民在台北出差生病了,他可以凭卡在台北任何一家公立医院看病,只需交挂号费。

台湾的基础教育也是全免费的,教师也像医生一样轮岗下乡。台湾大学教育收费和大陆各省大学收费相当,但台湾农民的收入是大陆农民收入的数百倍。

台湾农村的治理,政府、政党和社会分工是比较清楚的。乡镇、社区公共服务和基本建设是乡公所和里(村)的职能,农业经济发展的服务是农会等农民组织的职能,监督管理政府是党派、社团和乡民代表的职能。台湾农村社会,不是政府强力控制型的社会,政府是民选、民管的,各种力量相对均衡。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特别重视社会资本积累,感觉积累社会资本的竞争好像比积累经济资本的竞争更加激烈。

(责任编辑 李 晨)

七千人大会的现代启示录

李彦春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6月底上市,两个月突破3万多册,目前正在加印中。一本学术类书籍能如此畅销,超出了编著者及出版社的预期。《变局》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毛组研究员张素华研究毛泽东28年,她倾10年心血打磨的力作填补了党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七千人大会上溯4年是“大跃进”,后推4年是“文革”,承上启下的七千人大会在党史的关节点上占有重要一页。七千人大会距今虽然过去44年,但该会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经验与教训——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尊重规律及不调查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尊重规律对当今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具警示价值。

寻找解困之路

七千人大会召开的背景:1958年“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使原本脆弱的国民经济遭受重创,饥荒蔓延全国。各级干部大干社会主义的心气从热情高涨的波峰跌至灰心丧气的波谷。针对众干部“气不壮”的挫败感及思想上的迷惘混乱及行动上不顾大局的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弄虚作假,浮夸成风等,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召开了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以统一思想、鼓舞士气。与会者7118人,简称七千人大会。会议上,中央领导以批评和自我批评、言路畅通的民主作风检讨了“大跃进”的错误并强化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的不可违逆。

最新版本《中国共产党简史》这样评价七千人大会:“会议对缺点和错误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1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毛泽东理想中的速度是“用15年时间超英赶美”。显然,“大跃进”是他指望在短期内通达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

伴随“理想”速度的是乌托邦式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放开肚皮吃饭”、“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随之,全国各地竞放畸形跃进的卫星——亩产千斤县、万斤县“喜讯”连连。伴随“大跃进”同时出现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即全国农民共产私有财产,在形式上完成全民所有制,从而向共产主义过渡。一时间,全国劲刮浮夸风、命令风、跃进风、共产风。脱离实际、虚假繁荣之风在1958年的一幅壁画《一种树四种果》中有形象诠释——一棵树上结了苹果、桃、梨、杏4种果实。该画署名亦具时代特征“火箭二营”。

遗憾的是,毛泽东没看到令他愉快的浪漫主义的果实。正相反,如此挑战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大跃进”却朝着他憧憬的“幸福生活”的反

方向发展下去——全国经济陷入困局，多地出现饥荒。1959年至1961年，中国人民陷入集体性饥饿！以致该比喻流传甚广——“1958年吃了皮肉，1960年啃了骨头。”王任重这样描述他亲眼所见：“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然而奇怪的是，嗷嗷待食的饥民与报刊上的“喜讯”——亩产千斤、万斤相互矛盾。1958年年末，毛泽东及时发现“大跃进”偏离了他设计的轨道，其败因是“做了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是因为脱离实际。”

违规苦果迅速显现——粮食极端匮乏，物质极端短缺（商店货架基本闲置）城市面临断粮危机。为保城市，中央开会落实粮食征购，然而在调配粮食调整指标过程中，却遇到抵触征购的强劲阻力（农村果腹尚难，谈何支援城市）。中央两次开会难以落实。邓小平针对地方各自为政、弄虚作假，一针见血指出：“数字不真实，困难也不真实，说假话，怕当老实人。”邓小平焦虑：“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希望。”主管粮食工作的李先念亦急：“搞得不好，城里开不了饭。”他拜托各省领导：“求求大家救救京津沪。”当时，京津沪市民大多饥饿浮肿。周恩来与人谈话必涉及“粮食”这一敏感字眼，非常时期，人们称他“粮食调度总指挥”。困局中，有人给突破困局、化解困局支招：召开一个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会议，“统一思想、调整政策”。邓小平同意。该建议报至毛泽东处，毛泽东提议会议扩大，扩大到县委书记以上。他下指示：“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总结经验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个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地方）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7118位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在京开会。

会上，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强调凡中央犯的错误的，第一个负责的就是他。针对经济工作，他批评自己：“没有经验，在没有认识其规律性之前，我们的行动带有盲目性，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干过许多蠢事。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

识还没有进入自由王国。”毛做自我批评，此为第三次。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历数自己两条“罪状”：大炼钢铁、人民公社。1961年5月31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检讨自己：“违反了经济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毛泽东带头做自我批评旨在营造肝胆相照、坦诚相见的民主气氛。他的目的达到了。民主气氛将大会引向一种变局——人人批评自己，人人承担责任。如山西省第一书记陶鲁笏检讨他没做调查研究就向毛主席汇报石楼县平均亩产千斤的经验，后证实是170斤。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亦相信了某地一亩地产粮一万斤的谎言。他之所以相信，是因他目睹“打场了”。殊不知，在他来参观的前晚，造假者将20亩水稻搬到一个场上，说是一亩地产量。王任重在会上批评自己：“现在看来，我们出了丑，我们在全国带了浮夸风的头。”的确，湖北在报上做过多次虚假宣传“粮食多得无处放”、“吃饭不要钱”。水电部的检讨是：“盲目上马很多得不偿失的项目。河南、湖北等省乱修水库造成大面积土地沙化……”

大会原定1月30日闭幕，不料29日，毛泽东做出开一个“出气会”的决定。他这样解释他的决定：“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真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毛泽东幽默定性“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毛泽东欲通过“交心、出气”达到另一个变局——加强民主集中制，变上下交心为上下同心。即让人讲话，讲真话。他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难免有一天要垮台。”他借古喻今，“刘邦让人讲话而得天下，项羽独断专行而霸王别姬”。针对地方上一些“土霸王”，他不点名地批评了“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不肯揭盖子”的某省领导：“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凡是一人说了算的书记，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而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有些人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毛泽东欲借大会出气。

对于“出气”的人，毛泽东阐明给予三不主义

待遇——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他以秦穆公为例说明：“秦国3个将军打了败仗，被晋国俘虏，后来他们逃回秦国，秦穆公身穿孝衣迎接，说打了败仗不怪你们，是我的责任。”刘少奇率先响应毛泽东的“交心、出气、讲真话”。他指出“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此说来自1961年春，刘少奇在湖南宁乡做社会调查44天之感触。其间，他住在王家湾养猪场一间破旧空房里核实汇报材料中的“万头猪场”。经调查，只有几十头猪。所谓的“红旗大队”实则连年减产，减产导致农民几乎个个浮肿。刘少奇问农民原因？农民实事求是地回答：“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此次微服私访给刘少奇的刺激是：“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是该回头的时候了！”因此他在大会上脱稿讲话3个小时，其中引用农民的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还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他说：“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刘少奇承认“总路线是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偏差，注意了多快，忽视了好省”。邓小平对“大跃进”的反思是：“大跃进没有错，就是猛了点。”

与刘少奇讲话针锋相对的是林彪，他说目前遇到的困局，“恰恰是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结果”。林彪力挺“三面红旗”：“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

1月28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特别满意会议的开法。”2月7日，会议闭幕，毛泽东评价该会“这个会开得好”。好在哪儿？《变局》作者张素华认为：“好在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民主作风，好在干部们精神解放、手脚松绑，好在国民经济出现回升的变局；好在达到了毛泽东预期的‘大家满意’的目的。”的确，大会结束后，党内重现久违的宽松和谐。1992年，事隔30年后，邓小平忆说当年：“在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历者当中永远不会忘怀，我相信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诚然，无需回避的是4年后，中国发生了另一

场涉及每个家庭、触及每颗心灵的超级变局——而这一大变局是七千人大会刚刚结束半年，毛泽东忽然重提阶级斗争的结果。该提法牵引中国一步步走向“文革”。这一次变局，比“大跃进”走得更远。

张素华认为七千人大会与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似。前者是总结前4年的“大跃进”，后者是清算十年“文革”。不同的是，后者因清算彻底，所以能使中国放歌“春天的故事”。前者虽指出“大跃进”错误，但因没彻底“破冰”，理论上自然也就没有突破性创新。所以半年后，历史卷宗上没留下毛泽东寻找“建设社会主义固有规律”的手笔，反而重提阶级斗争。这样，党探索社会主义的路径再遇瓶颈。

七千人大会的现代启示录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史为鉴，可以拓未来。

张素华在写作中，头脑中时常翻检出毛泽东于1968年的讲话“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此话



促她经历了由还原历史的写作初衷到以史为鉴为使命的升华。即撰写殷鉴不远的七千人大会,旨在避免现实重蹈覆辙,然而1962年检讨的病象于今仍未痊愈……

刘少奇在报告中批评:“许多同志常常是依靠汇报来了解情况,并且轻易地相信那些不符合实际或者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汇报。没有密切地接触实际,认真地去调查研究”,“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吃了不讲民主的亏,这是很大的经验教训。”1962年所言的“很大的经验教训”于1998年被浓彩重抹了一笔。该年5月下旬,某领导人到安徽省南陵县调研粮食收购情况。此行旨在“修改和完善”粮食收购政策。俗话说“芜湖米市南陵粮仓”,但此时粮仓无粮,于是造假。5月18日至21日,200余人参与运粮、进仓。4天时间,1031吨粮食搬进峨岭粮站。登上粮垛最高处的领导身陷骗局而浑然不觉。他回京十几天后发布了《粮食收购条例》。造假使《条例》失去了修改和完善的机会。同时,全国7省60多个县进行的税费改革因《条例》而夭折。该领导曾批复三农问题上书:“我们往往把好的情况当作全面情况,误信基层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峨岭“报喜”,恰是这一问题严重性的典型事例。峨岭粮站工作人员具体地叙述其严重性:“造假成本,里里外外十几万呀,还耽误了一季菜籽的收购。造假挖大了粮站亏损的窟窿。”

再如,刘少奇在讲话中直言:“人们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上下不通气的后果是,工作中的错误长期不被发现,因而长期拖延不能改正。”的确,就“大跃进”而言,干部们明知违背了经济规律,但都怕被当白旗拔掉(摘乌纱帽)而持明哲保身态度,说违心话,讨好上级,推波助澜。现实中,俯拾即是的事例充盈着刘少奇的论点。

“犯错误是付学费”、“跟着毛主席走永远不会犯错误”,“犯错误是因为毛主席的思想受到‘左’的干扰”……林彪的谄媚之言遮蔽了毛泽东的眼睛。在延安时,毛泽东告诫丁玲:“看清一个人,要用几十年的时间。”错看错用林彪的毛泽东对今日选干部用干部可为前车之鉴。

“官做大了,薪水多了,就摆架子”,毛泽东痛恨的黑暗面在今天依然黑暗着。

1991年,薄一波说:“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

当年纠正那些错误是及时正确的,比如头脑发热,盲目追求速度、数量,各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自行其是,各搞一套,重复建设,浪费惊人。”薄一波的话对应着当下一些头脑发热的败家事例。败家子的头脑发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时的决策者多数不具备科学发展观,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多出于公心,即好心办了坏事。今天一些干部的败家,是受私利所驱而有意违背科学发展观,例如只抓GDP,不考虑可持续发展,以破坏生态环境为成本的政绩工程——大树进城,树死了,而批准大树进城的人照样升迁;山西采空区已达2万多平方公里,陕北一些村庄不见飞禽和树木……

当年分散主义的表现特征是“谎报封锁”、“欺上压下”,今日地方保护主义的表演是瞒报虚报谎报,从而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七千人大会上,人人做自我批评,人人挑担子的坦荡、责任、勇气比照今日一些干部的自我表扬、粉饰太平、懒政、庸政。

另外,七千人大会表面为粮食征购,根源还是三农。新中国建立后,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则赖于农业养工业。由于当时决策者不顾生产力的客观现状而主观改变了生产关系——如“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如此强硬扭曲经济规律的后果使农业陷入困局,工业亦受连带。七千人大会后的政策调整使农业恢复了元气,进而工业步入正轨。今日工农业的关系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即是反哺之物。

另一个值得反思的是杨尚昆的话:“特别满意大会的开法。”七千人大会主持人毛泽东以其政治智慧将如此庞大规模的会议开得“令人轻松、满意、有效”,此会提请今日诸多劳民伤财费时的无效会议注意开会的目的。

七千人大会过去44年,它留给我们的遗产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今天,我们能否从这笔遗产中汲取教益以执行当下任务——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决定着是续唱“春天的故事”还是重蹈历史覆辙。

在毛泽东研究上应有自己的发言权

研究毛泽东 28 年，张素华辩证地评价毛泽东：“他的前半生为夺取政权、解放中国而受万众景仰，他的晚年在巩固政权、建设中国中则带有悲剧色彩。”客观公正地说，他的悲剧不应全部算在他个人的账上。悲剧的大背景是五千年传统文化，小环境是个人崇拜。历史将他送上神坛，于是人们以仰视的态度接受他及他发布的最高指示。如果有人质疑与挑战他，其结果，周围人也会将其打倒。

毛泽东总结自己一生干了两件大事——推翻蒋介石、赶走日本鬼子，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为什么视“文革”为一件大事，而将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胡锦涛讲话）这一恢宏史诗没算做大事？该问号，张素华以这样的研究释疑：一、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浴血奋战 28 年，倒蒋抗日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二、1955 年，毛说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使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直到 1976 年，他行将离世，从生活上看，人们温饱尚未解决；从国力上看，追赶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并非易事；从政治上看，他认为还“跟资本主义差不多”。三、搞了 27 年社会主义，结果还跟资本主义差不多，这让毛悲哀。换言之，现实与毛理想相去甚远，此可解释为他没算作一件大事之因。至于他为什么把发动“文革”算作一件大事，张素华认为毛对社会主义蓝图的描画有他自己的构思及执着追求。毛泽东临终前，对前来看望的中央领导说他的两件大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两件大事概括起来，一是夺取政权，一是巩固政权，即统一大业及防修反修。

晚年毛泽东不能实现理想的惆怅、伤怀、无奈，张素华从毛泽东身边人员回忆他的细节中找到痕迹。据芦荻回忆，她给毛泽东读过五遍庾信的《枯树赋》，每次读完，他久坐无语。另一个细节是，毛泽东在看到银幕上的解放军擎旗进城时失声痛哭。

盖棺论定毛泽东，邓小平给了三七开。邓小平曾站在制度立场上公允评毛：“毛泽东所犯错误

不能一人承担。”的确，反冒进的刘少奇也做过冒进的推动者。1958 年 9 月，刘少奇到江苏常熟和平人民公社参观号称亩产 1 万斤的中稻丰产实验田时，他问公社书记：“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周恩来也曾说过：“全党听中央的，中央听毛主席的。”正因为人们固有毛代表伟大、光荣、正确的思维定势，所以，黄克诚曾实事求是地坦白：“也知道他（指毛）说的不对，但是不敢讲。”毛刘周之错，邓小平仍站在制度立场上评说：“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制度往往把人推向反面。”赫鲁晓夫评说斯大林的错误时，即是从人品、性格上剖析其失误种种，而未从制度上分析其对人的扭曲放纵。勃列日涅夫亦延续性格论评说斯大林及赫鲁晓夫。好在今日人们认识到了制度好坏对人的决定性影响。譬如不好的制度之一——终身制。张素华假想：“如果毛泽东 1959 年退休的话，也就没了庐山会议反右倾，没了‘文革’，自然也就没了三分错误。”所幸，邓小平提出的“任期制”终结了使人容易变坏的终身制。随法制健全，制度完善，愈发制约了执政者执政的个性空间。

十年磨剑写《变局》

“在毛泽东研究上有自己的发言权”，毕业于河北大学历史系的张素华，自 1978 年分配到毛泽东著作编辑办公室（1980 年改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后便立下此愿。然而，进京两个月，张素华便疾病缠身，医生预言她生命期限 15 年。即使保住生命，眼睛亦会失明。唐山地震留给张素华的丧父之哀和眼下病魔之痛还有生命之虞，几层夹击，将 24 岁踌躇满志的张素华“一个闷棍打倒了”。患病 8 年，有“药罐子”、“病秧子”之称的张素华在单位里“被当成半个人使”。直面疾病对业务的羁绊，张素华对自己“一阵子一阵子地不满意”。在中央文献这个藏龙卧虎、强手如林之地，学历浅、底子薄的张素华的压力日重一日。1986 年，基本痊愈的张素华接手编撰《毛泽东年谱》（1925—1927 年、1959 年—1965 年）。编撰过程中，她再给自己施压，撰写了《毛泽东军事文集》、《说不尽的毛泽东》、《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尽管业绩不凡，“整天围着毛转”的张素华希冀业绩再上台

阶“写一本在书架上立得住,立得久远的书,以此安身立命”。她憋了一股劲,欲把疾病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1959年—1965年年谱,恰含七千人大会一幕。1996年李捷(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在与张素华一次聊天中提到:“在党史上占有重要一页的七千人大会,还没人搞,你试试看,我可以写成一本书。”自此,张素华为这28天写就的重要一页,埋首十年。人称“十年磨一剑”。

自此,张素华泡进档案馆。她用“喜出望外”形容在档案馆“发现了一个富矿”。丰富的矿藏让她欣喜研究毛的空间在加大,从而“产生创作的冲动”,史料愈多,冲动愈烈;“七千人大会太有写头了”。颇具戏剧性、悬念迭起的七千人大会在张素华面前展开一个又一个谜团——为什么更改大会议程?会议主题为何由反分散主义到统一思想,进而又转向开“出气会”?毛泽东如何看待刘少奇起草的报告?毛泽东为什么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毛泽东对林彪讲话持何态度?陈云为什么不讲话?毛刘分歧始于七千人大会吗?谭老板、曾胡子、李井泉等能不能过关?大跃进使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为什么还要坚持“三面红旗”?人们为什么怀念七千人大会,大会成功之处?大会之后带来什么新气象?江青说,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憋了一口气,真真此事?根据是什么?七千人大会是否为“文革”爆发的一个远因?……

谜团在史料中逐渐解开。没有答案的疑问,张素华遂以采访活史料的方式填补缺憾。她采访了当年与会者袁宝华、杜润生、邓力群、张维兹等人。张素华承认在史料采撷上遗憾不多,但在活史料采访上,遗憾多多。所以她借媒体表达请求,请亲历者与她联系,共同完善党史中重要一页的撰写。

《变局》写作上,张素华秉持一原则:从史的角度还原大会原貌,不以超越历史的眼光检视历史中的人事,不回避、贬损、拔高当事人。伴随思想解放,毛泽东研究已从仰视、平视走到俯视。俯视看毛,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及公正,只有还原历史公正,才能建立现实公正。现据圈内圈外评价,《变局》基本还原了历史原貌,解开了党史研究的诸多谜团。写作结构上,张素华以上述众疑点搭屋构架,然后层层解构。治史行文上,张素华走的是戏说、学术化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戏说不足信,学

术化写作是只见事不见人。张素华沿着“可读性”思路一改党史写作的枯燥传统,力求人中见事,事中见人,因而人和事都见血见肉见骨头。圈外人评《变局》写作:“写得很老实。以史料的支持、研究的厚度、鲜活的叙述支撑了一本集可读可信及权威性于一体的党史专著。”圈内人评:“字里行间透露出张素华的文献出身,打磨痕迹很重。”同仁曾认同她打磨的年谱“做的很全很细”。

张素华的治史风格是落笔有据,大胆求证,小心结论;治史态度是“怀着丰富的想象力实事求是地再创作,不满足用史料记录历史”。

《变局》修改中,一件事,强化了张素华经验中曾有过的感悟:“在书本上想不明白的事情,实地看一下,会豁然开朗。”今年3月,张素华出差井冈山,她顺便去了三湾村。置身三湾村一刻,其情其景让她立刻联想到10年前一幕。1996年,她到延安。山连山、梁接梁的延安,多见黄土少见树,其荒凉偏僻超出了她的想象。在这个偏居一隅、衣食困窘的地方,张素华看到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背景,因而顿悟了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号召。另一个感悟是,在如此交通不畅、通讯不便的山沟沟里,毛泽东竟能正确地判断国内外形势,从而决胜千里之外。如此,张素华只能以“高瞻远瞩”折服毛之魅力。

10年后,置身三湾村旧址、原部队驻扎地的张素华,仅从住房上便分析出党代表当时所处地位。她于是恍然:当时毛泽东为什么要施行三湾改编,即“支部要建在连上”、“党指挥枪”。此情此景让她联想——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队伍向井冈山进军途中,路上逃兵不断,并存在指挥官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能坚持到达井冈山的人几乎都是党员或铁心跟党走的人。所以,毛泽东要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以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

延安、三湾村给张素华再添一感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研究毛泽东28年,张素华以“盲人摸象”、“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形容现今人们对毛的说不尽。若将毛泽东说完整说精当,她寄希望于后人,否则,就无法说尽20世纪的中国。《变局》即是给后人提供了完整、精当地还原伟人的一个平台。

(责任编辑 吴 思)

看人看事我不再简单地相信政治标签

——吴象《好人一生不平安》序

邵燕祥

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回头看,亲历过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直到七八十年代的人,可以叫做“过来人”了。吴象此书,就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写他的前辈和同辈之书。

这样的书,重在亲历,尤重真实。就读者这方面来说,从这样的书里,不仅想知道一些属于作者亲身的见闻,也想知道作者自己的态度和见解。

但这类书未必都能满足读者的要求。前些年,九十年代,我出于好奇心理,曾买过一位长时期(包括文革)中位居要津的“过来人”的一本书,书名诱人,叫做《xxx日记》,猜想他原先是记以备忘,未必打算公开发表的吧,应该有些独得之秘,或称第一手材料的,谁知翻开一看,大失所望,日记倒是日记,逐日缕述,但相当于每天报纸上要闻和社论的摘抄,加上些现成套话,不知当时就是这样记流水账以求“政治正确”,还是后来为公开出版而补办的。在日记这种私密性很强的文体中,竟看不到作者的真面目、真性情。作伪至此,令人一叹。

所谓日记如此,有些回忆录也是如此。某些名人回忆生平往事,本来也是个“看点”,但不少这样的文章取舍有偏。过去外面曾笑有人只夸功劳,讳言失败,“光说过五关斩六将,不说自己走麦城”,现在看到他们回忆往事涉及历次政治运动时,却又反了过来,“只说如何走麦城怎么挨整,不说曾经过关斩将的光荣史”了。这样的东西,给人的观感是:不可信。这种不可信的东西,为其作者计,其实出版不如不出版,不是说要相信群众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比谁傻呀”?看了这样的书,只能益增对作者的不信任感罢了。

吴象的书,于人于己,没有矫饰。

书中有一篇《革命前辈世纪老人李雪峰》,叙述了文革初起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的李雪峰,从受命接替彭真,紧跟而跟不上,与中央文革小组并不合拍,而左右为难,心力交瘁,而终不免在四年后的第二次庐山会议后又被打倒。吴象说:“挨整是痛苦的,等着挨整更痛苦,奉命被迫去整人,则是更大的痛苦。我经历过、感受过这两种的痛苦。我相信雪峰同志在这两方面的经历和感受,更不知比我要深广多少倍。”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在复杂而残酷的党内斗争中,“翻饼,烙饼”,绝大多数人都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充当过整人与被整的双重角色,只是不同角色的时间长短、程度深浅,以及后果各有不同。对于这一现象,现在人们已不讳言,不过,这是就总体而言,就每一个体来说,情况则须具体分析。

十年文革是集历次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之大成,几乎人人挨整了,也是成为促使大家认真思考的“十年教训”。吴象此书,不像文革刚刚结束时的一些文章,主要是为受迫害的干部辩诬和恢复名誉,而能够比较客观地记述作者所了解的那一部分事实,有助于历史研究者们从这些个案材料更接近当事人的

处境和心态,拼出更近于历史原貌的情景全图。

例如,有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他们在受到打击时,到底有怎样的表现?吴象书中涉及的李雪峰、项南、毛联珏等人,提供了不同的例子,这就不是一句简单的组织纪律性或什么“忍辱负重”所能概括的。

书中引用了李雪峰的一段私人笔记,其中真实地记录了他以毛泽东思想的逻辑说服自己的过程:

在我倒霉的日子里,自我沉思修养时,我曾反复思索毛主席的一个告诫,以求自慰。即我作为来自群众的一个共产党员,既是党的一员,也是群众的一员,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宗就是群众,自己没有理由不相信群众。但矛盾的是,自己(群众)还不能相信自己,还必须相信自己(群众)。这两者的对立如何统一?只能服从,归于相信党,相信群众,而约束相信自己。这还是毛主席讲过的道理:当迷路的时候,你和大家商量,共同决定问题,即使犯了错误,也容易纠正。这就是说,即使自己明明白白知道路错了,也要从众,跟着错,尽管自己有时觉得冤枉、内疚,也要顾全大局,要经得必要的冤枉。

这样的前提和推论,把迷信盲从同避免犯错误联系起来,等同于“相信党”“相信群众”,把明知错误也要紧跟同“顾全大局”联系起来,等同于自我牺牲的党性。林彪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其实并不是林彪的发明,而是他总结了党内、革命队伍内相沿成习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但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甚至就是发现了错误也还要执行,这就是组织性纪律性的要求了。于是所谓相信群众相信党,就成了一要紧跟,二要从众,随大流没错。——毛泽东不是倡导过“反潮流”精神么?但那是表达他可以力排众议,一意孤行的气魄,正如他放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最典型的写照是他拉下了刘少奇这个国家主席,还有他提倡“海瑞精神”,据说却正是为了不要出海瑞一样。——总之,对于普通党员,乃至高级干部,都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符合中央以至顶头上司的要求,经过自律或他律,修养成驯服工具,长期以来的“听党的话”由林彪明确演绎为“听毛主席的话”。至于你,比如李雪峰,你“很不理解,很

不得力”,也只能自责,不可追问。至于说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你就老老实实认罪去吧!

李雪峰去世后,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妻子带着儿女们替他写的申诉材料,都没有发出,压在箱底。他曾经对女儿说:真理就是真理,不辩自明,他坚持认为,一个党员所做的一切,党组织最后总是会弄明白的。所以他从不辩解,受了多大冤枉,多大委屈,遭到多少人误会,也不辩解。不辩解,不等于他心里不翻腾这些事。一个在党内生活中备受历练,又多年参与高层政治的干部如李雪峰者,既不糊涂,更不麻木,也还没有犯老年痴呆症,他之所以不向儿女倾诉,应有他保护下一代的亲情考虑。以他的政治经验,他自是认为时机尚不成熟,申诉也是白搭,而且正如吴象纪念毛联珏一文中说的,“如果辩解,罪加一等”。还有书中记河北双树村支部书记贾满富的遭遇,1964年四清工作组根据揭发材料,命他检讨,他不服气,据实申辩,便开会批判,加了个“抗拒运动”的罪名,撤销职务,开除党籍。这样的事,不知凡几。高自彭德怀,下至一般右派分子,一经申辩,便是“闹翻案”,重拳打击,多少前车之鉴,李雪峰哪能不知道?李雪峰对儿女三缄其口,不仅是组织性纪律性强,更因他深知此中利害,自然不说为佳。1981年4月,面对中纪委派来的调查人员,李雪峰申诉、批驳、反诘,一连说了八天,问了无数个“为什么”。

原在山西工作,文革结束后曾任上海市委秘书长、北京市委秘书长和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毛联珏,在1982年春节,以五十出头的年纪抑郁而死。从吴象的叙述看来,他虽死于癌症,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死于捕风捉影的审查,“有罪推定”,一个题目没有做成什么文章,换个题目接着做。不要以为整人只是文革和文革以前的惯技,文革结束就缩手了。积重则难返,恐怕至今也是有的。内斗无日无之,原先是以什么路线斗争为口实,现在与时俱进,花样翻新。做老百姓不易,做一个正直的党员、正直的干部亦大不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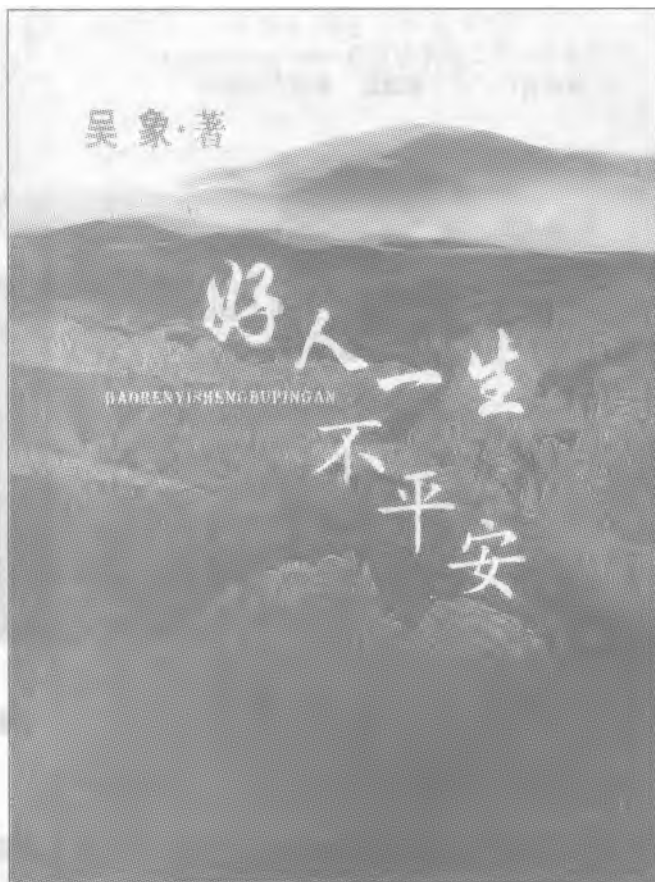
历史研究者可以从吴象的书中找到“正史”的注脚,而我在阅读时,不免联想到今天的种种,这些恰恰从昨天来,只要原先的土壤没有大改变,它就仍然是老旧的弊政的温床。

吴象书中,除了《彭老总在太原前线》、《大写的人——记胡耀邦与中国农村改革》外,其它的记事怀人之作,都涉及了文革。其中《卫恒之死》,写的是文革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的两位省委书记之一,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卫恒。卫恒在半个月前(1967年1月15日)还在十万人大会上遭批判时高喊“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半个月后,1月30日早晨,却已在单独关押他的小屋死去,而当时的官方说法是“畏罪自杀”,以坐实他作为“叛徒”、“特务”、“走资派”之有罪。这个“自杀说”当时就受到人们的质疑。吴象文中叙述了事发后经过漫长的十八年,直到1985年6月才为卫恒平反昭雪。对卫恒平反过程的内幕,阻力来自何方,吴象不得其详,他就采取“知之为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从略而不加臆测。

我读关于卫恒之死这篇文章,不能不想到人的生存权,在没有法治的国度,是无法得到保障的,生存权尚且如此,遑论其它!同时,又不免联想到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等人之死,想到统帅人物曾夸口说,他要置刘少奇于死地,“就像用手指捻死一只蚂蚁”!于是像许多普通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和一般干部、党员,在文革中和文革后聊以自解时说的,开国元勋、老师们都沦落到这地步,我们还说什么!然而再一想,这样说,无异于承认地位高或动静大的人们,其生命价值高于普通公民,人们多年积淀的潜意识正是这样。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人生来是平等的”这样的精神遗产。实际上是认定某些高层的、高端的人物其生死“重如泰山”,而下层群众黎民百姓的生死“轻如鸿毛”,可怕的不仅在于将帅们习于把一般军民的生命只看成个兵力和伤亡的数字,而在于“沉默的大多数”也认同这样的看法。这样,再加上多年来对“不怕死”的宣传,对“活命哲学”的批判,在我们这里,“珍惜生命”的意识极其薄弱。高高在上的领袖须得“誓死捍卫”,遂不惜变相鼓励武斗,同时对手无寸铁的青少年,轻言不畏刀枪水火,造成无谓的牺牲。在生命价值问题的背后,是公民意识、人权意识、平等意识的沉睡和缺席。

从另一个角度看,书中涉及的文革旧事,

如吴象书中所说,不仅有表层的“批判、斗争、挂牌、游街、低头弯腰、坐喷气式”和殴打、私刑等等诉诸暴力的人身侮辱、肉体伤害,而且有种种造谣诬蔑、构词陷害,落井下石,所有人整人、人咬人以至人吃人的现象,都缘于或隐或显利益驱动。在文革以前,从绝对数量上看,以共产党外的斗争对象为主,到了文革,便更大规模地施之于共产党内,以至党内高层。在这里,有着冠冕堂皇的革命名义,那就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如果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必须这样搞法,那就是说,这些是党与生俱来的夙命,并将与党的存在相始终。如果说不是这样,那又何以致此呢?过去讳言“权力斗争”,认为从理论上说,只有剥削阶级才“争权夺利”,但从实际出发,所谓路线斗争无法与权力斗争截然划开。且不说在党的基本学说里,革命本身就是以暴力夺取政权,而在革命过程中,则要争取领导权。掌握了领导权,才能实现自己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几乎没有人不认为自己所提出、所执行、所捍卫是正确路线的,那么这样的“路线斗争”又怎能游离于“权力斗争”之外呢?至于在斗争中,明显的营私勾当,也往往假革



命的、阶级的、集体的利益之名。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回首三四十年前的文革,有了距离感后,逐渐看得分明的一片乱象。

如前所述,文革是历次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的集大成者,它把党内外的诸多矛盾推到极端,也把党内生活以至体制的弊端、原则的纰漏暴露无遗。自然,我们也还要从所谓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寻找这些消极现象的人性根源。很难用量化的方法计算出,各有多少成分应归咎于什么。不过,像趋炎附势、谄上欺下、畏强欺弱以至借刀杀人等伎俩,的确是在共产党执政以前就有悠久历史的社会和精神病态。只是在特定条件下,这些渊源有自的人性痼疾与意识形态和组织制度的阴暗面结合起来,互相助长了。

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文革,看人看事,我不再简单地相信政治标签。我更多地采取了道德标准。不管你是什么政治身份,共产党员也好,民主人士也好,某方面的权威也好,更不论你的职位,什么书记,什么委员,我都用一把共同的尺规量一量,是“好人”还是“坏人”。似乎也有失于简单化,江青就曾到处乱封“坏人”嘛。

但我的即使出自本能的感觉,怕也与江青之流大相径庭,这我是有自信的。对参与政治的人物,我即衡之以“政治道德”,灵得很,好人、坏人立见分晓,其中好人并非通体发光,一贯正确,而多不免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有些坏人则未必没有能力没有做过一件两件漂亮事;当然,也有些人属于“基本上是好人的”,另一些原还不坏,却已经走上了变坏的路。好在这些都在我的心里,一己的印象,一己的评价,并不算“盖棺论定”,也不公示于人。这点在内心里臧否人物的“思想自由”还是有的吧。或问你的政治道德标准是什么?我不说,我不想强加于人,故不一一列举。但建议所有的“过来人”,不妨设定一个政治道德的界限,试试看,是不是就此更加心明眼亮了。

这里透露一下,本书作者吴象,在我心中是一个好人,他这本书,除了是一本“过来人”写过去事的书以外,更是一本好人写好人的书。

是为序。

2005年7月23日
(责任编辑 吴思)

向中老年人传递阳光与活力 网址: www.chinaxtd.cn
订一份给自己,送上最温暖、最贴心的陪伴



1983年 2006年 2007年

《新天地》

原《老人天地》

邮发代号 2-290 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月刊 大16开 64页 全年48元 定价4元
订阅电话: 010-84257955 64200899

地址: 北京东城区和平里7区16号楼6层(100013)

中国第一本糖尿病教育杂志 权威通俗丰富实用

《糖尿病之友》

糖尿病的教育专家 欢迎订阅

一本由近百位糖尿病专家组成编委会的刊物
一本引起数万名专科医生热切关注的刊物
一本让中国数十万读者爱不释手的刊物
一本提高糖尿病患者生活质量的刊物

凡订阅2007年全年杂志均可免费获赠:
1、《糖尿病之友患者手册》一本
2、免费加入《糖尿病之友》俱乐部

★ 订阅方式 ★
★ 汇款至杂志社直接订阅 ★
★ 在全国各地邮局订阅 ★
汇款地址: 北京100029信箱36分箱 邮发代号: 42-253
邮政编码: 100029 ★ 每月4日出版 全彩印刷
收款人: 《糖尿病之友》俱乐部 全年定价60元

★ 咨询电话 ★
咨询电话: 010-51099130 010-51099131
传真号码: 010-51099080 网址: www.tnby.com

中国四大传统文化说

刘济生

中国传统文化有几个影响特别大的流派？学术界几乎是都维护这样一个定论的：儒释道三大大家。那么中国究竟是四大传统文化还是三大传统文化？还有没有和儒释道三大传统文化并列的文化？后面我谈的帝王文化究竟是不是传统文化？帝王文化能否和其它三大传统文化相提并论？只提三大传统文化掩盖了什么？在传统文化里放走了帝王文化危害有多大？这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

陈寅恪 1933 年在《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 审查报告三》中说：“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说，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要为不易之论。”从此形成了著名的三大文化说。此说影响甚大，规定了中国文化研究的基本走向。其实，中国不仅从晋朝，就是从远古至现代，还有一个影响更大的文化：帝王文化。帝王文化是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也可以叫做皇权文化。可以说，帝王文化对后世的影响是最大的。

我说帝王文化是传统文化之一，可能遇到这样的诘难：历史上有帝王思想，帝王意识，但不能说是帝王文化；帝王思想和上面说的三大传统文化不是一个范畴的东西；他们不能装在一个筐子里。这样我们就必须看一下三大传统文化源头，文化结构，物态文化，文化符号，看看他们和帝王文化的一致性。帝王文化也有它的文化源头，文化结构，社会基础，文化符号，也和其它文化进行了充分的融合，也搀杂了宗教的一些内容，也都留下了无以计数的物态文化分布全国各地。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和三大传统文化并列的帝王文化。

一、帝王文化的源头和结构

帝王文化在三皇五帝的传说里，在夏、商、周

时代的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里，就已经透露出一个帝王文化的大致轮廓。历史记载的和民间传说的三皇五帝，是帝王文化的源头。到了夏、商、周的时候，帝王文化已经是百川汇流了。《诗经》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表述，是对其上溯几千年地地道道的原生态王权政治的生动描述，它也开辟了歌颂帝王权威的滥觞。帝王文化在夏代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体制，到秦始皇时，此体制达到了非常完备的程度。君权神授、等级制度以及等级观念、终身制度以及君权神授观念、世袭制度以及宗法观念、家国同构的制度和家天下的观念、武力为先的统治手段和非理性政治观念、奴性服从以及主子观念充斥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个阵地。这些政治体制为秦始皇继承下来，而他独创的是暴君体制、密谋政治、郡县制度、官员派遣制度、舆论一律制度等。帝王文化的结构是非常完备的，比儒家的政治理论还要完备。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左传》桓公二年）等级制度各国都有，它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在古代希腊、罗马，他们的等级制度和东方的等级制度就不一样。他们在自由民同一等级内部是民主、平等的。而中国古代，平民内部还是有等级，官员的级别和功劳挂钩，还要分许多不同的等级。为什么在同一等级内部也没有什么自由和民主的程序？就是中国古代没有人的权利的意识。如果有，只有一个人有人权，那就是皇帝。皇帝是金字塔的塔尖。等级制度的沿袭成为传统文化。

除了尧、舜、禹是禅让之外，中国几千年来历史记载的都是皇帝和国王的终身制，人们都呼喊他万岁或万寿无疆。周代出现了成形的王权终身制。

皇帝的职务不是选举或禅让，当然只能是世

袭了。除了世袭制度之外,皇帝的一家一族要享尽荣华富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各级官僚也毫不客气地跟着学习皇帝的做法,整个社会形成了庞大的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

家国同构的制度是以上几个制度和观念的必然结果。天下是皇帝的天下,皇帝的家就是天下的核心家族。是皇族就是贵族之上的贵族。你忠于皇族就等于忠于皇帝,你效忠皇帝的老婆、儿子、岳父,就等于忠于皇帝。家国同构的制度形成了家天下观念。

武力为先的统治手段在中国历史之早,实为罕见。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上记载了好多以武力说话的事实。“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氏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我们最有名的老祖宗炎黄二帝之战也是都使用武力说话。后来黄帝尊为天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拔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不辞辛苦地操练兵马,威慑天下。大禹死后启统治天下,“益干启位,启杀之。”(《竹书纪年》)有扈氏不服,启又兴兵伐之,“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史记·夏本纪》)商汤也同样是靠武力而一统天下,“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周武王也是用武力把商纣王打个落花流水,坐上了天子的位子。在中国遥远的古代没有类似古希腊城邦那种迷人的选举的记载。

帝王文化在三皇五帝的时候已经形成雏形了,而儒家文化还没有诞生呢。远古的帝王文化不但体现了制度文化,而且体现了习俗文化和心理文化。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总结历史经验,出现了法家和儒家等不同流派。法家对历史上的王权给以充分肯定,把它推向极端,成为极权主义。这就是后来的帝王文化的一次大总结。

二、帝王文化的社会基础

帝王文化的社会基础是地主和农民相结合的农业社会的阶级结构。帝王文化的统治阶级是天子、国王、霸主、诸侯以及皇帝、皇族、官僚、贵族等。而依附于帝王的是广大的农民阶级。儒家的阶级基础基本上是知识分子阶层。农民本来是受皇帝压迫的,但是他们又是皇帝统治的台柱子。他

们并非反对帝王文化,他们反而津津乐道帝王文化。他们非常需要帝王文化。刘邦、项羽这些农民他们都非常欣赏秦始皇,想取而代之。国外的人也不例外,这一点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中对法国农民有过精彩的论述。

三、作为物态的帝王文化

我们再看一看物态的文化。物态文化是文化学的第一种形态(还有制度文化、心态文化和行为文化)。历史上的物态文化指的是历史保留下来的历史文物古迹。全国各地的寺院是佛教留下来的物态文化,道教宫观是道教留下来的物态文化,各地的孔庙是儒家、儒教的物态文化。而皇宫、皇陵、太庙、皇家园林、长城、御道等则是帝王留下来的物态文化。而留下来最多最好的物态文化恰恰是帝王留下来的。请问,哪个佛家的寺院能和故宫相比?哪个寺院能和避暑山庄相比?有哪个道教宫观能和太和殿相比?儒家儒教最了不得了,孔庙的建制有类皇帝,但气势宏大的孔庙还是皇帝下令修建的。祭奠泰山的岱庙体现了儒、释、道的文化,但更体现了帝王文化。天坛殿的九五之尊的殿柱和殿脊就是皇帝的大殿的建筑制度。大成殿也好,天坛殿也好,中间的大门是不能随便开的,是必须给皇帝留着的。帝王文化在许许多多的历史景观中都是居于中心地位。

当然,我们不可能说参观故宫,就是参观帝王文化,其实我们也是参观美学建筑。但是,参观这种建筑过程中,就已经笼罩在帝王文化的浓烟厚雾之中。

四、帝王文化的符号

各个文化都有自己的文化符号,帝王文化的符号是龙。中国在图腾文化上几乎没有比龙影响更广泛了。有的研究人员统计,龙文化在全中国有数万处景观(参见潘一煊、杨建原、潘晓宇编著:《中国龙文化景观》,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大多数的景观是和帝王文化联系起来的。

龙本来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据专家考证,龙的图腾有七千年的历史。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据今年代为6460年。墓的主人是巫长,在墓主骨架

的东侧,用蚌塑了一个 1.78 米的龙。考古学家认为是“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和权力”。黄帝战胜蚩尤,后来骑着龙升天,神话把最高的统治者和龙联系在一起了。龙和黄帝出现的时间没差多长,说明了龙和王权、和权力、和战争相联系。《虞书·益稷》说帝舜让夏禹在礼服上绣十二种代表帝王的绝对权威的花纹,其中就有龙的花纹。本来龙的图腾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的文化符号,结果变成了皇帝权力的符号。在夏、商、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皇权逐渐把龙图腾变成了皇权的象征。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就自称是个“龙种”,制造了他母亲梦中和龙性交的神话。

龙图腾后来就被皇帝彻底独自霸占了。皇帝穿的衣服绣着龙,叫龙袍,住的房子的各个结构上雕刻着龙,叫龙殿,住的床叫龙床,行走的路上也有龙的标志,使用的家具上雕着龙。龙如影随形地伴着皇帝。中华民族的图腾变成了皇帝的符号,也成了帝王文化的符号。明朝嘉靖皇帝看到兵部尚书张璪身穿飞鱼服,看成了穿蟒服上朝,大怒,要杀张璪。后来别人一再说明,才罢了。皇帝垄断了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打倒了皇帝,老百姓才开始把龙解放了,龙才回到了民间。

龙文化作为意象是帝王文化独有的,而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道家文化没有太明显的文化意象。儒家文化有一个不太成型的“魁星”意象,佛教文化有莲花座上的观世音号如来佛等好多意象,道家和道教是有区别的,原始道家没有什么符号,后来的道教符号是八卦和太极图。儒、释、道的文化意象是绝对无法与皇帝的龙文化相比的。

五、帝王文化的文献载体和代表人物

儒释道都有自己的文化典籍,自己的文化代表人物。三大传统文化之所以得到共识,原因主要在这里。帝王文化有没有呢?有。

可能有人说,春秋战国时期有百家争鸣,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晋代之后三大传统文化,也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文化结构。儒家有“四书五经”,道家有《庄子》和《老子》,法家有《荀子》、《韩非子》,佛教有卷帙浩繁的“佛经”。帝王文化有什么东西?其实,帝王文化也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文化载体。春秋战国时法家出来公开地维护帝

王文化,已经给帝王文化确立了理论体系。慎到、韩非、李斯,都有帝王之术。晋以后没有像韩非的理论体系了,是因为它的理论形态变了。帝王文化的理论体系在晋以后有所变化,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专制主义思想吸取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不再是赤裸裸的像先秦法家那样,对儒家、道家的理论不屑一顾。但这不等于没有理论体系了。后来的《贞观政要》、《反经》、《官经》、《商君书》、《鬼谷子》、《政训》、《大诰》、《大义觉迷录》、《康熙政要》、《盛世危言》等就是帝王文化的载体。

六朝时期的《鬼谷子》也是介绍游说之术的书,当然,里面还包含一些治国治军的内容。

《贞观政要》就是唐代历史学家吴兢为了维护李唐王朝的专制制度,吸取一些儒家的思想而写的帝王文化的范本。吴兢认为“君道第一”,谈帝王的个人修养和政治谋略。让皇帝从选官吏方面,刑罚方面,军事方面,生活作风方面遏制皇权的恶性发展,让皇帝真正把历史上留下来的儒家等有价值的思想接受过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反经》又称《长短经》,是唐朝赵蕤编撰的一部谋略之书,大讲任人之术、用兵韬略、权变之谋、历代治乱得失以及策士游说人主之术等。有人认为它是一部“讲王霸大略、经世之术、机权谋略的集大成之作”。他在吸收原始儒家思想方面不如吴兢。但比起韩非赤裸裸的权术要柔弱一些,他毕竟吸收了诸子百家的一些思想。

朱元璋的《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和雍正的《大义觉迷录》更是地地道道的极端的帝王文化的范本。

《官经》是清代大学士瑞常专为皇太子载淳编写的权谋之作。大讲事君之术、忠奸之辨、人君百态、明哲保身、胆识威仪、官场之道、赏罚之术等等。官场如战场,有军事学,就有官场学。《官经》就是官场的“学问”。

光绪年间,章(钺)效仿吴兢写了《康熙政要》,内容和《贞观政要》真有点差不多。讲了君道、任贤、宽仁、俭约、谦让等治天下之道。

以上这些范本只是晋代以后帝王文化的一小部分。真正要找全帝王文化的典籍,那也是一项很大工程。

至于帝王文化的代表人物更是明显:法家的

代表人物就是帝王文化的代表人物，秦始皇也是帝王文化的代表人物。像韩非这样的法家人物，他是帝王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帝王文化制度的宣传家，而秦始皇是勇猛的实践家。历代想在历史上留下点什么思想的帝王，他们也是帝王文化的代表人物。

六、帝王文化对其它文化的整合

文化是相互融合的，中国文化在秦汉之后，已经是杂家文化，每一著作，都不可能是单一的文化流派的继承者。

帝王文化吸收了儒家文化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内圣外王”、“外儒内法”。帝王文化和儒家文化结合的最紧密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不可能是独尊，只是表明帝王文化对儒家文化的汲取罢了。著名的诸葛亮的《出师表》，就是儒家文化和帝王文化的结合体。唐朝吴兢《贞观政要》也是儒家文化和帝王文化的高度结合体。历史上，帝王文化吸收了儒家文化的消极部分多，积极部分少，把儒家文化的服从国王的意识全盘接受过来，并发展了。在大一统问题上，帝王文化和儒家文化是基本一致的。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一家”思想和帝王文化的“家天下”思想外表也相似。愈往后来，儒家的反专制思想愈少了，甚至全丢了。儒家的反专制思想一面是被帝王文化给消解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整合过程中，帝王文化一直掌握主动权，凭自己的爱好宰割着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在历史上是持半在野的政治立场，一直处于被动局面，任人宰割。当然儒家文化也吸收了帝王文化的一些专制的东西。儒家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挨宰，有时候是主动去适应帝王文化的。

帝王文化吸收了佛家文化也是众所周知。但是，和吸收儒家文化比较起来，显得不专一。唐武则天之后好几个皇帝都对佛教相信的不得了。但也出了几个灭佛的皇帝。在万能的皇帝面前，佛教也很领情，各大寺院有三道门，中间的不开，非得等皇帝来才开中门。皇帝和佛教也是打得火热，给僧家们花钱修寺院，给寺院题匾额、楹联、刻碑立传、赏赐土地等等。佛教的忍耐和容忍是专制皇帝特别需要的。对全部跪在地上的佛教徒，皇帝会放下屠刀去吟自己的秋风诗歌。

帝王文化和其它文化相互融合使之更具有适应性和欺骗性。每个人都要受它的影响。所说适应性就是长期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存在，不死不灭，到了近代甚至死而不僵。农民起义之后，一开始就变质。还没等打下江山就变，不是半道就变质，而是甚至没开始就变质。刘邦在当民夫的时候就变质了，“大丈夫当如此”。不是想当皇帝吗？一个老百姓的刘邦就想当皇帝了，可见帝王文化的影响力有多大。

所说欺骗性，就是人们认为帝王整天讲着儒家那一套，他也是爱民的。皇帝总是好皇帝，坏就坏在奸臣当道。皇帝信了佛，别人就以为他也是菩萨心肠。皇帝信了道，别人就以为他是道家情怀。皇帝整天供奉孔子，别人就以为他是“天下为公”，就是“仁者爱人”。其实，皇帝什么都不信，他就信自己的权力和享受。一切的一切，都不能危及他的权力宝座。开明的皇帝可以考虑远一点，昏庸的皇帝只考虑眼前。考虑远一点的皇帝可以让你讲几句刺耳的话；昏庸的皇帝连一句刺耳的话都不让你说。但是，帝王文化是特别欺骗人的，因而出现了许许多多骨鲠之臣，被皇帝凌迟处死，也甘之如饴——他们认为皇帝坏了，但要忠于这个伟大的王朝。不忠于这个王朝，你当大臣干什么？可见帝王文化的影响力有多么大！

七、帝王文化掺杂的宗教内容

陈寅恪谈三大传统文化时说“三教”，意即有宗教的意思。帝王文化也有宗教的神秘的地方。祭祀泰山是帝王文化的宗教体现。君权神授几乎是各个封建国家的国王的惯技。中国的国王称“天子”，上天之子。既然是上天之子，那就得和上天沟通。这些国王们发现了泰山很高，就拿泰山当天吧。据《史记》记载，远古的首领们有72人去泰山封禅。从秦始皇之后有12个皇帝去封禅或祭泰山神（从宋真宗以后历代皇帝就不是封禅了，而祭泰山神了）。历代的皇帝如果不去泰山封禅，也得在帝都建立天坛，在天坛祭天，代替封，祭地，叫做禅。一样和上天沟通。他们既相信天，又愚弄天。宋真宗派人伪造“祥瑞”，说上天让他去泰山封禅，这就公然愚弄天了。天子，神秘化的人间帝王。释佛是当然的宗教，道是道家学说，和后来的道教

是两回事,儒学带有宗教的意味,不全是宗教。陈寅恪为何称之为“三教”,原因是都具有宗教的特征,有偶像崇拜,宗教教义,有信徒等等。而帝王文化依然具有宗教特征:偶像崇拜,崇拜天,祭祀泰山神,宣传君权神授,皇帝是上天之子。龙图腾,皇帝是真龙天子。这些说明帝王文化依然具有神秘的宗教色彩。这样看来,帝王文化和其它三大文化具有一样特征。

八、忽视帝王文化的危害大不可言

李慎之在2000年5月15日的一篇大作中有过一次深刻的论断,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等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他说:“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的影响几乎贯穿于一切传统文化之中,它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它是不变的,或者是极难变的……传统文化是丰富的、复杂的、可以变动不居的;而文化传统应该是稳定的、恒久单一的。它应该是中国人几千年传承至今的最主要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势。”传统文化是上面提到的四大文化,而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

帝王文化对其它文化进行了整合,两千年来,凡是和帝王文化对立的文化都要被阉割,将其梳离专制主义的异端思想给以打压迫使其萎缩。原始儒家的命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各个朝代没有哪个皇帝容许反专制的思想的存在和传播。

笔者在2004年写了篇《打倒孔家店与打倒秦家店孰轻孰重》的文章,探讨了人们把孔家店当作专制主义的核心来批判,放走了真正的专制主义。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那时的革命家们对现实的帝王政体和古代的帝王文化,都一概给以扫荡,毫不留情。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陈天华、秋瑾,他们在刀光剑影中,在文化批判中,把专制主义送到了历史的垃圾堆。辛亥革命过后,专制主义出现了复辟,人们头脑中的专制没有打扫干净,迫使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等文化战士们再一次披挂上阵,想从人们意识上解决问题。新文化运动开始批判孔家店,其历史背景就是针对复辟而来的。打倒孔家店带有双面的作用,批判了儒家思想为专制主义服务的方面,起到了伟大的启蒙作用,这是积极的一面;把儒家思想反对专制主义给忽略

了,这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消极一面。结果把反对专制主义的主要对象放在儒家思想这块了,帝王文化乘势溜之大吉。跑了真正的元凶帝王文化,把一个半拉子帝王文化抓住了批判了80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公开地为法家,为帝王文化辩护,把儒家文化当作比帝王文化更坏的东西来批判,这除了当时政治需要之外,和我们整个民族没有厘清帝王文化的本质有关系,和我们没有把帝王文化当作传统文化有关系。

搞了半个多世纪,帝王文化对各个阶层的影响大于其它传统文化。反对孔子,喜欢秦始皇,岂不怪哉!对于帝王文化不仅仅是封建帝王独自喜爱,老百姓也喜爱。老百姓在没有接受民主训练之前,满脑子是帝王文化的东西。这是几千年来帝王文化熏陶的结果。今天宣传帝王文化的影视作品仍然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这是历史的惯性力的作用。

在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血液里,存在着帝王文化的基因。当充斥帝王思想的电视剧《雍正王朝》播出时,有那么多人叫好,有那么多人对好皇帝充满着期望和爱戴。想想看,帝王文化是不是在中国还有相当大的影响。陈寅恪说:“验以今世之人情”,我们验一验,今日之国民,切切实实存在帝王文化的情结。帝王文化对国民的危害既是潜移默化的,又是深入骨髓的。不把帝王文化拿出来批判,并进一步揭示它的外形内幕,我们就很难进步。人们往往拿本来是帝王文化的东西,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这是对先进文化的公然挑战。

这些帝王文化就是建国以后也没有绝迹。林彪、康生、张春桥他们对宫廷政治都有研究。当年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专讲帝王文化的政变经的,不过,他用了现代语言,讲夺权。这些人玩权术都有一套,讲治理国家、经济建设、保护人权、繁荣文化等他们都是外行了。呜呼哀哉,帝王文化这么多,我们竟然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把帝王文化拿出来让大家闻吧!我们文化传统中,不仅仅是三大文化,而是四大文化,其中有帝王文化!不可忽视!

知其有,观其形,闻其臭,才能抛弃之。

(责任编辑 吴 思)

“城市”一词是近代才使用的。中国古代典籍则较少地将城与市连用在一起。杜甫虽然在《征夫》一诗中云：“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这里的城市，未必是现代城市的含义。可以说有城而少市，毋宁称城邑或城堡。那时的城，深刻打上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型烙印。如西周的城分为三个等级，一是周天子宫殿及政权机构所在的王城，二是分封诸侯居所及管理机构所在的都邑，三是贵族士大夫居住的食邑，城中建筑物及城墙高度按等级都有森严规格，不可僭越。城中的底层居民大多是统治者奴仆或官营手工业者。那些工匠的生活劳作无异于奴隶，甚至后代也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必须世代继承父辈的专业。他们制造出的产品绝大多数是不能以商品形式出现的，只是无偿交

纳的贡品。他们有时还要为贵族殉葬，被残忍地杀害。直至春秋时代，城中开始出现一些市场气息。在靠近城门的地方设有民间交易场所，对交易商品的经营范围，统治者也有极细密的规定，《礼记·王制》中记载，不仅“圭璧金璋”等被认为妨害王侯贵族威严的许多贵重物品不得交易，甚至“衣服饮食”也全都“不鬻于市”。但是，随着时代的大变动，统治者越来越无法阻止城与市的合一，在各个城邑中市的功能增强了，城市迅速扩大，城市平民阶层也出现了。例如，当时齐国的都城临淄的人口已经有30万人了。

如今荧屏上出现许多反映汉、唐朝故事的电视连续剧，可其中大多对古代城市场面的描写是完全脱离历史事实，作者的艺术想象力未脱当今城市生活色彩。比如，在当时的贵族官吏根本不可能与平民百姓混杂一处。城中一条大道，除皇帝及随从队伍，任何人不准行走。城内的居住区则分为闾右与闾左。闾右靠近宫城，是达官贵人们的住宅，屋宇巍峨，朱门庭深，歌舞

古代的城与市

施亮

喧天，闾左则在城门附近，居住的是普通平民，茅屋连片，肮脏潮湿，臭气熏鼻。城内市场管理非常严格，筑有高墙，四门有执鞭的胥吏监视，每日定期开放，击鼓为号。市场内的摊位布局，允许上市的品种，甚至商品的物价等都由胥吏说了算，而商贾的社会地位很低，几乎与犯人同伍，受了歧视。在唐朝还有规定，四品以上官吏不许进市场。《朝鲜金载》中记叙，京城四品官员张衡退朝回府路上，肚中饥饿，就在市场买一个刚出笼的蒸饼，在马上举饼大嚼，未想到被一位御史发现后参奏，当政的武则天即下令，不许他以后晋升三品了。可以说，那时的封建统治者特别重视抑商政策，牢牢把握市场不放，对市场进行严格的控制。他们担心市的发展，会冲击到城的统治。

我仔细欣赏过北宋画家张择端的长卷绘画《清明上河图》的复制品。整幅画卷犹如一首乐曲，由轻柔的乐段始，几经跌宕，层层起伏，至热烈的高潮终止。画卷开端是恬静的郊野风光，村落依稀，林木丛丛，乡人赶驮运的骡马到城里赶集。画卷中段，以横跨汴河两岸的拱桥为落笔集中处，展开描绘汴梁城的繁盛景象，艚公逆水行船，纤夫在岸上艰难前行，还有推车、挑担、赶脚的人们，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这些人穿街入城，（下转42页）



欢迎订阅2007年《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不媚俗，不唯书，不唯上，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 68532048

传真：(010) 68532569

近年来《炎黄春秋》订户逐月上升，希望广大读者继续支持本刊，订阅本刊。

每期定价：5.80元

全年定价：69.60元

如在当地邮政局(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 精品书系(第一编)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系从1995年以前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书系出版一年后，即脱销。在纪念《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之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书系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售罄之不足。

本书系全套5本，定价125元；另加邮挂费12元(因存书不多，恕不分卷出售)。



我在高层机关挑起的两次辩论

章伯钧拒绝给刘少奇加罪

彭真像读毛主席语录那样读宪法

改变知青工龄政策的一封信

为什么在中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看人看事我不再简单地相信政治标签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5.80元